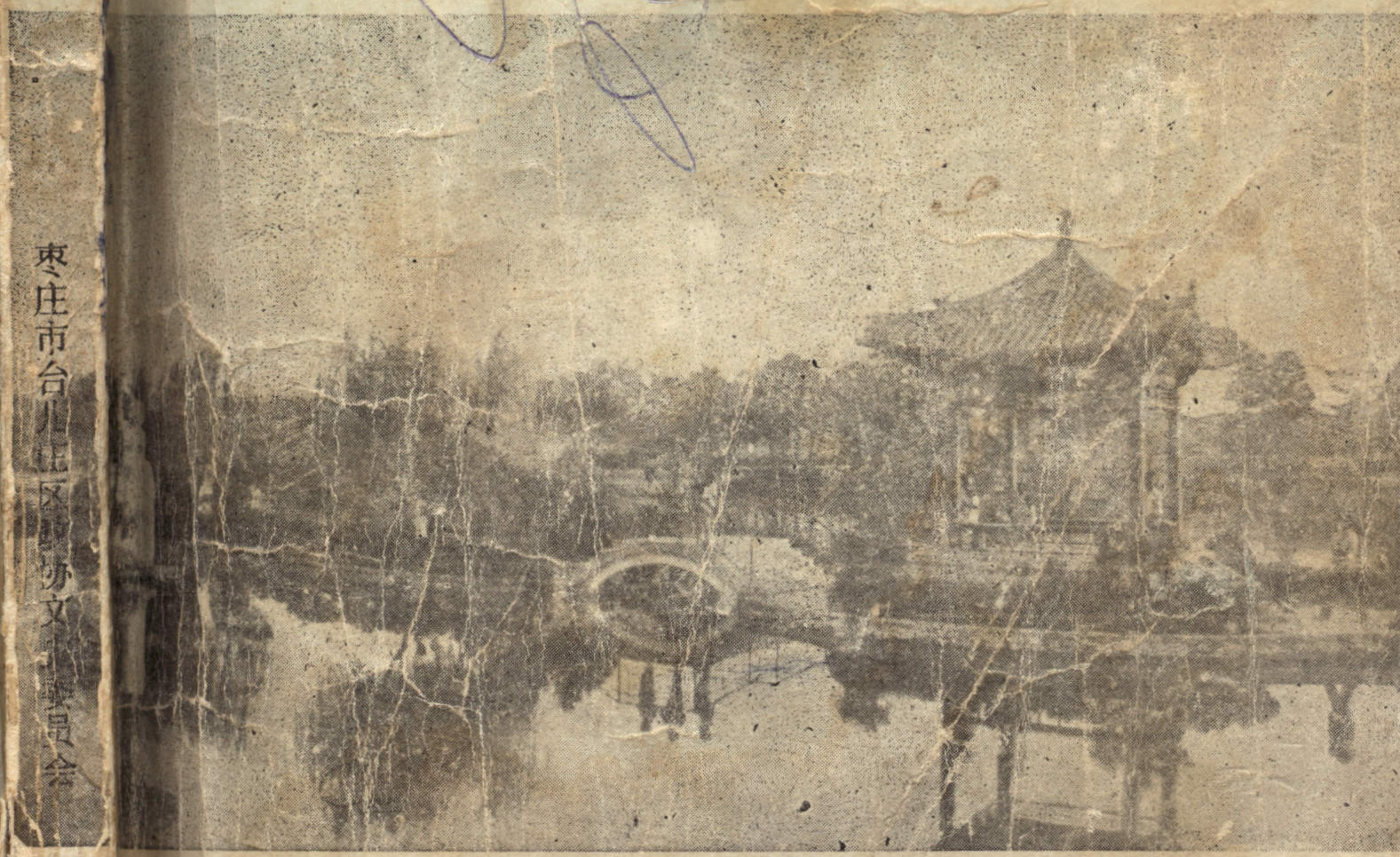
台儿庄文史资料

台儿庄文史资料

第二辑

台儿庄文史资料 第二辑



枣庄市台儿庄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台儿庄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枣庄市台儿庄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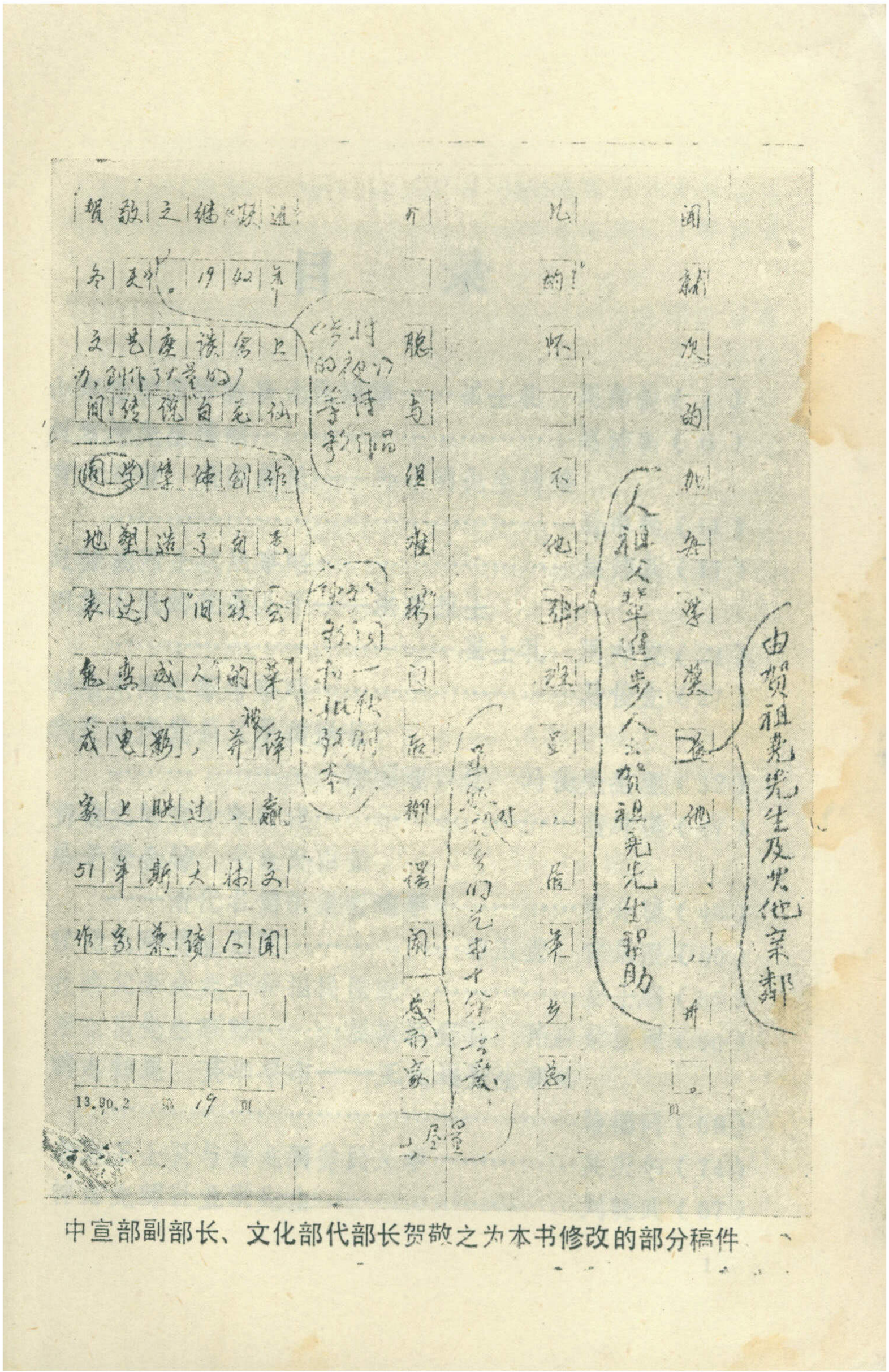
一九九一年十月

台儿庄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枣庄市台儿庄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邮编277400）

枣庄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大32开本6.875印张135千字
1990年10月印刷　印数1—2000
枣出准（1991）43

工本费：2.50元



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为本书修改的部分稿件

目　录

山东省护国军旅长尤民逸事……崔士礼　周邦俊（1）
赵常增先生传略……赵沛新（6）
育才济世　救国救民——孙子明先生传略
……孙中振（11）
赵静波烈士抗战事略……赵沛新（17）
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洪涛烈士
……崔士礼　周邦俊（24）
刘继先同志革命事略……马俊先（27）
我是共产党员又是伪保长
…… ……谢瑞迎口述　马俊先整理（32）
贺敬之的青少年时代……贺绅谟（37）
弟子登金榜　先生卧白云
——清代名儒张廉斋逸事……黄介璩（46）
官乃民和济生医院……郭玉堂　官景澄（50）
我的父亲金兆平和福民医院……金士庵（55）
宋东甫先生事略……屈振恒资料　孙启荣整理（60）
鹏志初展　英华早谢——王化远先生事略
……马福同（69）
老道王士贤与黄龙洞贫民义学……吴庆华（74）
悼念先师孙业洪先生……刘晓武（87）

龙家父子……赵沛新（98）
前国民党少将高参黄僖棠事略……赵沛新（108）
郑继筠其人其事……马俊先（111）

目录

春秋偪阳大战……文史委（117）
幅军起义……《枣庄史话》（123）
张爱萍与台儿庄大战……贺茂之（128）
我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刘培植（133）
台儿庄大战中的神炮手……苏杨志　崔　铭（138）
日军血洗兴桥村……郭万仓（141）
关于回民排的回忆……马福同（152）
北新集战斗……孙晋祥（157）
记黄家坝子之战……赵沛新（160）
郝鹏举马兰起义……赵卓如（163）
附：郝鹏举简介……《中国革命史手册》（172）
大陆撤退前后流亡学生收容就读来台经过
……苏佩言（173）
戎马十年坎坷多……金士庵（185）
峥嵘岁月　戎马生涯——黄埔军校前后
一段生活的回忆……李德让（19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台儿庄区委员会
机构设置及其成员……（200）
编后记……（203）
订正……编　者（204）
补白：悼褚思惠·孙倚亭（5）　济生医院十八周

纪念赞（26） 题赠台儿庄酒厂·贺敬之(31) 望石老人答赠·贺敬之(36) 张用星（45） 题《王学仲诗词选》·贺敬之(49) 济生医院院长官天爵先生雅正·王明怀（54） 偪阳城怀古·季茂龄(68) 大陆纪行·栗由思(86) 南闸故居·栗由思(97) 台庄护曹诗·蒋鸣玉(110) 过新河·王世贞(116) 偪阳古砖(122) 冬日抒怀·栗由思（137） 示郝鹏举·陈毅(162) 马毓德（193）
台儿庄运河水上公园一角……张孝才摄（封面）

山东省护国军旅长尤民逸事

崔士礼　周邦俊

尤民（1886—1916），原名宝诚，号超凡，台儿庄区台儿庄镇顺河街人，系清廪生尤培桢之长子，幼年在私塾读书，为人沉默寡言，足不出户，爱看《三国演义》、《水浒》以及新出版的《太平天国起义》等书籍。稍长，他怀着挽救祖国于危亡的雄心壮志，就读于山东济南军官学堂，并结识了薄子明。两人志同道合，同时参加了同盟会。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刺杀了宋教仁后，解散了国会，四都督失败。这个学校就成了袁世凯的眼中钉，是年冬天即被解散。部分学生被捕的捕，杀的杀。这时，薄子明随吕子人、邓天乙、吴大洲、隋辑五等跑到大连，尤民则悄悄回到家乡。

尤民自济南回来后，即奔波于峄县、铜山县边境黄邱山套一带，招募士兵，筹划军饷。不久，尤民便带数十人随船至江阴，与江阴同盟会一会员商量，迫使驻江阴一小部分袁军独立反袁。据说，当时尤民身著袁军军官服装，带卫士2名，闯入袁营军官官邸，拔出手枪高喊："你们已被我军包围了，赶快宣布独立！否则，全

---

*崔士礼、周邦俊，均系台儿庄区台儿庄镇退休教师。

部歼灭！”同时向他们讲述了一些反袁的道理。袁军军官吓得战战兢兢，只好唯命是从。这样，他与江阴同盟会便掌握了这部分军权，尤民自称江阴独立司令。但终因人单势孤，并受到地方军政人员的排挤，尤民迫不得已于民国五年（1916年）遁往周村，投奔了吴大洲、薄子明。

据《山东近代史资料》记载，民国五年五月，吴大洲在周村宣布独立，成立临时军政府，吴大洲为都督，薄子明为总司令，隋辑五为秘书长，赵效曾为秘书，邓天乙为内务司长。当时的基本队伍由大连招募，初成立时为3个团1个营，号称“四大团”，以尤民、谢宝轩、庞子舟分别为团长，庞子庭为独立营营长。周村独立不久，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相继参加，编制有所扩大。尤民升为旅长，赵德胜升为团长。吴大洲遂以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贺对庭（字丹墀）、李饴甫、王其昌（端五）为团长，以二期毕业生邹玉华为炮兵营长，秦德纯（少文）为营副。

另据该书《古愚轩痛定思·王遂善》记载，“乙巳（1905年），吴大洲以其旅长尤超凡、营长赵德胜驻王家庄张氏家。张氏，余乡旧族。自暴徒移驻，百年文物扫地尽已！”又载，“超凡名民，峄县人，江阴独立司令也。事败来周村为大洲参谋，囚首丧面类久病者，然颇自爱，故与吴、薄臭味差池。闻大洲拒同丰，意颇不平，遂偕德胜赴济南，或与军界有密谋，亦未可知。德胜，胡匪渠魁，性凶悍，秽恶已久。前以十万金寄青岛，或云实只五千元，为日本所留，亟思填补，故抢掠

无虚日。此次既与超凡成谋，莽夫性直，容不免漏泄。大洲自京南旋过济南，微闻其事，未察也。会有投书告密者，大洲遂决意诛之，密遣谢宝轩督率军队，巡行车站左右。是日薄暮，德胜至，甫下车，控马欲登，宝轩军队遽开枪射击。德胜急跃下倒地旋行，军队乱击，久之始毙，并毙其马。乃大出兵攻王家庄，毙卫戍司令副官长范冠五于义衢街，盖自王家庄夜宴醉归而误者。王家庄亦壁拒战，硝烟弹雨弥漫天空，历一日夜不能决。大洲命悬炮文昌阁，击之数十发，而胡匪始披靡，潜开西门，遁西南山麓逸去。大洲既战胜，遍张文告，历数超凡、德胜诸罪状，一若真欲整饬军纪者。并遣人密捕超凡。超凡知之，诡称就医天津，微服南奔，道出兖州，为定武军所获，械送徐州杀之。”

该书编者按说：“王遂善《古愚轩痛定思》这篇文章多偏激抵毁之辞，其中也不无可供参考的资料。吴、薄部纪律不佳，固为失败之由。”

据知情者说，尤民在周村时，其父尤培桢去看他，回家时向他要路费。尤民却说：“中国将来都是我们的，到那时应有尽有。现在国难当头，我手中无钱。”最后还是他的部下筹集一些路费，使老人才回到老家的。

据尤民的妹妹苏尤氏谈，尤民被解至徐州后，张勋待他如上宾，多次劝降。但尤民大义凛然，刚直不屈，义正辞严地痛斥和揭发袁世凯和张勋的丑恶嘴脸。尤民被绑赴刑场时慷慨陈辞，视死如归。

尤民结婚很早，配偶王氏后来生病，两年多时间就

去世了，未留下子女，尤民遂过继其胞弟尤子桂之长子尤惟居为子。尤民为了革命工作，常年离家，直至牺牲，未再续娶妻室。

尤民牺牲后，峄县县长将其遗体由徐州运回台儿庄，并召开了追悼大会。当时，挽联挂满了灵堂，至今尚有人记起的有3副。其中两副是尤民的父亲尤培桢书写的。第一联是：

无力斩仇头，父实深惭吕母；
有志除国贼，儿应不愧王林。

横幅：痛深舔犊。

第二联为：

哀哉！三岁嗣子岂知哭父；甚哀，东奔西波不相见，何曾相识？

痛兮！九旬祖母犹觉有孙；极痛，朝餐暮褰望归来，更望归期。

“三岁嗣子”，是指继子尤惟居；尤民祖母年近9旬，不知其孙牺牲，以为仍在人间。

第三联系台儿庄泰山庙住持静参书写的：

撒手归西，方寻得干净土；
舍身救世，终能登极乐天。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薄子明的遗孀到南京政府找到薄的舅父、时任中央党部常务委员的丁惟汾（山东日照人），询问薄子明为国捐躯的善后问题。南京政府决定，追赠薄子明为陆军上将，发抚恤费10,000元；追赠尤民为陆军中将，发抚恤费5,000元。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尤民之弟尤子桂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总干

事高玉麟引荐，领取了抚恤费。政府派专车将尤民的棺木由台儿庄运往济南千佛山下公葬，车上披着白布，并书写“奉命公葬”等字样。尤民之二侄、尤子桂之次子尤惟宽参加了葬礼。千佛山下共葬有19位烈士，尤民烈士墓碑紧靠着薄子明的墓碑。尤民之墓碑镌文为“追赠陆军中将尤烈士超凡之墓”。

补　白

悼褚思惠

孙倚亭

运南同抗敌，
处处见忠诚。
舍己能全众，
为人不吝情。
勤兵当虎豹，
扫穴斩蛟鲸。
壮烈成千古，
勋名照汗青。

赵常增先生传略

赵沛新

赵常增，字方如，台儿庄区马兰屯乡赵家庄人。清同治四年（1865年），生于本乡望族、中产之资的家庭。6岁入家塾就读，聪颖慧敏，资质过人，阅读经史，博闻强记。12岁时，即将“五经”、“四书”、古文、唐诗熟读于胸中。开始写作，习作破题，塾师命题曰：“乡村四月闲人少”。增即对为：“灌园及白首，馌亩到红娘。”先生阅卷时拍案称奇，曰：“此生之才，后不可量也！”又读了3年，凡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无不通晓。16岁（光绪六年，1880年）时，参加了峄县庚辰科科考，3场已罢，得中秀才，诗文俱列优等。再经院试，得补廪生。19岁时，再赴兖州参加科举考试，尚未入场，身患暴病，呕血不止，抱病而归。从此以后，清朝实行了变法维新，废除了科举制度。先生的诗文俱佳，学识渊博，只因生不逢时，而终老于诸生之列。

先生生平，性好读书而志于学。自6岁入学至年过

---

*赵沛新，台儿庄区马兰屯乡赵庄村人，系赵常增先生之孙。

而立的25年中，除参加科考，外出访友谈诗文，其居家则足不出户，手不释卷，寒暑不易，研读经史，以吸取诸子百家之精华，一切家务概置不问，因而终成儒业。学识渊博，造诣很深，即景生情，下笔成文，构思新颖，词藻华美。所作诗文，众所称许，虽举人、贡生亦不及也。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峄县知县、赐进士出身周凤鸣与峄城名士、赐进士出身、内阁中书王宝田，倡议增修《峄县志》。因知道赵公之才华，特聘其担任分辑。在修志过程中，王宝田对赵公之文章才华十分赞许，思欲罗致于门下，阴使同仁探试赵公曰："你若能投帖拜于王公之门下，虽无举、贡之功名，亦能得其重用。"赵公听后，怫然曰："增本一介寒儒，未取得科第之功名，失其时也。我惟安命守时而已，殊不思因人而贵也。王公重我之情，幸为我婉言谢之，我不欲仰攀高门。"王宝田闻知赵公之言，更加敬重其人品。

县志修成，他毅然辞归，闲居家中，依然读书为乐。因见农村贫寒人患病之苦，庸医误人之惨，便又钻研医书，以济世救人为主旨。经过数年之努力，终成儒医，特精于儿科。一方群众经常抱其子女前来求治。公对患者有求必应，从不推辞。经诊断后，酌处一方，尽量选用农村易得之鲜草药。迫不得已，或开简单处方，带回家中，服药即愈，百无一失。赵公既不卖药物，也不收诊费，有时对穷苦患者赠送药费和粮秣。直到现在，一些乡邻老人提起赵公之名，还都念念不忘其当年待人之好处。

赵公生性忠厚朴实，处事公正，行不越礼，因而在本乡为众望之所归。民众公举其担任峄县企彭乡新河社社长9年。马兰屯火神庙学堂，是峄县最早的学府之一，赵公是该校董事会会长，历任10余年。他为全社民众以及当地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少有益的贡献。

清朝末期，政事日非，腐败透顶，丧权辱国。赵公有鉴于此，首先接受了爱国救亡的民主革命思想，后经吴绍璘（峄县吴寺人，晚清举人，曾流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赵常增先生亲家）介绍，在峄县参加了同盟会，立志于革命救亡运动，积极从事于民主平等的宣传教育工作，带头剪掉了辫子，因而遭到山东督军田中玉的仇视与迫害。民国五年（1916年）赵被捕，被押至济南监狱，判以极刑。后经各界人士合力营救，保释出狱，幸免于难，致使家产破落。公出狱后，居家清闲，唯以诗文自娱。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民革命军举兵北伐，山东军阀恐其带头响应，遂下令通缉。公闻风，藏匿于江苏省邳县车辐山梁姓长女家中，直到翌年，始得安全返里。

赵公忧国忧民，惨遭军阀与旧政府的严重打击与迫害，致使心力交瘁，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农历十一月，因偶感风寒，一日之病而寿终，享年65岁。四方亲朋、邻里闻者落泪，吊唁者盈门不绝，均感赵公生前之德。

赵公一生致力于诗文、医理与革命救亡事业。他是我乡德才兼备的社会闻人，也是峄县众所推崇的著名文学之士。他文学渊博，造诣很深。他一生中的诗歌、词

对与文章很多，可惜历经乱世，散失殆尽了。今将残存的零星篇章略举一二，介绍如下：

（一）世交故友黄敦萬，是贾口的圩主。民国七年（1918年），土匪之乱，赵曾避乱其家。民国十五年（1926年），黄公寿终，享年52岁。赵公作挽联以吊之：

烽火寄余生，八载前携家避地，稳借枝栖，当时雅量深情，每悒澧波钦叔度；

烟霞承结兮，五旬外华屋山邱，空悲薤露，此后寒水薄日，不堪闻笛过山阳。

（二）黄敦萬之丧，赵为黄之弟代作灵堂对联。词曰：

政局如斯，正值此苛虎当道，哀鸿当今，唳鹤当空，举目都成愁惨象；

兄若有知，应痛念老亲在堂，弱女在室，病妻在榻，伤心重作再来人。

（三）民国初年，峄城地主王三猴子（浑名），滥发纸币，名曰“流通券”。后来无有物资收回，便硬说别人假冒，拒不收回，坑害民众。赵公因作流通券感怀诗10首，对其揭发批判，以彰其过。可惜已失9首，仅存其一：

流通票子满街飞，
真假由你说是非。
手握纸币无处买，
日斜市散复袖归。

（四）马兰小学西邻居民黄敦凯，因学校建厕所，

臭气影响其家，突入学校打了校长。问其姓名，他说“我叫黄天”。后来校董事会出面，叫他去学校与校长赔礼道歉。胡庄胡姓地主，封建意识十分严重。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退位，他对民国政府拒不纳粮。县政府派人催征，他持械顽抗，后被捕至县府，连打带罚。赵公根据以上两件事作一讽刺对联。词为：

进校闻巴掌声，包围校长，冒然间无理取闹，好黄天呀！

闭门摆肉头阵，抗粮不纳，居然敢信口开河，是胡为者！

（五）二次游仙人洞诗：

昔年曾拜宝山回，
又到仙人洞里来。
黄叶乱铺台凳窄，
白云深锁寺门开。
僧因俗尘茶烹久，
主为客留酒煮才。
一曲浩歌明月上，
却疑身在小蓬莱。

育才济世　救国救民

——孙子明先生传略

孙中振

孙子明，原名孙景芝，台儿庄区马兰屯乡道庄村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本村私塾读书。他聪明好学，通读“四书”、“五经”，并精诸子百家之学。民国九年（1920年）在济南正谊中学上学，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与同学朱道南友善，品学兼优，思想进步。1925年，因父病逝，辍学在家。鉴于庸医误人和农村缺医情况，即立下济世救人之志，积极研究祖国医学，后遂成为著名儒医。是年，他在本村创办学堂（小学），开设国文、修身和体育等课程，提倡男女平等，招收男女生数十人。这是峄南最早的小学之一。

1932年，孙子明先生应黄次山先生之请，到新河庄（现属台儿庄区泥沟镇）育民小学任教，担任教务主任。他曾用《满江红》曲调填写新词作为校歌，歌唱“君山永水育英才”，唱起来激昂慷慨，励人奋发。1933年10

---

*孙中振，台儿庄区马兰屯乡道庄村人。

月，孙子明由孙伯英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名为孙涤，从此开始地下革命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育民小学解散，孙子明回本村小学任教。通过长期的教学、行医和革命实践活动，他更加坚定了教学是培育新人，行医是济世活人，干革命是解放全人类的信念。1938年，他与孙德（孙晋爵）和孙彦民（孙景萱）等同志，组成中共道庄支部。在教学之余，又开设中药铺，为群众治病，收费低微。遇到贫苦农民看病，经常不收费，有时还周济病者一些物资。有一次，贫苦农民赵克胜抱小孩来看病，家中已断炊。他不但不收药费，临走时还送赵一瓢面，让赵拿回家去做汤以救婴儿。

1939年，孙子明同志任中共峄县第五区区委书记，区长为赵静波同志。为了壮大地方革命武装，他派孙彦民同志到抗日游击队七团孙景玉部，利用宗族关系，做统战工作。数月后，孙景玉即率领大部分士兵携枪归来，被改编为区大队第三、四中队。同年8月，他又动员本村青年八九人到四区石字楼抗日部队（峄县支队前身），组成宣传队，大唱革命歌曲，宣传抗日道理。这时，道庄村党支部组织了苏北鲁南联络站，传递情报，护送同志，发展组织，团结开明士绅抗战。

为了更好地进行革命活动，1940年12月，孙子明同志又到马兰屯火神庙私塾教学。学生的课桌上放着“五经”、“四书”，抽屉里却放着《国语》、《幼学故事琼林》和《酬世大观》等书。在敌伪统治下，为了培养一代新人，就是这样进行的。当时，火神庙私塾是峄南有名的学府之

一。他文学修养高深，能背诵《战国策》等古文百篇以上、古诗词数百首。平时创作诗词亦甚多，惜多逸失，今举仅存的3首七律如下：

一、和绍堂馆中观古歌（步原韵）

沆瀣相求复相亲，
绍堂馆内多逸闻。
风声月旦针今世，
河泻春秋惊古人。
磊落襟怀高士传，
清逸事业葛天民。
等闲但愿频来访，
也步邯郸作笑吟。

二、和四友过访口占

为有芳邻无限香，
半倾积愫半观光。
登龙叔度才千顷，
附骥奇逢乏一长。
鲁直聪明皆夙赋，
酯翁卓荦亦文章。
青莲皎浩出尘上，
顿教群贤拜赭墙。

三、学生为丐扪虱

天真烂漫羡此童，
为丐扪虱向晚风。
偏把民瘼关痛痒，
不将形秽憎龙种。

剧怜景略高风渺，
堪笑荆公自治慵。
擒纵有方目下少，
足征学业善朋从。

诗言志，诗是人之心声。上述之诗，叙述了对开明士绅的统战情况和教师的教学情况，字里行间流露出忧国忧民之情。

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孙子明先生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是一贯的。他的学生龚士沛和他在一校教学时，他每天晚上还为龚讲一篇古文。他批改学生的作文时，多因人作批，因材施教，以发挥学生的智力。有时批语比原作还长，很少有“通顺”、“清楚”等一般化批语，从而使学生能从批语中学到很多东西。他学识渊博，从小学到高中的课程，除理化科外，都能讲解得很好。因他上中学时，理化（当时是致物、格物课）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后来内容发展了，他没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它所致。

在地方政权、地方武装与敌伪顽犬牙交错的斗争中，他能灵活地抓住有利时机，进行革命活动，向青少年学生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平时除通过借书活动传播一些进步图书外，凡遇到区长赵静波同志住在该地或附近地区时，他就邀请赵到校亲自教学生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救国、民主建国的道理。当时，县委书记纪华、八路军南进支队司令钟辉以及运河支队的领导人，如孙斌全、徐绍富、龚朝仪等，亦来校与他商谈救亡等革命工作，就是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队司令黄僖棠也来校访问他（黄是他中学时的同学）。对于各界人士往来频繁的

情况，学校师生及周围群众都认为他是孙家大户，亲友多，又教学，又行医，接触的人多，没有人产生任何怀疑。这说明孙子明同志的地下工作做得是十分出色的。

1942年，敌特岳某控告孙子明同志是峄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负责人之一，因而遭到台儿庄日军宪兵队的逮捕。孙子明同志被送到涧头集日军驻地审讯，严刑拷打，受尽折磨，但他毫不屈服，义正辞严，据理力争。敌人从他嘴中没有得到半点口供。我地下党组织托人将他营救出来，从而也保证了地下党组织的安全。

1943年，伪乡政府将马兰屯火神庙私塾改为马兰屯中心小学，黄崇镳任校长，他仍在校任教。他布衣淡食，生活简朴，对穷富一视同仁，不卑不亢。他为人淳朴，有人得罪了他，而后又求助于他，他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竭诚相助。

1945年5月，台儿庄地区解放，马兰屯中心小学改名为马兰屯抗日小学。至1946年11月，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该地区沦陷，抗日小学复又改为马兰屯国民小学，他任校长兼校务主任，但实权掌握在乡长黄崇楼手里。

1948年10月，台儿庄地区第二次解放。他奉命接管马兰屯国民小学，积极发动全校师生，支援淮海战役。在支前第五司令部过军供应站领导下，成立了前线临时医院，他领导师生负责做转运伤病员工作。同年12月1日，他参加了鲁中南第五专区第一期教师训练班学习。由于他学识渊博，因而广大人民送他一个雅号叫“活字典”。

1950年，兰陵县文教科调孙子明同志到宿羊山区瑞香寺完小任校长，同时被选为兰陵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兰陵县教育工会第一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每逢教师集训，文教科科长王涤秋都邀请他商谈教育的大政方针。

1952年，宿羊山区划归江苏省铜山县，他继续留在该地区工作，先后在唐庄、汴塘、耿集和张庄等小学任校长，同时被选为铜山县人民委员会委员、铜山县教育工会主席。由于长期任教，孙子明同志积劳成疾，1957——1960年，曾先后两次到苏州太湖疗养院疗养。1964年，他66岁时退休回原籍。孙子明同志任教40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在鲁南、苏北地区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有用人才。时至晚年，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1年4月病逝，享年72岁。

1990年5月27日

赵静波烈士抗战事略

赵沛新

赵静波，号滢新，台儿庄区马兰屯乡赵家庄人。清宣统元年（1909年）农历五月，出生于本乡望族、文学世家。

静波少年身矮小而干练，目炯炯而有神，精力充沛，胆略过人。童稚之时，与群儿游戏即卓有才思，使人服爱。6岁入学，先在家塾，少长即就学于峄县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济南育英中学。1930年，与峄县城刘省心女士（号允中，毕业于济南女子师范）结婚。婚后夫妻2人从1931——1937年，任教于峄县县立完全小学校。

静波幼年深受祖父赵常增和父亲赵克镇（字松藩）的影响，在教学期间，又与朱道南（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同为教师，十分投契，经常得到朱的教益，因而更加奠定了抗日救亡、立志报国的思想基础。

1938年春，台儿庄大战结束，枣台地区各大城镇皆沦于敌手。中共鲁南地委，为了在敌占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因峄南地带是党的发展空白地区，特派纪华同志（峄南县县委首任书记），带着朱道南的介绍信，化装成一个小商贩，混过敌伪顽的层层封锁，由山里前来赵

家庄，与赵静波接触（时为1938年秋）。经过一段时间的交谈了解，便于1938年10月介绍其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不久，在山里北圩村（县委驻地）举行入党仪式时，静波宣誓说："我坚决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死而后已。"并要求离家参加工作，经纪华（县委书记）、岳俊卿（组织部长）和邵循政（宣传部长）3人研究，一致认为，运河南北广大地区，是党的发展空白地区，敌伪顽三方面占据控制，必须打开缺口，插进腹地，发展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武装，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瓦解分散敌人势力，并要扮成灰白色的地主自卫组织，与其他抗日武装周旋，轻易不能暴露身份。一旦时机成熟，再建立政权。这一艰巨、复杂的重大任务，需要一个机智勇敢坚强的干部，而且还要具备地方条件，赵静波是唯一合适的人选。经过3位领导的思想工作，静波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

赵静波回乡后，按照县委部署的原则、任务，积极开展工作。

一、发展党员，建立组织。1938年冬，发展了本村贫农王学荣、前大河崖的青年学生赵新斋（组织名赵仲文），建立起本乡第一个党小组。并派赵仲文赴大炉受训。接着，又发展贾口村的贫农沙自由、王庄的青年学生张天爵、东张庄的张天相、柳泉头的赵常彬（组织名赵文清）。1939年2月底，建立了本乡第一个党支部，赵仲文任支部书记，赵静波担任组织、武装、统战3个委员之职，张天爵任宣传委员。后来，继续发展扩大党组织，至1939年底，由峄南县县委批准，成立峄南县第

五区区委，赵静波行政上任区长，组织上任区委书记，武装上兼任区中队中队长。当时区委以下有5个支部：①道庄党支部，党员11人；②前大河崖党支部，党员13人；③欢皿党支部；④夹坊党支部；⑤柳巫党支部，党员4人，连同区委机关，共有党员50余人。

二、搜罗枪支，组建武装。台儿庄大战之后，各村都有溃军亡敌丢弃的枪支、弹药，藏匿在群众家中。静波采取了购买、动员和联合自卫等多种方式，积极搜罗各式步枪20余支，与东张庄、贾口、黄口等村，联合成立了自卫常备队，24人为一个小队。后来有一支地主武装，接受五〇游击队黄僖棠司令的领导，被编为七团，团长是武家坡的孙景玉，副团长是丁楼的孙茂铎与道庄的孙景芳，有百多支枪。在日伪势力逐渐扩大，下乡大扫荡日渐频繁之际，他们为首3人难受游击战争之苦。静波闻讯后，立即委派孙晋觉与张天爵两个党员，通过他们的家族和亲戚情谊，经过了曲折反复的说服动员，终于将这支游击队接收过来，编为峄南县第五区区中队，赵静波兼任区中队中队长，李浩任指导员。

三、巧斗群敌，保存实力。当此发展组织、扩建武装之时，四周环境十分艰险。东临台儿庄镇，驻有日伪军，经常下乡扫荡；又有国民党的鲁南军区游击队司令张里元部下的第三支队孙业洪部，活动在峄南、兰陵至苍山一带；南靠龙口，有“龙瓜屋子”龙希贞的地主武装游击队，时想并吞；西有黄僖棠的五〇游击队司令部，驻扎在马兰屯至古邵一带；此外还有国民党游击县长钟兼三部、国民党中统特务队康泽部。静波处于群敌

之中。他以机智勇敢的精神，随时随地采取既团结又斗争，既联合又摩擦的统战政策，与群敌周旋，保存实力。

1938年11月的一天，峄县伪县长派粮差2人下乡催缴田粮（纳银子）。天刚黎明，二粮差突入赵家庄静波家中，乘赵刚起床未有防备之际，伸手抓住静波的外衣领子，拉着就走。静波问道："抓我何事？"粮差说："你是这一方的人望，你不纳粮，就都不纳粮，抓你上县好催别家。"当时静波的外衣未伸袖子，怀中暗插匣枪一支。他一手掩怀，一手持枪，被粮差拉出大门以外。赵猛一转身把外衣丢掉，随手一枪打在2人中间，二粮差吓得立即跪地哀求饶命。静波以枪指点二粮差说："我杀尔等，只需反手之力。我不杀你们，让你们回去转告汉奸，就说我不但不纳粮，还要打日本抗战。叫他们自己留条后路，少害老百姓。快快滚开！"2人得命，磕头谢恩，飞跑回县。从此，赵家庄对日伪政权公开宣战了。

1939年6月的一天，五〇游击队黄司令派遣黄崇宾去贾口黄介璠处下说词，企图拆散黄、张、赵3村的联盟，将贾口拉过去。（黄介璠，抗战人物，后被日军活埋在古邵）。黄拒不答应，次日司令黄僖棠亲率200多人围攻贾口，黄司令的指挥部设在东刘庄西河岸边的树林里。静波在赵家庄听到枪声激烈，想去打增援，那时的力量太小，只有20支步枪，全部上去也无济于事。猛想一计，只带3个人，其余的人在家中登楼站墙，作好战斗准备。他一行4人，利用青纱帐、树林子、河岸

作掩护，一直摸到黄司令指挥部跟前，一看队伍全部上了阵，只有黄司令和参谋副官等人站在那里，并未注意后边。静波让其他3人埋伏好，自己一个人腰插匣枪，猛然窜到黄司令的身后，说："黄公如（司令字）你不能打，有话到我家去说。"黄司令一看，静波已站在他的身边，枪在手里，机头张着，若不答应，立即有流血之惨。只好说："我下令撤退。"当时命司号员吹号撤退，将队伍带到赵家庄大门前。一看大门落锁，楼上墙上都有人，枪口直对着大场上，场中安放桌椅，有一人伺候烟茶。黄司令见此情景，立即命令部队原地坐下休息，不准乱动。这时，静波说："日军侵华，大敌当前，咱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中国人万不能自相残杀。望司令以大局为重。"黄司令说："静波高见，是我一时冲动，现在接受。咱们要精诚团结，共同抗日，决不再与您发生冲突。静波如无别的意见，我立即告辞。"就这样，一场灾难幸免了。

在1938——1939年两年中，静波伪装成既抗战、又保家的地主自卫武装，通过一层亲戚关系（孙业洪与静波的母族同宗，赵称孙为舅），处处依靠三支部与其联合，对于龙希贞和黄司令，则采取对垒相持，互不侵犯的对策。在孙的势力范围内，龙、黄两派如果联合起来，就会将赵吃掉。就这样潜藏形迹，自我发展。至1939年，孙部撤回东北苍山县，黄司令北进抱犊崮山区投靠五十一军，"龙瓜屋子"向运南发展，盘踞在运河南涧头集一带。在运河支队的支持援助下，五区区委、区政府公开正式成立了。这时，赵与孙分道扬镳了。

四、弯槐树遇敌，血战损军。人民政府建立不到一年的时间，日伪势力集中扫荡峄南平川之地，三支队孙业洪部退到兰陵横山以东的层山一带；五〇游击队黄僖棠部北撤山区；“龙瓜屋子”、孙茂墀、黄子钦等游击队，纷纷投敌，建立起伪区、乡公所，安上据点。这时的抗日游击队面临强敌，十分困难。1940年冬的一天，静波的区中队与运河支队一部，驻在峄县西南的弯槐树村。日军集中了枣庄、峄县、古邵、阴平、徐州和韩庄等一带据点的日伪军，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将弯槐树村包围了。敌人使用轻重机枪、手炮，将这支游击队包围了一天一夜，并利用顺风施放了瓦斯毒气。经过这场血战，区队人员伤亡惨重，突围后，已溃不成军，被迫撤离运河北，进入运河南黄邱山区，跟随运河县县政府，与运河支队总部一起活动。

五、侯孟遭袭，壮烈捐躯。静波回到县政府后，改任峄南县县政府第一科(民政)科长。这时，峄南县只剩下黄邱山套与北边几个村，行政上划分东、西两区。

1941年冬，西区唐庄一带，经常发生土匪抢劫案。一天，唐庄军属周德修家被洗劫。报案后，朱道南县长特派赵科长前往侦破，与运河支队三营营长兼西区区长丁瑞廷配合行动。经过侦察了解，抓获了8名匪徒，送交县长处理。这天夜里，静波带警卫3人，夜宿侯孟村。丁区长带着部队住在唐庄。夜里，丁区长接到日军扫荡的情报，立即将部队撤上南山，然后派人去通知赵科长。时已拂晓，日军平贺部队，配合贾汪日军，共200多人，两处伪军近300人，已将侯孟村包围起来。赵等

3人撤退不及，打退了敌人几次猛扑，终因寡不敌众，只得突围而出。到村北约1华里处小松树林内，见两名警卫员又未突出来。这时，赵科长1人又被日军的骑兵包围，敌人越聚越多，逐渐接近，企图生擒。赵在林内以坟头、树株作屏障，用匣子枪连续击毙3个进犯之敌。这时，发现枪内只有1粒子弹，天已大明，群敌蚁聚，已无退路，恐落敌手而受辱，便毅然自杀以殉，终年32岁。

日伪退走后，峄南县县政府为赵静波同志召开了追悼会，并将其礼葬于黄邱东山坡上、尤窝子村边。1983年11月5日，经台儿庄区委批准，迁葬于赵庄祖茔之内，立碑纪念。

赵静波同志是峄南地区早期共产党员，峄南县五区的开拓者。他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为了党和人民的抗日救亡事业，竭尽忠诚，临危不惧，杀身成仁，壮烈捐躯。

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洪涛烈士

崔士礼　周邦俊

洪涛，原名洪怀恩，回族，生于1916年，系台儿庄镇北关人。父亲洪瑞苓，以经商为主，并开牛皮行一处。兄怀德，早年去世。其父虽为牛皮行老板，但行内和家中一切事务，均由其母马氏夫人操劳料理。马氏对种种事宜处理得井井有条。对待工友仁慈，要求子女严格。她教育孩子要以仁待人，以德养人。因此，邻里乡亲无不称赞其美德。1986年，马氏以96岁高龄去世，其义子高志向曾撰联挽曰：

晓大义，教子向光明，为巾帼翘楚；
知是非，处世以忠诚，令须眉逊色。

洪涛12岁时就进入花庙读书。在他母亲的直接教育和亲身影响下，少年时代的洪涛天真可爱，对人温和。由于他品行端正，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他爱读《水浒》和《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及当时的进步书籍。但由于他的学业成绩较差，18岁就下了学。父母责成他经商，但由于即与谷士敏、芮洪轩等人办了个转运公司。

1938年春台儿庄大战期间，他家的房屋和财产被日军焚烧殆尽，这位富家子弟一下子跌入了贫民行列。因他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激起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

恨。这年冬天，由枣庄进占台儿庄的日军借故对洪涛逮捕、殴打和侮辱。侵略者的暴行，更使他恨之入骨。他曾参加过马东曙的自卫队。那时他就到处打听抗日军队，准备参加抗日，救国复仇。

1939年春，几位青年终于走上了抗日道路。先由李华坤介绍了八路军的抗日事迹，后在他的引荐下，洪涛、李锡铭、马福同、洪蓝田4人到山东沂水县岸堤八路军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由于工作需要，洪涛和李华坤回台儿庄做马东曙的工作。不久，即动员了马东曙的爱人王宗英同来干校参加学习。（后洪涛参加干校民运队）。1939年秋，洪涛在干校结业，再次来台儿庄，行至前王家村时，听说马东曙已率部起义，便立即转道南行，奔赴邳县依宿加入了南进支队，在马福同的回排民任八班班长。1940年，南进支队奉命向苏北挺进，当时洪涛被留下来在鲁南各县以及江苏的邳县、新沂、铜山等地，发动群众抗日救国，并向敌占区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大力开展民运工作，从而激起广大人民的爱国热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使日伪军手足无措，闻风丧胆。

1945年日本投降，台儿庄初次解放。这时，洪涛重返家园，任台儿庄镇镇长兼武工队队长。1947年，洪涛在滕县、邹县一带任回民大队教导员，战斗在津浦路两侧，痛击了地主武装还乡团。扒铁路，炸桥梁，阻止国民党军队北上，协助我解放军在鲁南战场部署和调配兵力。这对于消灭国民党主力军起到了积极作用。1949年，洪涛同志任徐州警备二团政治部主任。这年冬，因

公乘汽车去临沂，在马鞍桥遭车祸，不幸牺牲，终年33岁。

高志向有诗赞洪涛烈士：

台庄沦陷兮，锐意杀敌。
昂首阔步兮，誓不屈膝。
参加抗战兮，慧眼独具。
其志不渝兮，革命到底。
其行可嘉兮，始终如一。
正气永垂兮，名标青史。

补　白

济生医院十八周纪念赞

夫惟大雅，卓尔不群。
存心博爱，台有官君。
少壮业儒，备尝艰辛。
倾心基督，望重里闾。
温温其貌，鼎鼎其名。
创造医院，首树风声。
恺悌慈祥，仁术益彰。
十有八周，纪念不忘。

（《台儿庄济生医院十八周纪念刊》）

刘继先同志革命事略

马俊先

刘继先同志，1898年出生在峄县三山乡耿山子村(现属台儿庄区张山子镇)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本村私塾读书，15岁于峄县高级学堂高小毕业后，回家务农。北伐军进入山东境地时，他投身到张学良部下当兵，3年后在直隶因病回家。

1936年，鉴于社会动乱，匪患四起，人民不得安居乐业，耿山子村村民自发组织起杆子队(红枪会)，公推有一定军事知识、38岁的刘继先为杆子队首领，每天晚上练武，夜间站岗巡逻，维护村民的安全。刘继先受到乡亲们的拥戴。不久，他发动有钱户买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买来了单打一、投头响、套筒子等10多支，冯玉清、谢瑞迎、孙吉胜等几个骨干队员都换上了快枪，自卫队由10几人发展到50余人。一次到涧头集镇金楼打马子(土匪)，结果打死了8个，活捉了6个，从而使马子闻风丧胆。刘继先的声望也越来越高。

1939年春，中共峄县县委在运河南北一带打开了抗

＊马俊先，江苏省铜山县江庄乡前马家村人，退休教师，台儿庄区人大代表。

战的局面。铜滕峄邳四县边联办事处主任胡大勋找到了刘继先，说明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联合一切爱国力量抗日。刘继先深知，目前，大股土匪已基本不复存在，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抢掠，只用土枪、长矛是对付不了的。于是满怀爱国热情，毅然参加了八路军。

“刘继先参加八路军了”，这个消息立即传遍了耿山子全村。好多村民感激地说：“这几年来，我们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多亏他的热心维持。”还有的说：“他有胆识，出去干，一定能干出个名堂来。”

刘继先临走之前，召开了耿山子村自卫队骨干队员会议，决定让谢瑞迎、孙吉胜等人留下，继续维持地方上的安全。

刘继先参加革命后，被任命为十四区第三中队副中队长。1940年春，刘继先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第三中队被编为运河支队第二大队，他被任命为警卫中队副中队长。

同年9月，在日军大扫荡时，刘继先同志被古邵伪军孙茂墀部俘获。敌人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不屈服，不变节。最后，家里卖地、借钱，将他赎出。虽经挫折，他的革命意志却更加坚定，伤未痊愈，就又回到了部队。

1941年冬，巨梁桥村的汉奸刘善云得知刘继先不在家，耿山子村没有抵抗力量，就在一天早上率伪军包围了该村。谢瑞迎之胞弟谢瑞增首先发现，边跑边喊：“二鬼子来了！包围了咱庄！”汉奸对他开了枪，年仅24岁的小伙子倒在血泊中。随之，他们就闯进了村子，

抢夺了财物，并且绑走了村民12人。当伪军走到单庄村西时，有探子来报：“刘继先带人来了！”敌人一听，吓破了胆，丢下被绑架的村民，夺路而逃。

1942年春，刘继先同志经常到敌占区走村串户，先后发动有志青年30多人参加了八路军。这些人后来成为黄邱中队的基础。刘继先带领黄邱中队，与区委书记巩志明、区长王象斌，共同坚持黄邱区的斗争。两年中，区中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到1944年秋，区中队已发展到百余人，遂被编为运河支队二营六连，刘继先同志任连长兼指导员。此时，刘继先已46岁，体力不佳，不适应军队生活，组织上调他做区中队工作。他先后四次带领区中队编入主力部队，为发展运河支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1945年冬，组织上调刘继先同志任运河支队联络站（驻涧头集镇程庄村）站长，做党的秘密工作。1946年春，我军北撤，刘继先被县委留下，在这一地区继续坚持党的工作。这时，这一带已住满了国民党的军队。身为运河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的刘继先同志，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可以想见他的工作何等艰难。白天他躲在沟湾里、庄稼地里，夜晚才能出来工作，别说不能按时吃上饭，有时连口热水也喝不上。但是，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刘继先同志，却以苦为荣，以苦为乐。

1946年初秋，耿山子村住上了国民党五十一军三十八师。一天晚上，刘继先的长子刘启民通知几个党员在他的辣椒地里开会，刘继先主持会议，主要听听最近敌

人的活动情况，哪些人在死心塌地地为国民党效命。等大家都汇报完了情况之后，会议转移到赵兴才家继续进行。刘继先刚想布置下一段的工作，突然，负责放哨的袁安香发现西边墙头上有个人头晃动。刘继先机警地将手枪上好顶膛火，轻轻走出屋，蹑手蹑脚地来到墙根下，用手枪突然指着那个人的头，枪到话到："不准动！干什么的？"那人哆嗦着说："继先大哥，我是继怀，想找你说说话。"墙头不高，刘继怀边说边爬了过来。刘继先说："我现在有事，以后有空再谈，你赶快走吧！"刘边说边让赵兴才开门送他走。此处不便久留，刘继先同志匆匆布置完任务，便带点干粮(熟饭)转移了。

1947年春，刘继先单身一人在一天的傍晚到平山子村一家姓潘的联络点了解情况时，被人发现，报告了国民党驻军，国民党军队打着清乡的旗号，来搜查刘继先。刘继先想走是走不出去了；躲，到哪儿去躲呢？他灵机一动，爬上屋梁，蹲在一个用秫秸皮编的篓子里，手中拿着上好顶膛火的手枪。他想，万一被发现，先干掉他几个再说。敌人进屋后，端着煤油灯到处搜查，翻箱倒柜全查了个遍，结果没有发现刘继先所藏之处，只好懊丧地走了。刘继先捏了一把汗，交待完工作后，又消失在夜幕中。

1948年冬，台儿庄地区解放了。刘继先同志先后担任铜山县民政科科长、利国区指导员(区委书记)。他由于在战斗中负过重伤，致成二等一级残废，工作不能坚持下去，1951年调至薛城西仓果园任场长，后又任薛城

农场场长。1965年，因身体多病，遂辞去场长职务，回乡务农。

刘继先同志回家之后，又被推选为耿山子村党支部书记。他虽身体不好，但革命意志不减当年，处处事事以身作则，为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新贡献。身缠疾病的刘继先同志终因长治不愈，于1969年10月与世长辞，享年71岁。

补　白

题赠台儿庄酒厂

贺敬之

名地名酒台儿庄，
酒家争赶兵家强。
一杯载我三乡去，
诗乡梦乡到故乡。

1988年秋

我是共产党员又是伪保长

谢瑞迎　口述　马俊先　整理

我叫谢瑞迎，现年（1990年）88岁了。前半生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中度过的。俺村（张山子镇耿山子村）在旧社会十年九淹，老百姓过得多是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日子再艰难，我们也能勉强过下去；但是土匪横行，明抢暗夺，人们终日提心吊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我参加了由刘继先发起的杆子会（红枪会），为保护村庄不受摧残，夜晚站岗巡逻。

1939年春，刘继先走后，负责维持村民安全的责任就落在我的肩上。我就带领着没有走的同志继续坚持站岗放哨。马景佩同志（原运河区区长）不断帮助我，启发我的思想觉悟。我开始认识到，人们要想得到安宁，必须赶走日军，铲除邪恶。到1943年3月，由马景佩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党的活动都是秘密的，有时在坡里干活休息时说一说，有时在深夜碰一碰头交换下意见。对于保密的话，除了领导，就连自己的父母和家属也不能告诉。直到1946年春，一个刮着雪花的夜晚，马景佩区长来到我家，告诉我："快找冯兆臣、赵怀安（都是党员）来，有要事传达。"约一袋

烟工夫，人到齐了。他严肃地说：“我们都是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决议。县委指示：所有党员都要随部队北撤，明天晚上到单庄集合。下一步如何，听县委的指示。今晚做好走的准备。”

时间过得是那样的快。第二天傍晚，我简单地告诉了家属，暂时离开了乡亲，不时回大望望村庄，趟过了引龙河，到了单庄。约晚9点钟，人到齐了。由马区长简短地交待了一下就出发了，连夜到了丁楼住下。到了次日傍晚，区长集合宣布：“我念到谁的名字，谁就随部队进山；念不到的，回家做隐避工作。”我没有被念到名字，心中正在想三想四时，忽然区长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老谢，你回去吧！40多岁的人了，跑不动，回去为党也能做工作，我们忘不了你。”并说：“不能从原路走了，您村昨天已进驻了中央军。”

这一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好歹盼到天明，吃了点摊子饭，就沿着运河北岸而来了。不时隐约听到枪声，心急如焚，不觉到了郝湖我的本家兄弟家，打听一下运河南的情况。他说：“运河不让过，耿山子驻满了中央军。”我吃了午饭，到村头站站，可巧有河南的驴贩子（贩粮食卖的）。我就随着他们边走边聊，不觉来到运河边，一看闸上的桥板没有了，驴贩子赶着驴只好蹚水过河。一头驴忽然掉到深水坑中挣扎着。围观的人越聚越多，我就混入围观的人群中过了河。到了孙茂顺家，我冻得直打哆嗦，他温点酒叫我喝。正喝时，中央军来了，把我抓到一姓于的家中，让人们给他挖战壕，垒工事，还不给饭吃。第三天，孙茂顺告诉我：“你家

的屋被国民党兵烧了三四间。”并说：“我去找他们说说，让你回去看看。”不多一会儿，孙茂顺回来说：“叫你走，拾掇两天再回来。”

我到家一看，果真如此。老人和家属满脸泪痕，正在扒拾被烧断的捧头子。我强压住心中的怒火，说：“别难过，以后咱再盖。”正说之间，一个国民党军官带着两个兵把我堵住了，让我跟他走一趟。到了营部，听人喊他“郭营长”。他让我进屋后，并让我坐下说话。营长说：“你叫谢瑞迎吧？听说你很会办事，找你两三天了，不烧你的房子，你还不来。叫你当保长，替我们办事，干不干？”我随之说：“营长，我不干！”营长一拍桌子：“到底干不干？”我一想，硬说不干，今天就要吃亏，随说：“营长，我怕干不好，我又不识字。”营长说：“只要干就能干好。听我的，哪个不听保长的，国军就给他点颜色看看。”就这样，我就接招了。但心中想，我是共产党员，怎么能给敌人办事呢？事后，我村3个党员碰碰头，赵怀安、冯兆臣都同意我先干着，等有党组织联系再汇报。

约一月之后的一天晚上，马区长突然来到我家里。我一见到他，就象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忙上前问长问短，然后告诉他我来家后的一段情况。区长高兴地说：“叫你当保长，那再好不过了！我们想找人当，还找不到哪，你当最合适！”随后交待了今后的工作和联络地点，约定每10天到程庄去汇报一次工作。

我的心里踏实了，在给敌人做事的幌子下，能更好

地做党的地下工作了。1947年3月的一天上午，孙耀南（原运河县委组织部长）挑着烟叶、山楂、柿饼子来到耿山子村。他明为卖烟叶，实则来此指导工作。有人上前搭话："王麻子哥又来了，这回烟叶好吸吧？"孙回答说："不光好吸，还有劲来。"正说之间，国民党的李连长前来盘问他，说他是八路探子，卖东西为名。"来人，给我捆上！"此时，我赶到了，连说："李连长，王麻子哥的烟叶可好吸了，不信你问问会吸烟的老头。他怎么会是八路的探子呢？我敢担保。"随手从框子里捧出柿饼让连长尝尝，"钱我付了。"李连长听我一说，嚼着柿饼子扬长而去。

孙部长说："好险哪！差点又要吃麻花了（指绳绑）。"午饭时，他到了我家门口。我让他家去，他怕我受影响，不肯进家。我只好端碗汤，拿点煎饼，让他在门口吃了。他一边吃，一边机警地告诉我："国民党不长了，近来连连吃败仗，从东北到西部，解放区一天天扩大。咱山东的形势已由战略转移，转为诱敌深入、一举痛歼的局面。今后要注意敌人的动向，及时向联络点汇报。"

敌人换防了，换来的是五十九军一〇三师。为了让组织及时了解敌情的变化，一个阴雨天，我去联络点汇报，路滑泥泞，摔倒多次，才到了程庄。回来时，鸡已叫过头遍了。

1948年旧历十月初八，我们的家乡解放了。刘继先同志通知我，不要出来，仍干我的联络工作，注意监视反动分子的活动。直至淮海战役结束后，在铜山县唐庄

区召开会议，由朱道南宣布，任命我为杨埠乡乡长。动员群众恢复生产，今冬明春重点是维护地方治安，镇压反动分子，然后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至1951年冬，小乡并大乡，我辞退了乡长，回家务农了。

现在我虽说年纪大了，耳朵有点聋，但身体还很好，脑子还算清醒。大儿子在镇敬老院当院长，还是省级模范；二儿子是市物资局干部；孙子也有了工作。儿媳妇对我照顾得很周到。特别是去年我有了一场病，他们花了2000多元。如果是旧社会，他们想孝敬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这都是党领导得好啊！

补　白

望石老人答赠

贺敬之

观海喜见潮，
听松乐闻涛。
宽怀风雨事，
石老解逍遥。

（《历山诗刊》第14期）

贺敬之的青少年时代

贺绅谟

童年的家庭生活

贺敬之祖居现在的枣庄市台儿庄区薛庄乡贺窑村（过去属于峄县）。祖父贺祖烈，系清末童生，虽未考中秀才，但诗书文章较有根底，并有才名，常为地方乡里撰写挽联、贺幛、碑文等，挥笔而就，词意贴切。父亲名典谟，聪颖过人，读书不多，悟性颇佳。能阅读古典小说如《聊斋志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虽不精通，但能知其故事梗概。据说，他读书不过一年，但写字、画画超过常人，能以劈竹画兰草，无不生态逼肖。

贺敬之生于1924年11月5日。出生时正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南方革命声势如火如荼的时候。但是，在这之前，广大的北方，各系军阀在帝国主义列强扶持下，连年混战。因此，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经济破产，生计日蹙，农村一派萧条景象。当时的贺窑村也不过是有几十户人家、百多口人的穷村。贺敬之的家庭，在上几辈时，本来是足以温饱的

---

*贺绅谟，台儿庄区薛庄乡贺窑村人，退休教师，贺敬之同志的族叔和同学。本文经贺敬之同志审阅和修改。

小康之家，到了他祖父这辈，因为兄弟4人分家，各家分得土地了无几亩，加之他祖父是读书人，不善理财，所以陷于贫困，丰年尚足以温饱，歉年则生活艰窘，甚至饔食不继。幼年的贺敬之就是生活在这穷苦的家庭中。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流亡到四川，40年又毅然投奔延安参加革命，他的觉悟莫不与他童年的苦难生活有关。（这是后话）

童年时期的贺敬之，长得很讨人喜爱。圆胖的面庞，见人常带着微笑，不好多说话，说起话来很腼腆，有时有些羞涩。他性格善良，对同龄的小伙伴，能和睦相处，从没有和孩子们打架斗殴的不良行为。当时农村闭塞，没有学前教育，惟一的识字教育，就是识字卡片。他喜欢看旧小说上的人物画像。由于这些良好的表现，亲邻长辈都很喜欢他，祖父母更是爱如掌上珠。

从小学到乡村师范

贺敬之于1932年入小学一年级读书。当时的学校是天主教设立的天主堂小学，校址就设在他家的后面。教会办学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宗教宣传和收揽教徒，更具体地说是为帝国主义明目张胆的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作掩护。不过教会在旧中国办教育，也确实培养了一部分人才。

在天主堂小学读书，学生必须信教。课程内容除当时国民党教育部编审的小学课本外，学生的必修课是读《圣经》。

当时该小学的教师名叫石同伦，他教课认真，毛笔字大小楷写得都很好，很得学生的尊敬和学生家长的拥

护。学校开办不到一年，学生猛增到40多人，年龄大的十七八岁，最小的七八岁。贺敬之上一年级，个子和年龄都是最小的，但是他聪明过人。记得开始学习“注音符号”，年龄大的同学读起ㄅ、ㄆ、ㄇ、ㄈ都发笑，拼音练习不正确，但是贺敬之每次都拼写得很正确，总是先交作业，每门课程测验都得高分，可见他的才华，从开始上学即已显露出来。

幼年时期的贺敬之，不但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在平日表现上，也与普通儿童迥异。性格略呈内向型，但不孤僻，除学习外，一般的热闹很难惊动他，思想极为冷静，用“文质彬彬”来形容他，也恰如其分。如他家的门前，是逢集的粮食摊子，每年秋收后，总要唱上几个月的拉魂腔（即现在的柳琴戏），不过那个时候，道具简单，摆地摊出演，一般儿童哪个不去看热闹听唱。贺敬之虽然对家乡的艺术十分喜爱，却总是克制自己，尽量少去戏场听唱，而是在家学习。他的“敬之”学名，原是家族排辈“敬”字班，“之”是他大祖父祖介公，使用文言虚字“之、乎、者、也”起的，想不到，成年后的贺敬之竟成为一位当代颇有影响的优秀诗人。古人说：“后生可畏”，真是一句富含哲理的成语。

贺敬之的家庭原信奉天主教，他在天主堂小学读书的时候，也曾读过《圣经》，并到过当时的涧头集天主堂赶过“瞻礼”，望过“弥撒”（天主教的一种宗教仪式，用来祭祀上帝）。按说他应笃信教义，但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却对宗教教义产生怀疑。有一次，他从涧头集天主堂赶瞻礼回来，在路上他同他的同学贺忠谟（他称族家

二叔)说:“我不相信人是上帝造的。既然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为什么他的儿女有穷的,有富的?”十多岁的孩子敢于对宗教教义产生怀疑,他的智力确实超过常人。

贺敬之年龄渐长,天主堂小学不能满足他的学习要求。族家长辈看他有出息,遂于1935年春由族人祖父辈进步人士贺祖尧先生帮助,转学到峄县运河北北洛小学插班四年级读书,时年11岁。这个学校虽是私人办的村立小学,但办学认真,教师水平高,要求严格,教学质量居峄县全境各公、私立小学之冠。每年暑假,该校毕业生考取省立中学和乡师的学生最多;全县会考,该校的总成绩都是第一。因此声誉大振,名闻遐迩。各地的学生纷纷转学到该校就读。贺敬之自到北洛小学以后,初次见到这样多的同学,这样多有学问的老师,思想上大为开扩,学习上更加勤奋刻苦。他在该校学习两年半,每学期考试成绩都是第一名。由于品学兼优,深得学校领导和课任教师的器重。他的家庭较困难,由贺祖尧先生及其他亲邻给予帮助,学校免交学杂费,使他得以继续学习。

1937年暑假,贺敬之高小毕业,在亲友的帮助下,前往滋阳(现在兖州市)投考山东省立滋阳第四乡村师范。当时滋阳四乡师,是鲁南、鲁西一带较有名气的乡村师范。这年前往该校报考的学生达4000多人,录取名额为100人,40:1,其录取的希望之小可想而知。当时的乡村师范,每人每月有8元钱的生活费(1937年以前为5元),所以一些穷学生多去报考乡师。学生报考人数多,录取名额少,学校为了录取真正的优秀生,便

采取两次考试、两榜录取筛选的办法。即第一场考试国语、算术、常识3门课程，评分后择优先取300名，一次筛去3000多人。第二场考试除国语、算术、常识外，再体检、口试。第二场考试后，择优录取正取生100名，备取生20名。两次考试，两榜筛选公布，最后贺敬之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正取生，时年13岁。同年9月初开学后，他是四乡师第九级，他不仅是全班最小的，也是全校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一位小同学。每次全校学生排队外出，他都是排尾第一名。但是他的才华出众，受到全校师生的爱护。

乡村师范教育是当时山东的特殊教育，其办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乡村小学教师，学制4年，低于后师，高于初师。该校教师的水平较高，绝大多数是当时名牌大学本科毕业，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等。旧制高中毕业的学历，只能在学校做些事务和文书工作。当时国民党虽然腐败，但教育风气还比较正，考试舞弊的现象很少发生。或许我当时年轻，不了解权势内幕。学生在校修业4年，经考试合格才准予毕业，毕业后任农村小学教师是绰绰有余的。但职业要自己找，学校不包分配。该校也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如山东省原副省长朱奇民同志（现退居二线当顾问）就是该校七级学生。

贺敬之考取乡师回家后，家乡亲友无不为之庆贺。一致认为，小小年纪能考取省立学校，当时在运南各社是绝无仅有的。那时运南各社农村凋敝，教育不发达，他能考取省立乡师，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消息不胫而

走，很快传遍各乡，都认为贺敬之是个奇才。

个人的前途，总是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正当贺敬之考取乡师的时刻，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拥兵20万，本来守土有责，应坚决抵抗，但他为保存实力，消极应付，稍作抵抗后，即放弃黄河天险不守，屯兵宁阳，拥兵观战。当时山东全省中学相继停课，动员学生回家。青年学生走投无路，徬徨苦闷，年龄大的学生有的投笔从戎，或参加抗日团体作抗日救亡宣传。当时贺敬之年龄小，只好回家暂住，以待时机。

流亡四川

1938年4月，台儿庄大战结束后，在日军还未攻占徐州之前，从原北洛小学传来消息，国立湖北中学成立，收容山东各省立学校师生，校址设在湖北汉水上源均县、阮阳两地。贺敬之由北洛小学一位姓任的老师（已去世）带领（另有4位青年学生），在徐州爬上难民车，经开封、郑州、许昌等地，历尽艰险到达武汉。又从武汉溯水西上，到达均县才找到学校。当时，由于受战局影响，加之学校成立不久，一切极不正规，只能起到暂时收容的作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湖北中学奉命迁移四川。全体师生经陕南长途跋涉3000里，历时4个月，于1939年春抵达川北。学校改名为国立第六中学。总校设在绵阳，下设4个分校。贺敬之被分配到梓潼第一分校简师部读书。这时师生生活虽较艰苦，但学习情绪比较高昂。由于国共合作抗日，学生受进步思想

影响，自动组织起各种读书会，出刊墙报，订阅各种进步书报，如《新华日报》、《大众哲学》。又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抗战不到两年，沿海一些大城市完全沦陷。进步师生越来越看清国民党的真面目，都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贺敬之这时在四川读书，即开始学习写诗，常向当时在重庆出版的《大公报》，在成都出版的《华西日报》、《新民晚报》等报纸投稿。由于他思想进步，善于写诗，获得进步教师和高年级同学的赏识，他与先期毕业的同学李方立、顾牧丁等人交往甚密。

投奔延安

1940年春，贺敬之和另外两位同学，在李方立的带领下，毅然决然离开学校，从川陕公路旁边的小道，穿越荒无人烟的秦岭大山脉，徒步跋涉几千里，历尽艰难险阻，奔向延安。在离开学校的时候，班主任廉立之老师给4个有志青年每人5元的路费(现洋)，年龄较大的同学孙东旭也帮助了他们20元路费，并寄予殷切期望。廉老师是山东泗水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1935—1937年在四乡师任教，抗战期间随校入川，在国立第六中学师范部任教，是贺敬之当时的班主任，对贺敬之的进步，起到关键作用。全国解放后，调山东师范学院（现称山师大）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廉老师晚年身体多病，于1986年病逝于济南。贺敬之于1988年秋回老家时，见到当年的老同学，谈到廉老师逝世，深表悼念。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4个青年抵达西安后，不能直接进入延安，便到当时驻在西安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联系报到。在办事处同志的协助下，换上军装，以八路军通信员的身份，通过封锁线进入延安。这时是1940年夏天，贺敬之时年16岁。

贺敬之到延安后，先进以徐特立为院长的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上高中，后考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三期学习。在鲁艺学习期间，贺敬之继《跃进》之后，又创作了《并没有冬天》、《乡村的夜》等诗歌作品。1942年以后，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投入了著名的秧歌运动，创作了大量的秧歌歌词和一批秧歌剧本，并在民间传说“白毛仙姑”的基础上，和丁毅等集体创作了大型新歌剧《白毛女》，成功地塑造了白毛女的典型形象，深刻地表达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革命主题。该剧后被拍摄成电影，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在许多国家上映过，赢得了国际声誉，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从而贺敬文以剧作家兼诗人闻名于世，蜚声文坛。

结束语

以上这些叙述，着重是写我和贺敬之在一起上小学、乡师阶段的情况。至于他在四川的学习生活，投奔延安以后受到的革命教育情况，以及60年代以后发表的一系列诗作，我都不清楚，只能从解放后贺敬之3次回家（第一次1949年6月，第二次1950年初，第三次1988年10月）和我面谈的一些情况，并参考了《贺敬之诗

选》、《贺敬之专集》撰写。

贺敬之从一个贫苦的农民孩子，成长为一个当代有影响的优秀诗人，当然与他的聪明才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培养与人民的哺育。贺敬之为人很谦虚，从不矜夸自己的成就，总是把自己的微小成就，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

贺敬之为人，最值得青年人学习的有两点，一是他从小热爱学习，刻苦勤奋；二是他抱有远大理想，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里，能毅然奔向延安，这是一般青年办不到的。

1990年6月3日

补白

张用星

张用星，字联斋，一字兰坡。乾隆庚辰科副贡生。幼有异禀，读书数行俱下，比长，博通古今，为文下笔数千言。奇姿古奥，不拘有司尺度，阅者或至不能句读，一时才名籍甚。最后乡试以三艺征引浩博，主司不能尽解，抑置之。遂绝意进取，以著述自娱。所为《春秋聚》，兼综三传，实得笔削微旨。殁后，其犹子（侄子，即张炳南）以标大令（县令）为刻之白下（今南京市）云。（《峄县志》卷二十一《乡贤下·文苑》）

弟子登金榜　先生卧白云

——清代名儒张廉斋逸事

黄介璩

张用星，字廉斋，一字兰坡，清峄县企彭乡金河社大泛口村（今属台儿庄区彭楼乡）人。《峄县志》（光绪三十年修）上说他“幼有异禀，读书数行俱下。比长，博通古今，为文下笔数千言。奇姿古奥，不拘有司尺度，阅者或至不能句读，一时才名籍甚。”

乾隆庚辰年（1760年），张廉斋曾赴兖州应乡试。文章虽然已经符合要求，但是因为“三艺”引用得太偏僻古奥，以致于主考官和诸位副主考都不能全部读通。于是调来经史诸书查找，仍然有好几条弄不懂。考官们一气之下，把他放在备取生之列。结果，张廉斋只考了个副贡生。

张既落第，遂绝意进取，返里设馆课徒，金榜题名者数人。如戴连棻、田再甜均乃状元及第。殿试时，皇上问戴：“汝师何如人？”戴回答说：“白丁。”皇上说：“宣他进京上殿，朕钦赐其功名。”张时已逾“天

---

*黄介璩，台儿庄区彭楼乡黄口村人，退休教师。

命”之年，立即起程进京，戴挽扶其上殿。皇上曰：“弟子登金榜，先生卧白云。”等待张续之。张不对，下殿喟然叹曰：“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戴问：“何以不以此续耶？”张答：“目睹朝中政，功名复何用？”教如初。

有一年，张廉斋被某大家延为塾师。学生六七人，年可十三四，皆熟读诸子百家，俱傲甚，已数易其师（皆因学生刁难而告辞）。张遂对学生说：“我教书有个规矩，先熟读《万年历》，达到背诵。”学生面有难色。张说：“天时不知，四季不明，何以为人？”乃亲作示范，从头至尾，复自尾到头，一气背诵完毕。家长、学生皆惊服其才学，于是束脩加倍焉。

张一生清贫，凛然有正气。弟子戴连棻曾奉旨巡视山东。某州官因触怒了戴而害怕，遂请张为之说情，并送去了许多礼物。张义正辞严拒之曰：“非义之财，吾不受也。”戴闻之，颇受教益。及戴来拜谒时，张已病逝。乃为之立墓碑，亲题“恩师张廉斋之墓”。

张廉斋学识渊博，名噪一时，以诗、古文主盟骚坛。被当时峄县知县张玉树延至县署，为布衣交，并协助侦破过许多奇案。但他又安于田园，吟咏自乐。有一首《隐居自乐》，颇能道其心迹：

茅屋隐居自逍遥，
道路崎岖宾客少。
看的是无名草，
听的是鸟雀叫；
喜的是青山隐隐，

爱的是绿水滔滔。

春花开得早，
夏蝉枝头闹，
黄叶飘飘秋来了，
白雪纷纷冬又到。
叹人生，容易老，
总不如盖一安乐巢，
挂一轴耕、读、渔、樵，
闲来把棋敲，
闷来溪边钓。
吃一杯，乐陶陶，
直把愁山推倒。
个中味，
非神仙谁能知晓？

另有一首《醒后偶成》，更见其淡泊之心志：

泛口之侧房数间，
坐也安然，行也安然。
粗茶淡饭饱三餐，
早也香甜，晚也香甜。
一头耕牛半顷田，
收也凭天，荒也凭天。
闲来无事览书篇，
名也不贪，利也不贪。
归来儿女笑灯前，
今也谈谈，古也谈谈。

张廉斋晚年，“以著书自娱。所为《春秋聚》，兼

综‘三传’，实得笔削微旨。”（《峄县志》）廉斋去世后，其侄炳南遵照其遗愿，将《春秋聚》补充、整理，刻印于白下（今南京市）。

张廉斋晚年兼习中医，为老百姓解除疾病之苦，亦小有名气。据说，有一年，有一运粮道台在南去途中，因一事不怿，身感不适。船到台儿庄时，道台慕名请张廉斋到船上为他诊治。张廉斋闭目为他切了一阵脉后，睁眼开口说道：“大人这病是经脉不调……”道台一听，拂袖道：“胡闹！先生连男女都不分，何谈治病？真是庸医误人！”连处方也没让他开，便端茶送客。道台继续南行，一路上一想到看病一事，便觉得好笑，医生不辨男女，还当什么医生？就这么笑了一路。待从南边运粮回来，病却不治而愈。到台儿庄时，道台再次请教张廉斋。张廉斋慢慢道其奥妙：“大人好怒，怒则伤肝，故以一笑解之，不药而愈。”运粮道台恍然，不得不折服。

补　白

题《王学仲诗词选》

贺敬之

黾园书画好，
滕国诗亦佳。
琅玡现新景，
梦笔生三花。

官乃民和济生医院

郭玉堂　官景澄

官君乃民，字天爵，又名文藻，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官氏之先人于清初即居台儿庄，其历代先祖在清朝多供职绿营，历守台儿庄东至重坊、马头、郯城、红花埠，西至顿庄、阴平、柳泉、得胜闸等地之汛情。其父官步云，于清光绪年间，任台儿庄参将驻守营的傅爷职。家庭生活谓之小康。台儿庄一带有“郁半街，官半营”之说。“郁半街”系指商业多，“官半营”系指人员多。

据史书记载，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沂州镇标前营移驻台儿庄，改称台儿庄营，始设参将署。后为绿营军编制。绿营乃清兵制，属八旗之一的绿旗。绿营设参将1员，领三品衔，分防台儿庄、峄县城及韩庄运河各闸。1909年，台儿庄营始撤销。

官乃民虽系官宦子弟，却能弃武就文。其家务均由兄长管理，他有机会一意攻读。官乃民8岁入学，自

---

*郭玉堂，台儿庄镇西关街人，台儿庄区基督教“三自”爱委会负责人，牧师，市、区政协常委。官景澄，官乃民之子，台儿庄区人民医院副主任检验师。

1894年至1904年在台儿庄尤家学馆就读，跟王老先生士隆学习儒家经典10年。他勤奋好学，成绩优秀，对儒家思想、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文章写作造诣较深，在不足20岁时，他第一次应科举考试未中，不久即废除科举。下学第二年，他与运河南岸孙楼村退职京官孙某的六女结婚。官氏自1904年至1911年，应聘在马兰屯乡抗埠村王元珍家任馆师，后又在台儿庄燕家学馆教书。辛亥革命后，他经其家叔官继远介绍，到峄县基督教实业中学任国文教师数年。后又在峄县基督教瑞门德医院学西医。

瑞门德医院的外国大夫对中国人粗暴无礼。为了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出于民族自尊心，官乃民敢于和外国人相抗衡。现仅举一例。原峄县基督教负责人、美籍牧师唐多马，把峄县教会及其所属医院、学校房产均视为私有财产。1930年，他意欲撤销峄县的基督教会及所属瑞门德医院和教会的女子中学，将其所有财产分给邹、滕两县教会。官乃民获得此信息后，立即联络峄县教会的有关人士，向唐多马提出严正抗议，坚决反对外国人在中国教会内指手划脚，作威作福。教会不是外国租界，更不是哪一个人的私有财产，不论中外任何人，都无权自行处理。结果，唐多马的这一阴谋没有得逞，峄县的教会、医院和学校都被保留了下来。

官乃民经过长期的观察和体验，看到了西医的优点和特点，便和台儿庄基督教人士赵鹏霄共同筹划，由赵出资布底，于1917年在台儿庄镇内三官庙创办了济生医院，由官乃民任医院主任。这是台儿庄地区的首家西医院。该院为慈善事业，采取社会募捐的办法，对贫苦病

人暗为周济，酌收药费，假此办法维持医院开支。他曾先后从外地聘请西医师邓培琛、潘彦芳、王寿亭、孙芳山等人主理医务，其他药剂、护理、事务人员共10余人，分挂号、接待、制药、割症、养病、修缮等室。官乃民的具体业务，包括内外科、各类病症诊治、全身麻醉、截肢等大小手术，处理难产和各种注射、灌肠、导尿、放腹水等治疗手术。该医院免费种牛痘、供应戒鸦片烟。药品器械均自上海各大药房采购，自制部分丸药、药酒、药膏。济生医院的创办，使台儿庄方圆数十里地区病患者得到西医的及时治疗，解除了病人的痛苦，对保护人民生命之健康起到了一定作用。

1925—1928年，台儿庄成了军阀混战的战场。官先生组织了红十字会，会员佩戴红十字标记，收容、治疗受伤人员。由于连年战争、水灾，土地荒歉，经营亏损，医院于1930年自三官庙迁至本镇西关后街本人住宅继续行医。

1934年，他邀请台儿庄京剧班义演募捐，曾刊印了台儿庄镇济生医院18周年纪念刊。其内容有：刊名题字，募损各界人士合影，医院工作人员合影，运河船闸、桥梁、火车站风景照片计10幅，台儿庄各界人士贺词，自述办院经过，医院规章制度，捐助人员名单，直鲁联军保护医院布告等，共22页。

1938年中日台儿庄大战，医院被炸。1939年，医院迁至江苏省邳县官湖镇。1948年，官氏曾到南京政府赔偿委员会，见到原峄县县长辛葆鼎，要求日本赔偿医院被炸的损失。当时，该委员会有批复文件，后无结果。

该院于1951年自官湖镇迁回台儿庄镇旧址。

1955年，官氏又去北京要求日本赔款，经中国红十字总会批示："须待中日恢复邦交后办理。"将要求赔款交涉文件放在中国红十字总会处，并将部分文件放在台儿庄镇宋镇长处。要求赔款之目的，乃意欲用该款在台儿庄建一医院。事尚未成，官氏乃民即于1965年8月30日与世长辞了。

官氏当年任教时，在语文教学上概括为"四意读书法"，即字意、句意、段意、篇意。他曾自学大量英、美、日、苏等国医著作的中译本。如解剖、生理、病理、内外科、妇产科、眼科、传染病、药物等，掌握了医学基础知识和临床诊断、治疗技术。在治疗休克、出血、脓肿、痈疽、传染病、内外科病症等方面，均有较丰富的经验。40年代，他在邳县官湖镇，用"三五价锑剂"治愈了千余例黑热病患者。为了对病人的身体健康负责，他医疗作风严谨，对病情的随时变化、意外处理，均作详细诊察和充分估计。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例如出血、休克，他能镇静自如地给予妥善处理，对贫苦病人，则酌情减免药费。

他生活艰苦朴素，勤俭廉洁办医院。对聘请来的大夫，在生活上给以优厚的待遇。募捐得来的钱，都用在医院开支和病人身上。解放前，他没有购置一分土地，没有积蓄一点钱财，用他的话说："只落得两袖清风。"

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富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敢于同傲慢的外国人针锋相对，分庭抗礼。现举两例说明。一是，峄县基督教实业

中学的学田地，当时周围的地邻群众逐步向里侵占，教会的外国人出面干涉，必将造成殴打之势，甚而会有人命之危。后由官君出面调解。他引用古代的故事，又引用《圣经》里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和“施比受更为有福”，说服对方。结果，群众自觉让出所占学校土地。二是，解放前，官氏家的私有土地，和一天主教徒的地邻边，后来天主教徒欲多占，请神甫出面，官君亦欲找牧师出面调解，牧师说：“我不便出面，以免造成宗教冲突。”最后，还是由官氏自己出面，与对方协商，圆满解决。

再者，官氏乃民不受封建礼教和传统思想的束缚，主张男女平等，蔑视权贵。他心志坚毅，百折不回，为办好医院和地方上的卫生事业，贡献出了毕生精力。

1990年7月3日

补　白

济生医院院长官天爵先生雅正

王明怀

先生之术，超卓精奇。
道擅歧黄，技贯中西。
方能回生，功可起死。
济世活人，医道宗师。

我的父亲金兆平和福民医院

金士庵

我家祖居台儿庄镇金庄村。到我祖父时，家里有土地80亩。祖父金文诚是个读书人，也应过考。父亲金兆平，字晏清，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生，也跟着读了几年“之乎者也”。祖父去世后，父亲继承了家业。

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盗贼到处打家劫舍。当时，只要能吃起一碗饭的人家，都是土匪、马子光顾的对象。官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年，我父亲被当地土匪绑架到了台儿庄东北一个小庄上，土匪就向我家中勒索钱，我家一时凑不足那么多钱，我父亲一直被扣住不放。十多天后，我父亲趁土匪看守懈怠，瞅准机会逃出了虎口。父亲回家后，看看在乡下呆不下去了，于是全家迁到了当时还有城墙、城门的台儿庄镇。那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这些情况，都是后来从父亲的闲谈中零零星星听来的。

父亲是个爱动脑、好钻研的人。他常说，人不可无一技之长。当时台儿庄的金家，只有一个手艺人，叫金开祥，是个漆匠，还绝了后。于是父亲想当一个有手艺

＊金士庵，台儿庄镇繁荣街人，黄埔军校第16期学生。

的人。那时的小城镇和广大农村，西医治病尚未为当地群众所接受，而中医、中药又十分缺乏。父亲看准西医必将普及于中国广大城镇和农村，于是在全家搬到台儿庄不几年，便毅然离开家乡，到峄县瑞门德医院去学习西医。

由于父亲进的是基督医院，我6岁也入了台儿庄基督小学（在现在的台儿庄镇西关小学）。年余，全家迁到了峄县，住进了瑞门德医院，我接着入了峄县基督小学（在瑞门德医院一侧的一个单院里）。

峄县瑞门德医院，以美籍德人名字命名，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医院，地址就是现在的枣庄市师范学校。初办之时，医院有一个美国人孔大夫。到我们搬进医院住时，瑞门德医院已经初具规模，求医者不绝于途了。我去的时候，开头仅认识一个傅大夫，我父亲称他为傅老师，还有一位于大夫，他们二位常坐门诊。

那时的学徒，每天除了上课，还要看病，边学边干。虽然他们还只是学徒，但是由于当时缺少医生，所以求他们看病的人仍然很多。不过，由于学校是初建，学徒们为建校也付出了一定的劳动。他们要干一些勤杂活。医院的外国大夫是很严厉的，学徒们稍微怠慢一点，就会遭到大声喝斥。峄县土楼河村的吴修怀学徒就曾遭到喝斥。我父亲有一次去搅辘轳打水时，不慎被碰歪了一颗门牙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战乱频仍，社会极不安定。当然医院也不能幸免。一到打仗，附近的群众就会成群结队地拥进医院大楼底层避难，有时甚至有驻军，

因而医院的正常业务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从我们全家离开医院，到“七七”事变，医院已数易其主了。全家迁回台儿庄之时，我的小学还没有上完，我又回到台儿庄基督小学。不久，父亲也学业期满回到了台儿庄，旋即领到了毕业证书。

父亲回台之后，即着手医院开业前的筹备工作。民国十八年（1929年），福民医院正式开业，最初在丁字街口租了一间屋，后来又在繁荣街中段路南、现市管所隔壁租了两间屋，并添置了药架和柜台，挂上了“台庄福民医院”一米多长的小木牌。父亲是坐诊和出诊并举，随来随看，随叫随到。由于西医外科轻伤治疗过程清洁而又简单，而内科又省去了煎药的麻烦，于是引起了群众看西医、吃“洋药”的兴趣。

经过数年的积累，加上土地等其他收入，我父亲买下了繁荣街中段路南现台儿庄酱园店所在的房产。此房产占地3分1厘，有门面3间，后楼3间，东西配房共7间。东配房1间作为临时病房，平时只留下一两个至亲好友的病号暂住。门口挂上了白底黑字的“福民医院”的横匾。为了解决医药来源，我们在上海四马路中西药房入了股，在民谊药厂也有一股（每股多少钱我不太清楚，股票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被付之一炬）。这样，只要将所需药品开出清单寄到上海，药厂和药房就会按时如数发货，待闲空时再付款。

福民医院越办越好，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我父亲只好减少出诊次数，增加坐诊机会，并先后招收了两个学徒工。医院当初还在现在的市管所地方开办时，有一位

姓杨的，不知为何方人氏，因不慎被驴咬伤，来医院治疗。伤好后，经洽商留下帮了一年多的忙。另一位学徒叫许文彬，乳名潘儿，邳庄乡小集子村人，与我家是表亲。因割草割了手，血流不止，来此医院治疗了许多天。后来，伤虽然治好了，但不能握拳，于是就留下来看门，我父亲教他处理一些外科轻微创伤，并让他帮助销售一部分成药。这位表亲在此干了五六年，直到“七七”事变前夕才离去。

我父亲医术全面，内外科兼治，态度和蔼，服务周到。平时有些没有钱的人来看病，或者小小不然的包包抹抹，也就免收费用。因而福民医院得到了各界人士和当地群众的赞许。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峄县台儿庄商工农学界给福民医院送来了两块匾，黑底金字，一块写着“济世活人”，另一块写着“青囊初展”。我当时还穿上长衫，跟着大人向匾行了鞠躬礼呢！可惜，这两块匾在生活困难那几年卖掉活口了。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的先头部队已过泺口桥。我由滕县弘道院回到台儿庄，旋又离家投考了黄埔军校。上海失陷后，医药的来源也中断了。1938年春，大战的气氛已笼罩着台儿庄地区，人们纷纷准备逃难。我父亲带着剩下的药品和生活用品，携家带口逃到了邳县范墩一个亲戚家里。台儿庄大战之后，台儿庄城变为一片焦土，我家的后楼也毁于战火。父亲回来后，重整家园，再理旧业，但福民医院已元气大伤，困难重重，经过多方奔走，勉强开业，仅能维持数口之家的口腹而已。

不久，父亲脑子患有疾病，只好停下来专心休养。1947年冬我从部队回到家里的时候，家中的余药已经用光。对于来治病的患者，我父亲只负责看病、开处方，叫他们到别处购药，我们连诊断费和处方费都不收。

1948年11月，台儿庄地区解放。翌年8月，福民医院并入兰陵县卫生院。我父亲被调到滕县，又调至济宁，后辗转回到台儿庄，再调苍山县医院。在苍山县医院工作期间，我父亲最后任主治医师。“反右”时，我父亲被下放到卞庄镇卫生院。

父亲经过几十年的行医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将一些药理、病理编成顺口溜，便于记忆，并把它装订成册。只可惜，这些宝贵的资料，经过“破四旧”，已荡然无存了。他在苍山县医院和卞庄镇卫生院工作，我平时去看望他时，经常见他的诊断桌前，前来找他看病的人排着长队。我见他忙不过来，便帮他誊抄处方。父亲精于西医内外科，并且将中西医结合起来治疗常见病，效果显著。有一个治疗咳嗽的验方，就是中西药并用。西药服合梅素，成人一次服2片，小孩一次服0.5—1片，日服3次；中药为川贝、前胡、橘红，各1—2钱或2—3钱，酌情加减，清水煎熬，日服3次，效果颇佳。我下放在彭楼乡插花庙村时，也曾给病人试用过此方，未见不良效果。

我的父亲金兆平终因年老，抗不住“文革”的风暴，1969年11月患脑溢血病故于台儿庄，终年75岁。

1990年7月

宋东甫先生事略

屈振恒　资料　孙启荣　整理

宋公东甫，山东省峄县人，生于民前二十一年（1891年）九月二十七日，初名文范，后名文明，字东甫，以字行。世居城南许阳乡旺庄。旺庄分三部分，南端为前旺庄，亦称前马家；北端为北旺庄，亦称后赵家；中为中旺庄，亦称腰里黄，即先生出生地也。

先生之令曾祖父广远公，曾祖母胡氏，世代业农。广远公生性淳朴，谨言慎行，好善恶恶，是非分明，慷慨好义，常有舍己助人之举，深受乡人所尊崇，更为一乡之人望。令祖父凤桐公，令祖母咸氏，富有家风，尤为重视子女教育，故令尊翁玉美公得饱读诗书，为乡儒之翘楚。玉美公字蕴香，令慈赵氏，为西河泉村赵文运府君之爱女，淑娴温和，相夫教子。蕴香公耕读治家，笃信天主，恪守礼法，持正不阿，为乡里之重望。蕴香公尤重教育，对子女之教育不遗余力，为筹学费，虽典

※本文和《悼念先师孙业洪先生》、《大陆撤退前后流亡学生收容就读来台经过》，系台湾出版印刷，略有删节。

卖田地亦在所不惜，故先生得受完美之教育，其来有自。

先生9岁入学，由蕴香公亲自送入村南之三义庙私塾就读，启蒙老师为张鲁出先生。张先生，字希曾，为村西张家堂人。就读一年，张先生辞馆，改聘李庆云先生任教席。李老师，江苏铜山（徐州）人，徐峄相邻，李老师家居李山前，距旺庄仅二里许，为隔邻，且为蕴香公之同窗好友，宾主感情融洽。塾学在三义庙又一年，即将塾馆迁入先生家中之后堂为塾学。李老师与先生家，更为通家之好矣。李老师教学认真，对先生之课业督导尤严，故先生之国学基础甚为深厚，虽在晚年，幼读之经书犹能背诵如流，李老师之教导实深为功。先生在家中塾学攻读至17岁时，至竹古山唐家学塾就读，旋入天主堂小学，越年考入峄县县立高等学堂，至民国二年（1913年）毕业，翌年入县立单级师范讲习所。民国三年夏赴济南投考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当时本县公学毕业同学，同去投考者众多，而录取者仅先生一人而已。民国八年毕业后，即在师范附小任教职，并兼办文书业务。九年春经人介绍至滕县鲁家寨私立小学任教职。十年秋回济南市私立育英中学任职，十一年春回峄县，任母校峄县县立高等小学校长，至十四年春辞职。

先生于十四年春辞卸校长任后，即入枣庄卷烟特税局任职税务员，当年秋调临城(今薛城)卷烟特税局。十五年秋经殷晦轩、孙怡仁先生介绍参加国民党。是年秋改任台儿庄船捐局局长。当时军阀肆虐，盗匪滋生，家乡混乱，乃举家迁入台儿庄居住。十六年峄县党案发生，先生乃弃职奔走革命，潜赴济南活动，又至枣庄北

山里组织别动队。时革命军北伐至峄县境，与别动队联系，革命军自八义集由南而北，别动队自山里由北而南，夹击军阀张宗昌部。张军大败，撤退济南。惜宁汉分裂，革命军南撤，鲁南失据，别动队退回山里潜迹暂避。先生乃返家乡隐迹待机，并抽暇教导时在省立铜山师范读书之三妹文贞研读诗文。

十七年春，先生和殷晦轩先生同赴徐州，寻机投效革命。适革命军北伐抵徐，经孙怡仁先生之连络，乃入第四军十一师政治训练处，为宣传科科员兼宣传队队长。彼时军长廖培南、军政治处主任冷欣、师长黄镇球、宣传科长严泽元，俱为一时之名将、革命之先进。参军后即随部队进军鲁南，转战兖、滕、邹、汶一带，历经艰险，近迫济南。因逢“五卅”惨案，革命军为顾大局，避免与日人冲突，乃绕道北伐，过德县，直指北平，乃完成革命北伐之任务。

北伐完成后，军队整编，政治训练处裁撤，政工人员各予资遣，愿返乡者准复原职；愿继续留在革命阵营者，返回南京，投考军校，再受革命洗礼。先生乃往南京考入军校六期政治科，五月参加国父奉安大典。十八年二月，是年中央举行国军编遣会议，军阀抗命，乃有中原之战。冯阎败服后，中央为安抚地方，使民众了解国策起见，乃就中央军校政治科遴选优秀同志20余人，由教育部派高淇冰先生领队，前往河南宣传。先生获选同往，历经开封、郑州、洛阳、临汝、南阳、信阳等至武汉，稍作停顿，即买棹东下。十九年二月返抵南京，半年之间，深入中原，遍历乡间，广作宣传，完成收揽

民心任务。抵校之时，军校研究班已经毕业，校长蒋公准予免试毕业，分发工作。先生奉命派往上海特别市党部任职，一同奉命者尚有陶一珊等5人，当即谒见主任委员吴开元、委员陶百川等，分派至民众训练委员会工作。深入社会各层，组训民众，献替良多。然先生素性淳厚，矢志教育，对十里洋场之龙蛇混迹，灯红酒绿，纵横捭阖之社会，复杂之生活，殊难适应。适济南师范校长蔡自声先生，谆谆敦聘先生前往帮忙，先生因可遂从事教育之夙愿，且济师为母校第一师范之后身，得返母校服务更所欣慰，乃即应聘。于民国二十年八月辞聘离沪，九月初抵济南，至济师就任为党义教师兼训育员（后任训育主任）。是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人侵占东北……各地学生纷纷要求到南京向中央抗议政府软弱，呼吁起兵抗日。中央乃准学生进京，惟请各校约束学生遵守秩序，勿中人圈套，酿成不轨行动。于是各校到京请愿学生代表之领队责任，益形重大，各校大多为校长亲自领队，时先生代理训育主任，蔡校长遂请先生为济师领队。先生肩负重责，领队晋京。幸以先生之德望，处事之得宜，到京请愿行动未生枝节。在京完成请愿运动后，即由先生率队回校，平安顺利，乃先生之力也。

二十一年暑假，济南第一师范蔡校长自声请辞，由烟台于大川先生接任，先生也请离职，就职兖州乡村师范任教，越一年，复转往济南私立育英中学服务，至二十五年二月，又回母校济南第一师范任训育主任旧职，至是年秋辞去，就职于山东寿张乡村师范学校 训 育 主

任。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爆发，揭开抗战序幕。蒋委员长发表庐山谈话，阐明抗日图存救亡求胜决心。日军攻下天津，轰炸济南，进侵山东。寿张乡村师范亦受到日机轰炸，于是学校乃暂时迁往河南岸之梁山，不久教育部命令山东中等以上学校南迁，寿张乡师高秉然校长经研商后，请先生率学生先行，校中辎重随后，先生乃率学生南行。为行动方便计，乃将孔氏夫人送往娘家，并至家中向老父告别，携带长子治安追上学校，同至许昌。时山东流亡学生集中许昌者，约五六千人，甚多学生激于义愤爱国之心，投考军校。至二十七年初，学校又奉命西迁。先至老河口稍住，宋夫人李氏率女治梅、治蕙自故乡赶到，家人得以团聚。在老河口20余日，学校乃迁往湖北省均县、郧阳县分别设校，先生所属师范各生在均县，高初中部在郧阳。往郧阳者曾发生沉船事件，在均县者无恙。学校在均县草创设立，约半年，武汉告急，国府迁都重庆。学校乃奉命迁川，于是决定学生步行入川，沿途设站，分批前往川北集合设校，校中仪器物品及教职员眷属，生病学生等，必需以船车运输。抗战时交通不便，运输工具更形简陋。入川必先溯汉江，再经栈道，二者俱属天险之途。且鉴于年初沉船事件，对领队押运任务，莫不退避，不敢担任。学校乃公举先生负责。先生乃毅然承担运送重责，率领眷属、病生，押运辎重。先乃雇船队溯汉江而上。汉江乃穿山越岭，水急滩险之恶水，步步惊心。赖先生筹划领导，妥善之处理，千里水程惊险中顺

利渡过。至南郑舍船就陆，改雇马车运输。首先要越过栈道，栈道天险，李白曾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句，其危崖断涧，惊心动魄之处可想而知。先生肩负巨任，步步小心，领导车队，照顾眷属，安然越过天险。途经栈道之时，爱女治蕙所坐之马车颠覆崖下，幸治蕙早先因不忍拉车之马上山太累，先行下车步行，逃过一劫，一念仁慈，信有善报，亦属天幸。度过栈道，又经剑阁天险，乃抵川北梓潼设校之地。数千里运输，涉恶水，履天险，生死常系于一发之间。幸赖先生之领导处理，历经艰险辛苦，费时半年，卒圆满完成任务。抵校之时，曾受全体师生之盛大欢迎，甚受敬佩。

学校在川北梓潼正式设校，即国立梓潼师范学校也。先生仍任训导主任，直至抗战胜利。胜利后，先生应家乡父老恳恳相邀，乃返岽县筹设县立中学，于三十六年草创，设校于鲍家故宅（俗称鲍家大院——鲍家为县巨富，时已避难他迁）。在物资缺乏之下，先生乃一一克服，举凡校具仪器，聘请教师，筹划校务，莫不躬亲事务，克服困难，筚路蓝缕，开创教育，校务日上，学生日增，烽火边沿，弦歌不辍。惟战乱日逼，学校乃迁往运河南程家庄继续教育。复于三十七年，徐蚌会战前夕，华北风云紧急，先生为避免学生失学，为国家保存元气，乃又率全体师生千余人南迁，再度负起带领流亡学生迁校，为国家保存精兵，为青年创造前途之历史使命。学校初至徐州，继在扬州（瓜洲）稍住，即往湖南郴县栖凤渡李家大屋设校，是为国立济南第四联中第二分校。先生仍任校长，带领师生于流亡中继续工作。

在此国家危难，社会混乱之时，先生既为学生生活安全费心，又为设校及甚多前来投效之教职人员安排，乃能维持千余师生之正常生活及教育，用心之苦，费神之巨，可想而知。

三十八年，学校乃与山东其他联中共8校来台。学校至澎湖时，年龄稍大学生俱集体成军，所余幼小男生及女生等，初设澎湖防卫部子弟学校，后迁台湾彰化，设国立员林实验中学（现改为崇实高工）。来台之初，学生成军，8个联中所余幼小学生及女生设为一校，大多数教职员均各自谋生，先生乃离校，幸爱女治蕙及婿栾明新先生时在屏东，乃往同住焉。先生离校后，经昔时同事友人、时任台湾省警务处长陶一珊先生之介，至屏东县警察局任职。至民国四十四年，乃应省立台东女子中学之聘任教师，而迁居台东。民国五十三年，因年高退休。退休后以写作自娱，曾有回忆录4册。时时往返于台东次子治华与屏东三女治蕙家，含饴弄孙，与故旧交游，老境亦颇顺适。

先生早年循家乡习俗，于16岁时结婚。李氏夫人为先生塾师李庆云先生之族侄女，因见先生幼时聪慧忠厚，乃为之执柯，李夫人于抗战时病逝于四川梓潼。孔氏夫人，曲阜圣族之裔也。续娶吴氏夫人，四川人士。先生有子女数人，长子治安病逝四川，长女治兰适陕西阎毓琇君，都已去世。其子宋安阎（阎瑾诚）居住在先生老家旺庄。次女治梅已去世。现在台者有女治蕙，国立德阳师范毕业，适山东栾明新君，栾君服务空军（药剂师），均已退休。生二子、二女，俱成长，现均在美。

子治华，员林实中师范部毕业，媳蔡美华，生子光宸（安东）、光廷（安亿）、光武（安邦）、女佩。次子治屏，现服务于《中国时报》，媳郭裕美，生女光玉、光婷。先生之妹文贞，徐州师范毕业，适卞景文君。

先生身体一向健康，无不良嗜好。有时抽支纸烟，并不太多；偶尔小酌几杯，绝不至乱。生性豁达淳厚，与人无争，虽处逆境，而不乱志，均能乐天知命。至民国六十二年，已届八三高龄，健康仍佳。六十三年（1974年）一月，即旧历六十二年腊月二十七，偶感不适，曾至台东医院，请经常为其检查之医生诊治，医生尚说身体很好，一切正常，只心脏稍弱，系老人常有现象，乃予注射及服药，返家休息，翌晨治华问候，感觉尚称“很好”。治华乃往冲牛奶予先生，先生坐在藤椅上等待。及治华冲好牛奶返回，见先生垂首坐于椅上，呼之不应，乃溘然长逝矣！享年八十有四，无疾而终。长者仁人，谢绝尘寰，遽返道山。子女、亲友、学生、故旧为之治丧，遵先生生前遗嘱，以为台东太远，希望能葬于接近学生故旧之处，故葬于屏东县长治乡长治公墓。

综观先生一生，出生耕读之家，为我国传统之忠厚人家，世世耕读相传之家庭。先生生性聪慧，读书颖悟，淳厚忠诚，矢志教育，尤爱青年学生，两次率领学生随政府流亡，为国家保存元气，培育精英，为青年创造前途。现在在台学生多人甚有成就，均拜先生之赐也。先生尤热爱国家，一生献身教育。从其回忆录中可见其忠党、爱国之情，跃然纸上。积善之家，必有善

报。先生一生为国家、为故乡、为学生竭诚尽力，造福无穷。现在在台师生，莫不感先生之恩，受先生之德，沐先生之泽。先生平时恂恂儒者，自不矜伐，而春风化雨之情，岂待言哉！先生临终犹不忘嘱治蕙、治华诸子女："吾峄青年可爱，前途远大。"并嘱"葬于易于接近学生故旧之地"。其爱乡国、爱学生之情，天高地厚。长者长逝，风范永存，德被学生，累世而不朽矣！

（台湾"宋公百岁诞辰纪念筹备会"）

补　白

偪阳城怀古

季茂龄

一带土堵说偪阳，
古城旧迹费参详。
力托千钧声名重，
事传列国姓字香。
前朝古代浑如梦，
桑田沧海意感伤。
遗迹难觅没荒草，
到处喜见豆稷黄。

鹏志初展　英华早谢

——王化远先生事略

马福同

王化远，字明渠，回族，台儿庄镇顺河街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生。

其父王廷贵，船工出身，旅居南京，嗜好养鸟，偶遇清道台之子要买他一只画眉。王即无偿奉送，由此得到道台的好感。道台为偿还他赠鸟义举，即赠他大船一艘，任命他为运粮船帮第三帮帮头。后王廷贵屡建功绩，又被封为五品衔运河监运官。

王虽受封显爵，却不忘船工之苦。他对待船户宽厚仁义，所有船户没有不得到他的借贷和周济的。在他临去世之前，将所有借贷户全部请去，当面焚毁借据，永不再要，大有冯谖薛国收债为孟尝君市义之概。

王廷贵返里之后，处世忠诚，乐善好施，仗义疏财，专好为人排忧解难。当时，台儿庄南关和北关曾有

＊马福同，回族，江苏省邳县邢楼乡史庄村人，原籍台儿庄镇北关，曾任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回民排排长，现退职在家。

张、白两姓因一人命而引起恶性讼争，经多人调解不下。王廷贵慷慨出资千余元，为这一非正常死亡之烈女，在运河南岸闸上修建一座石碑坊，厚礼埋葬了死亡人，使这场恶性讼争化干戈为玉帛。他还曾为南大寺捐资建造了大殿、讲堂和水房。他的夫人沙氏也堪称有德、有识之人，用自己的积蓄，为该寺购买大石柱4根，现仍完好。台儿庄顺河街回族人民至今不忘其恩德。

王君化远昆仲4人，本身行三。长兄化平，继承乃父的船运业，死后无嗣。次兄化清，常居台儿庄，以农为本，兼营茶食和酱菜。原继承的土地，在解放前3年变卖已尽，只好租种他人的土地。他待人和善，处世和气，因此，建国后虽经历次政治运动，却从未受到过冲击。四弟化申，从青年至老年，一直做邮电系统的领导工作。初在邳县官湖、浦口任局长，中调南京为邮务佐，解放时在上海邮电局任邮务佐。后离休，1985年逝世。

王君化远幼入家塾，攻读“四书”、“五经”，历经10年。本可赴县应考，适值母丧，未能成行，痛失求取功名的机会。王少有大志，放眼社会，笃信伊斯兰教。约在民国四年（1915年），在交通艰难的情况下，他长途跋涉，步行数千里，赴甘肃省现在的张川回族自治县伊斯兰教圣地宣化岗朝拜。当时，全国各地前来朝拜的穆斯林有10万之众。他曾发表了一次爱国尊教的讲演，受到了朝拜人的拍手称赞。

当时，西北宗教界的重要人物、也是政界的要员马福祥，也由宁夏来此朝拜。马发现王的演说激昂慷慨，吐辞不凡，知道是一位有知识的人才，对他给予很高的

评价。后经宣化岗宗教负责人、人称马三太爷的从中介绍，马福祥任命他为机要秘书。由此，王君化远从一个普通青年，平步青云升为参议要职。在马福祥先后任北京西北边防办主任、南京边防办主任、青岛市市长和安徽省省长等职的15年间，王化远一直紧随马福祥，为最亲密、最信任的机要秘书、参议之要职。

王化远熟读经书，知识渊博，尊古孝贤，性格耿直，为政清廉，爱民如亲，工作大胆，机智多谋，深受领导和老百姓的爱戴。

他重视教育，尊重人才。他和知识界著名人士褚庆远结为朋友，创办了台儿庄第一所学校——兰陵书院，他两次共捐资银元700块建校，书院门前原文昌阁有碑文记载。他跟随马福祥的第一年曾回台儿庄，看到回族儿童大部失学，心里很不是滋味，便主动与南大寺教长展阿訇协商，利用清真寺房舍，办起了穆民小学。他出资购买校具，使数十名回族儿童得到了学习的机会。

他胆识过人，善解纷难。马福祥被委任为安徽省省长（为省长制第一任），这要从军阀陈调元（当时称省督办）手中接任。当时，马福祥不敢到任，王即自荐先去协调接受移交。由于他胆大心细，随机应变，不到两个月，便使马福祥顺利地上了任。马福祥在任安徽省省长时，安庆市有一家工厂的工人与厂方发生了纠纷，当时称为工潮。马福祥又委派他去参加协调工作。他冒着暴风骤雨前往。经过协调，工人的待遇增加了，这次工潮也很快地平息了下来。民国十二年（1923）发生了震惊中外、惊动朝野的临城（薛城）劫车案，它直接影响

到国家的声誉。他曾同峄县、枣庄士绅李陵阁等多人，坐飞机到抱犊崮，与土匪头子孙美瑶洽谈，最后洋人得释，国家安定。

他孝敬父母，周济穷人。母亲病重，他曾割肉熬药。在他父亲去世后的1928年，他在南京雨花台为其父立墓碑一块，马福祥亲为题词。他遵循父教，继承父志，待人友善，周济穷人。他有一本家，男人不幸病逝，留下孤妻寡女。他同夫人商议，将这母女俩接家养活，母老葬送，女大嫁出（时年29岁）。他每次从外地回家，贫穷亲友前来看他，他总是分别情况，馈赠银钱，临走时还要留下银钱，让他们买些粗粮豆饼度日。如有生活困难者，即为接济。得到接济最多的有顺河街褚敬才等多户，运河南张庄汉民也有很多。

他回汉百姓，视同一家。他和汉民褚庆远、王庶平等人都很友好。台儿庄的回、汉民曾发生过一起较大的纠纷。汉民胡小鲁要搞驮捐一行，要减少老粮食摊子回族人民的收入。胡曾调动了当时的军阀六旅的部下，枪杀了回族马友艾等多人。到县里打官司，数日不下，最后经王化远调停，双方终于取得谅解，从而避免了流血事件的再发生。世人称他“公道老”，能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他为政清廉，不事挥霍。所得资金，除了自己花销，就是周济别人，根本无什积蓄。1930年，马福祥在任安徽省省长时，意欲派他任芜湖市市长。由于他缺少款项，没有能力活动，致使这个显缺一拖再拖，不能实现。有唐可三者，以3000块银元送给马福祥之子、宁夏

省主席马鸿奎。马鸿奎便给其父一信，信上说：“王化远为您左膀右臂，不可须臾离开。”马福祥听了他儿子的话，就派唐可三当了芜湖市市长。

王化远因无银钱，被人夺去前程，气炸肝肺，滞气忧虑，一天天加重；加上他在去安庆调解工潮时淋雨受寒，从此一病不起，不能继续坚持工作，只好回家调养。不数月，医治无效，于1931年6月5日逝世，终年只有39岁。这位才华横溢的回族优秀人物鸿志未展，便不幸早逝，实在令人痛惜。上文提到的、曾受过他收养周济、现年91岁高龄的王刘氏（现在台儿庄镇福利院）说：“王先生是一位正派人。他大人不大，小人不小，叫人佩服。”

王君化远，有四子、一女。长子士杰，曾任国民党七十二军上校团级军官，1948年去台湾，时时不忘故土，于1988年回归大陆，现住邹县矿务局其女家中。次子士仁，青年时曾在邳县官湖镇读书。据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做地下工作，1938年被害。三子士信，曾在贾汪邮电局工作多年，现退休在台儿庄当个体户，经营小百货。四子士伟，1945年始任职于贾汪邮电局，现已离休，闲居贾汪。其女士价，在贾汪从教，现退休。

王君化远共有子侄13人，其中为共产党服务者9人（其中1人为党牺牲），任国民党军官者1人，为农兼商者2人，现居美国者1人。

1990年6月1日

老道王士贤与黄龙洞贫民义学

吴庆华

1935—1941年间，抱犊崮山区黄龙洞内有一所特殊的学校，称为“鲁峄北黄龙洞贫民私塾义务小学”（简称“贫民义学”）。这所学校的创办人是老道王士贤，他教学生读书识字不要束脩。王老道创办义学于民族危亡之际，一生艰苦创业，义学发展到4处，学生多达300人，90%是贫苦农家子弟。现将我与史贵军走访黄龙洞周围群众和老道的学生李瑞珍、朱凤梧、王继周等人所获取的资料，综合整理如下。

王老道的身世及其办义学的动机

王老道俗名王开贵，1898年生于峄县薛庄（今属台儿庄区薛庄乡），世代务农，有地110亩，家境小康。幼时在本庄私塾读书七八年，略通文墨，随后耕读于乡里，为人耿直、好善。30年代初，他弃农经商，卖地买船，落脚台儿庄。生意只做了一年，本钱蚀了一半。父母怒目，家人抱怨，邻里讥笑，说是书呆子办不了事。王也觉亏了本钱，败了祖业，愧对先人，于是卖了船，在

---

*吴庆华，现在枣庄市教育局史志办工作。

孙苏庄（今属薛庄乡）买了60亩地，决心在台儿庄做小本生意，把本钱捞回来。他换过香油制过醋，赚大钱谈何容易，只能糊个嘴。富家的门槛他进不去，倒交了不少做小买卖的朋友，镇上人嫌他书呆子气，喊他“王迂磨”。

这时，台儿庄有个同善社，是讲因果报应、劝人行善的迷信组织，印有《暗室灯》、《宣讲时议》等劝善的书。王看了这些书，深觉有理，他认为自己就是因为争名逐利，结果名没争来，利又失去。因此他看破红尘，也没拜师父就簪起头发，当起老道来了，并取道号“士贤”，表示立志做一个劝世行善的道士中的贤人。他和玄帝庙的孙道成老道一起住，一起拉善棚劝善。别的老道劝善，要收钱糊口；王士贤劝善，却要往外搭钱。为了拉个大棚，他自己凑出20块银元；为了吸引听众，他包了茶水摊的水。为劝善倒贴钱，把其父气病了，不久父亲就去世了。

父故世后，王老道更放胆做他的劝善事业了。他尽管讲得口干舌燥，听众无非听个热闹，于是王又悟出一番道理：世俗人之所以听不进自己的金玉良言，是因未受圣人之教，因此他就在玄帝庙办了个义学，去收附近做小买卖人家的孩子上学，早来早教，晚来晚教，不拘形式。但是未教几天，当时台儿庄镇教育副会长郑典三就来干涉了，理由是：韩复榘主席有令，“取缔私学”。王老道不买他的帐，教孩子们说：“再来罗嗦，你们就撵他走。”于是郑典三怒气冲冲地向县长刘华亭告了状。刘华亭传讯王老道，王说：“我办的是义学，

怎能算私塾？”刘华亭语塞，只好说：“你这老道，要办学，就上黄龙洞办去，在本县四大镇（韩、枣、峄、台）不准你办。”刘以为黄龙洞地僻人稀，办不成学。可是倔强的老道不怕艰苦，于1934年冬与孙老道一起到了黄龙洞，不久就办起了这所贫民义学。向当时县政府注册时，被定名为“黄龙洞贫民私塾义务小学”。

艰苦创业，贫民义学初具规模

王老道在黄龙洞办学有山川之利。此洞座落在熊耳山，分前后两洞。前洞宽20余米，高10余米，长40余米，地势平坦，足可容一二百名学生住宿与学习；后洞稍小，且须经过10来米的甬道，里面漆黑，但到寒冬，此洞温暖如春，让学生秉烛以读，如临福境。

这里山不高，路很陡，洞前的一段陡坡，一般人上不去，离洞最近的村庄——毛宅也有二三里地。因此有钱人不送子弟到荒山野洞来上学。可这义学受到附近数十里贫苦农民的欢迎。在山区，有文化的人很少，农民求人看一封信，也要跑十里八里。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推行梁漱溟的乡农教育。农民在乡间只能上一年学，若要再上学，就得离家到城镇去，花费太大，只好辍学。黄龙洞老道办义学的消息，不径而走，临、滕、费、峄的不少山村，都有学生来学习。

学生一多，吃住便成了问题，特别是喝水更为困难。开始，王老道让学生下山抬水，但坡陡难上，易出危险；后来王老道又拿自己的钱买了一头毛驴，觅人往山上驮水。抗战时期，老道把母亲、妻子、弟弟、二

子、二女共7口都接来了，学生又增到120名，下山驮水不行了，王老道便在后山挖泉眼，用毛驴把水运到山顶，山顶埋上一口缸，打上眼，接上水管，直通洞前，吃水问题彻底解决了。王老道亲自带头挖泉眼，攀悬崖，架水管，学生无不受感动。

烧柴问题，则发动学生和家长解决。每到秋天，王老道将熊耳山荒坡划成片，让学生和家长来割，都集中到洞内以备一年之用。这荒坡原是墓地，有来放牛的，老道就劝阻。毛宅有个放牛娃来放牛，老道说了几次不听，就向放牛娃下拜，真个把放牛娃给拜走了。这办法对从满山头来的就行不通了。满山头高家是土豪，故意叫人赶牛到黄龙洞来放。老道出来干涉，就派人来打，幸亏学生人多，未叫老道吃亏。以后高家送孩子来上学，老道就是不收。务家后有名的恶霸汉奸梁继箴几次要送儿子来，被老道以山洞生活艰苦为借口给挡回去了。

学生的生活确实是很艰苦的，睡的是地铺，吃的是背来的瓜干煎饼，有的还掺着糠，每人每月交5斤杂粮烧汤喝。课桌是各户带来的。灯油也是凑钱买，一月一结算。

老道的生活全靠化缘来维持。他化缘跟别人不一样，出门时，随身带一把铲，路上见到尸骨就埋。到了庄头，把10个牛皮纸袋子往10户人家门前一挂，然后讲“道”，讲完收袋子。每家都往袋子里放点干粮和煎饼，如放两个煎饼，王老道就退回一个。1940年，王老道得了重病，后来虽然病情好转，但身体虚弱。学生不

愿意老师再出去化缘，大家商定，先生的伙食由学生轮流负担，每5天一换。到这时，老道才吃到新鲜的煎饼和蔬菜。

就这样，师生共同艰苦奋斗，互相关怀，解决了生活问题，人员有增无减，学校规模日大，成为抗日初期抱犊崮山区唯一的学府。

不怕挫折，贫民义学进一步发展

抗战后，国民党四十军庞炳勋部，于1938年2月占领了黄龙洞，作了后勤仓库，强迫王老道搬迁，黄龙洞贫民义学被迫搬到西坡的5间棚岩洞内上课。岩洞只有5间茅棚那么大，还不挡风寒，学生大半走散了，只剩下几个高足弟子坚持学习。气得王老道连夜写了3000字的呈文，告庞炳勋，还向国民党中央拍了电报。

国民党军队在黄龙洞内折腾了半年之久，王老道也在山西坡煎熬了半年，有时在岩洞，有时在破草房坚持上课，义学总算没有被挤垮。1938年夏，闻国民党军队要撤离，王老道忙到黄龙洞前。庞炳勋的副官把王老道叫到河滩上，指着放在地上的10来支枪和6袋面粉说："多日来打扰了，这些东西是庞军长送给你的，收下吧。"老道连忙摆手说："不要，不要，我办学用不着枪，吃饭自有施主管。"军队走后，这些枪支被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司令梁继璐的人搬走了，面粉也被当地人弄去了，老道没得到一点东西，黄龙洞也被国民党炸坏了。

黄龙洞被炸3天后，老道带领学生来清理废墟。因洞内死过人，有些学生不敢进洞。王老道却说："人死

如灯灭，那神都是泥塑木雕的，怕什么，跟我来。”王老道带头，家长也参加，几天功夫就把洞清理出来了，接着又挨村走访，通知外地学生入学。不到一年，黄龙洞义学又有120名学生，大有人满之患了，于是王老道决心到山外去办分校。

从1939年到1940年，王老道先后在周村的龟山窝、渴口的甘泉寺和他的家乡孙苏庄办起了3所分校。

办分校的办法是：一、利用各地的庙宇、公房作校址（孙苏庄的校址则是王老道的住宅）。二、轮流派遣高足弟子代理先生。这几年他已培养了二三十名可以做小先生的弟子，派谁出来就管谁的饭，没有工资。这些学生出身贫寒，当了小先生，顿觉脸上增光，都不计报酬，愿意干。三、有一套较成熟的教学经验，各分校照本校样子办。

王老道还打算把黄龙洞作为总校，专门培养师资，然后利用各地庙宇、公房，广设分校，一直把分校办到圣人府。

教学管理形式和教法

王士贤在教学管理和教学方法上，既吸收了传统的私塾经验（大课堂多级复式），又吸取了我国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主张（小先生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管理形式和教法。

一、按不同程度分组分段，大课堂的上课形式。

王老道把逐年招进来的学生都聚在一个大课堂里上课，按不同程度分为3级进行复式教学。低级为启蒙教

育，以《百家姓》、《山西杂字》、《三字经》、《千家诗》为主要教材，着重于识字、背诵和仿写的训练。中级以学“四书”为主，辅以历代散文和珠算。在训练上，除背诵和仿写外，还要理解文意，回讲课文。高级以攻读《诗》、《书》、《礼》、《易》为主，兼理古文和珠算，以自学、阅读参考书为学习的主要方式，要求能讲课文，能用文言文写作。每个级段又根据学习进度不同分为若干小组，每组3、5、7人不等。

王老道授课时间很少，主要是按小组布置学习任务，靠自学和小先生辅导完成。每天定时检查各组的学习情况，如发现有聪明好学、进步快者，可以调组。各段、组都没有固定的修业期限，以读完规定的教材为升级标准，故能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做到因材施教。

二、充分利用层层督导的小先生制度。

王老道一个人教百余名学生，自己还常常出游，而课业不曾中断，主要是充分发挥学生的作用，使之层层督导，各负其责。这个学校的学生干部分为两大级：第一级叫代理（又名大学长），担任过此职务的有3人；又设副代理若干人，担任过此职务的有10多人，全系高级段的学生。他们除协助老道搞好教学、辅导中级段学生学习外，还负责全校学生的生活和接待来宾等事宜。老道出游时，由代理负责教学，他们还被派到各分校轮流执教。第二级叫监理（又名考查学长），也分正、副，约有二十四五人，全系中级段学生，负责布置与检查低级段学生的学习，并轮流担负全校的勤务劳动。

由于分工明确，组织健全，学生负责，有时老道出

游十几天，学校秩序也一点不乱，课程都按老道的安排进行。派到分校教学的正、副代理，更要独挡一面，这样他们在校期间就已培养了独立工作的能力。

三、以自学为主，统一面授的教学方法。

主要是让学生按照教师的要求，有计划、有步骤、有检查地自学，每天学习10多个小时，大多是背诵课文、书写、参阅资料。王老道对背诵要求很严，学一段，背一段，还要复习旧书，到读完全部经书，要背得一字不差。练字也有规定，大学生每天写小楷100字、大楷16字，小学生默写《百家姓》，写10个大字。珠算隔日练一次，小学生练打“单百子”，大学生练“九九飞归”。农村应用文如书信格式、婚丧帖子、春联，每周练习一次。

唱歌除八路军宣传队来教唱的以外，老道也能自编歌词，套上旧曲，教全体学生唱，如《童思十二曲》、《放学歌》等。

王老道每天上课2—3次，每次约半小时，全体学生都要听，讲课的内容为“四书”中的某一章、句，或者古文选读。王老道有说书的口才，讲得有声有色，助以手势，先讲故事，后讲原文，以疏通文字为主，不搞烦琐考据。所以即使对于刚启蒙的学生也有吸引力，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但是王老道对于课文思想分析，免不了要作些封建式的伦理说教。

四、层层检查，全面开花的考核方法。

黄龙洞义学对于学生的背诵课文和书写情况，每天有两个固定的时间进行考查。方法是老道先检查两个高

级段的学生（代理、副代理），然后3人一起去检查另6个高级段的学生，再由这9人去检查另外18个人的学习情况。这样层层检查，全面开花，仅用20分钟，就把全体学生背诵和书写情况检查完毕。这种检查方法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大大节省了时间，这在旧私塾教学中是看不到的。即使学业完成不好的学生，一般经过3次检查，都能过关。如不能过关，就由学生打屁股，大学生打6下，小学生打3下，仿字中写错1个字打1下。

王士贤的办学、处事观点

当学生问王士贤为什么这样专心致志地办义学时，他说："教后生识字是大好事，可以教人知礼。"学生问："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弟子三千，可是他还要束脩；而先生教那么多学生，连学费都不要，又图个啥？"王老道说："我是个出家人，不要名利，将来我能把义学办到山东各地，有成千上万的学生知书识礼，我的名和利就算都有了。"他认为："只有教育，才能强国富民。"他写过一篇评书，开头是：

言的是天下惶惶民不安，
天下的群雄各处起狼烟。
俗语云太平能生看家犬，
可叹在这乱世为人受熬煎。
到此时还要出兵去打仗，
简直是拿人命往火坑里填。
这几年朝令夕改民受苦，

广大的黎民百姓不团圆。

在黄龙洞内挂着孔子和孙中山两人的像，像两边的对联是王老道拟的。

孔子像两边的对联是：

讲仁义，取乎中而从之；

论道德，择其善而师焉。

孙中山像两边的对联是：

先师要言通现在；

先圣遗嘱贯古今。

两人的像和对联并排悬挂，外加对联：

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

横匾题词是：先后为法。

1939—1940年间，黄龙洞正处在敌、我、友三方政治中心的交点上：我边联县政府在黄龙洞西10里的王湾；国民党峄县临时政府则设在黄龙洞东10里的母猪窝；黄龙洞西南15里的半湖、徐庄有日伪的据点。王老道周旋于三方之间，不偏不倚，待之以礼。国民党政府搬来时，他向国府报到；我边联政府成立时，他专派学生去送贺信；日伪在半湖安据点，他写了一篇办学宗旨的呈文送去。

黄龙洞雄伟奇特，常有游人来参观，洞口设接待室，各方来客一律欢迎。1939年国民党游击司令梁继璐来过，给孙中山像题了“天下为公”四个字，还赠送给学生130套笔墨。继之，国民党峄县政府秘书李同伟也来了，送来了国民党的抗日课本，王老道都收下。

日军来扫荡，路过黄龙洞。王为了表明这里是学校，让全体学生大声朗读，声回山谷，吓得日军赶忙拉来了大炮，要炮轰黄龙洞，幸亏山下三清庙的李老道再三解释，才没遭难。日本人进洞如临大敌，荷枪实弹，而王老道让学生把抗日课本收起来，放在神龛中，然后照老规矩起立欢迎。日本人见读的是古书，没有发作，反而掏出笔来抄录了贴在墙上的《学规》18条。

日本军队以后再没有来过，而八路军干部和宣传队却是经常来。黄龙洞是我县政府到特委的必经之路，潘振武县长很注意这所学校，曾多次请王老道参加县参议会，并到黄龙洞参观，劝老道办抗日学校。八路军六八六团也曾到过黄龙洞，向老道宣传抗日道理，并让老道监视日军进山。如果日军从西路来，就到黄龙洞山后点一把火；如从东路来，就在山后点两把火。老道也曾两次在山后放火报警。老道在课堂上把日本兵称作“倭寇”，“贱踏我山河”。八路军宣传队来教唱抗日歌曲时，老道也是欢迎的，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都是八路军教的，对学生教育影响很大。有的学生家住根据地，要求参加抗日。如滕县徐庄的李华曾向老道直接提出要求，但是老道没答应。后来有20个较大的学生，因嫌大学长宋开德管人太严，暗地里拜了仁兄弟，准备一起投奔八路军，被老道知道了。老道对他们说：“你们要投八路军，我没意见，但是你们是由父母送来的，只要你父母同意，尽管去，没有我的责任。现在你们要逃学，犯了学规。”每人被打了板子，这事也就算完了。王老道曾对学生说：“现在你们人太

少，将来学校办多了，培养的人才多了，哪有不让你们参加工作的？”

1941年春、夏间，日、伪、顽合流，我根据地两面受夹，形势危急。毛宅的学生家长孙有让、孙裕元等曾劝老道：“黄龙洞离庄太远，出了事没人知道，还是搬到庄上办好。”老道不愿意，说：“黄龙洞一没有枪，二没有钱，我教我的书，他打他的仗，不碍事。”

王老道之死

1941年农历六月三十，王老道突遭枪杀。根据张锡钧、张忠良等当年的学生回忆，王老道被杀的经过是这样的：

六月二十九晚上，有来历不明的便衣武装来到黄龙洞，说是要看洞内的“黄龙”。王老道让值班学生张忠良端着灯引进去转了一圈，走了，老道毫没在意。三十晚上10点多，学生们都已入睡，只有值班的大学长宋开德和王老道还在看书，大门也没有关，从外面闯进来6个便衣武装，每人一长一短两支枪，走到王老道跟前喊道：“我们是徐庄（日伪据点）来的，要搜查八路，这里被包围了，谁都不许跑！”接着要老道领他们进二洞，于是老道让宋开德端灯前头引路，自己随着来人进二洞。这时，全洞的人都已惊醒，听见二洞内有枪声。过了一段时间，来人闯进了老道家属的住室。老道家属哭着说：“你们把我当家的弄到哪儿去了？”来人先不回答，把手一扬，一颗子弹从她发边擦过，吓得老道家属不敢出声。来人说：“老道在山下庙里，你家卖地的钱

呢？快拿出来！”老道家属以为要钱赎人，就把箱底储存的二三十块钱票都给了那人。那人一摆手出去了。另几个则吆吆喝喝地去检查学生铺位，没捞到钱，把象样的被单和衣服裹走了10来件。过了一个多小时，耿水的老头到后洞去察看，才发现被打死的王老道和宋开德的尸体。全洞人惊闻恶噩，哭成一团，没有能做主的。直到第二天天亮，山下学生家长上来，才用床板把师徒2人的尸体抬到黄龙洞西山下掩埋。

补　白

大　陆　纪　行

栗由思

去国离乡四十秋，
黑貂裘敝未封侯。
归来无限沧桑感，
悔不当初作远游。

悼念先师孙业洪先生

刘晓武

引　言

中华民国六十一年十月一日，孙业洪先生因病逝世，春秋八十整。先生终身坚持书生本色，爱国爱民，不争名利，谦逊守礼，终生献身教育事业，重孝悌之道。八年抗战，毁家纾难，抛妻别子，八十老母亦无法奉养，移孝为忠……抗战胜利，书生报国目的已达，即解甲归里，养亲教子，创办私立台儿庄胜利中学，作育英才，……以后，率领数百青年子弟，间关万里，终于抵达台湾澎湖。先生曾受聘于澎湖防卫司令部子弟学校，任公民教员，以精神欠佳，半年后辞职，从此家居读书课子，含贻弄孙，不忮（zhi志，嫉妒）不求，二十年如一日。……谨就先生平生，举其大略，用追永思，亦冀世人，知读书大义云尔。

家　世

孙先生，讳业洪，字范全，山东省峄县北洛村人。清光绪十九年生。六岁入家塾，十二岁应县佾（yi义）生试入选。后考入山东济南高等警监学堂，民国三年毕业，但未从事警务工作；复入山东兖州东西语文专科学

校，期年后辍学。实因家乡土匪猖獗，乃返乡里倡议组织民团，剿除鲁苏边区盗匪。先生尊翁悌成公，笃于孝友之道，忠厚待人，热心公益，先生深受陶冶。民国初年，吾邑曾集合全县教师，施以半年专业训练，名为“单级师范”，先生曾参加习教育，为同学中最年青者，因此一生对教育事业发生兴趣。

办　学

先生剿匪之后，地方平静，决心从事教育事业。吾邑民性，极端保守，对于读书向不重视，青年子弟，多半从塾师读“四书”二三年，略识“之无”即改习他业；对于新式学校，大多不感兴趣。主要原因，不了解学校教育之精神。先生幼读经书，长而接受新式教育，深悉教育救国之旨，决心从基本改革，独资创办私立北洛小学，延聘优良师资，十年努力经营，名声冠全县。民国二十一年秋，全县运动会，北洛小学夺得十项冠军；二十二年举行全县小学毕业生会考，北洛小学毕业生，不但全体通过考试，并且获得第一名之荣誉（张天锡君，后为警官学校第十八期毕业）。北洛小学毕业生，革除不升学思想，绝大多数升入简师、初中，而完成大专教育者，亦居全县各小学之冠。

先生于办学之暇，兼理地方基层行政工作，曾任乡长、区长达十五年之久。抗战前地方行政，乡长、区长皆为义务职，亦不需选举。乡、区公所工作干部，也没有薪给，大多由乡区长私人津贴少许零用钱，县政府仅补助些许办公费而已。因此必须选拔地方上热心公益、

廉洁正直、家庭殷实、深负重望的读书人来担任基层政务。先生于乡区长任内，有三件事最为梓里所乐道。第一，组织“联庄会”，清剿鲁苏边区数股顽匪。吾邑地方连二省（山东、江苏）六县（滕县、峄县、临沂、郯城、铜山、邳县）交界，政治力量极难照顾周全，而且自古即属盗匪出没之境，落马湖即在邳县境，距台儿庄仅七十华里。民国七、八年，土匪再度猖獗，先生再组织联庄会，并请求驻军协助，数次痛剿，完全荡平，人民得安居乐业。第二，开沟渠。由于峄县东南境内地势低下，缺乏排水沟渠，每逢雨季，积水长达数月，影响农作至巨。先生决心除此困难，集合民众利用农暇，开凿排水渠数十里，导积水入运河，化荒野为良田，受惠者何止千百家。第三，倡教育，禁赌博。先生除创办私立北洛小学外，劝导各村成立小学，并由小学附设平民识字班，由政府供给课本及纸笔用具，尽力劝导失学者入学，中年文盲进识字班。禁赌博，定罚格，使一般游惰均导入正轨，乡亲父老，无不称赞。

抗　战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凡是明大义、重气节、爱国家的志士，无不义愤填膺，最高领袖在庐山发表严正声明：“和平未到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中国之安危，实关系全世界人类之安危……。”政府决定抗战国策，举国上下，无不振奋，大家既然知道，生死存亡关头来临，牺牲流血无法避免，但必胜信心异常坚定，

尤其是一般读书人，深深了解，对国家不能尽忠，什么孝悌、信友都谈不到。国家命运，就是个人命运。如果没有了国家，个人的一切也随之成为泡影。

战争恶化，日本要求河北特殊化，国军全部南调，仅余二十九军。以日人看法，二十九军属于有色彩，可以分化的西北军。但是基于民族大义，凡是中国人，无不痛恨倭寇，都会对日军作特殊死战。可惜我们武器太过落伍，使战争急转直下，日军很快进入山东。孰料斯时山东主席韩复榘，认识不够，又以私人七千元巨款存于日本银行，竟毫无准备，一枪未放退出济南。日军在二十六年底到达鲁南滕县之两下店，以及临沂城。我政府积极调动大军北上，徐州便成为军事必争之地，徐州大会战序幕揭开。二十七年三月，以台儿庄为主要战场的战事开始肉搏，四十天血战，终于歼灭日军两个师团——矶谷、坂垣，造成著名之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之后，国军西移，日军损失惨重，需要调补，鲁南苏北十数县，形成真空，很多地方政府因首长逃亡而瓦解。但因敌我在战场遗留之枪械弹药，数目以万计。劫后归来之百姓，有的隐藏，有的出售，价钱极为便宜。许多不肖之徒，用以为恶；打家劫舍，截路绑架，时有所闻。先生至为忧虑，身为区长，保乡有责，毅然挺身而出，联络友好邻里，组织民间武力，先行卫家，继图抵抗日军。我最高当局，已决定发表敌后游击战，此时游击队如雨后春笋，皆自立名目，三十、五十一伙，一百、二百成群，但缺乏上级领导，更无游击战之经验，对于此大好机会，未能及时运用，甚为可

惜。此时我峄县市党部书记长白钦文同志，住在先生家中，秘密邀约同志，并向山东省第三督察专员公署请名义，终于获得“第一行署”番号，专署并派蔡少衡为主任，任命先生为副主任，一面整理地方行政，一面发展游击部队。

民国二十八年，先生的部队发展非常迅速。在二十七年九月间，先生仅有乡公所常备部队十五名，由一位队长带领，十月三日黎明，日军出动步骑五百余，配合炮兵进犯北洛村，经一小时战斗，毙敌四名，先生方安全撤退。自此之后，开始了游击生活，除常备部队外，又增加二十名先生的子侄与学生，选定了郯城境层山作为根据地。二十八年春，利用农历新年初四的黎明，在北洛村西，伏击日军由台儿庄返回峄城之汽车，当场毙敌二十人，毁车两辆，俘获伪军七十余名，步枪九十多支，弹药甚伙。此役之意义至为重大。自徐州大会战后，仅铁路沿线重要之城镇驻有日军，为数并不太多；但一般人心患有“恐日病”，几至谈虎色变。更有不肖无耻之徒，组织“维持会”，为虎作伥，到处宣传，谓“百万国军尚抵不住皇军，游击队怎能抗日”。由于此一战役，不仅发挥游击战之妙用，在我军毫无损失情况下，全数消灭敌人，焚毁敌车，人心为之大振，我军亦更增信心。因此数月之内，携械投效者达三四百人。编组训练，选派干部，成立了一个大队（营），辖四个中队（连），由先生任大队长，展开一连串对敌攻击，维护地方安全。

民国二十九年春，接获专署命令，调赴鲁苏战区总

司令部点验，斯时总司令部设在沂水县圈里镇，三区专署设于沂水县沂汶庄。先生此时已有五百余众，并且另外还有行署所辖之二、三大队及特务大队约千五百余人。二月初出发，……在连顶村与日军作战，故而延至二月底始达战区。点验之后，发表为鲁苏战区游击独立二十七支队，先为蔡少衡任支队长，不久即改任先生为支队长。在点验期中，总司令曾派政治部主任周复中将到部队训话。周中将看到游击队不但服装、器械整齐，而且精神饱满，训练精良，极为满意，除当面嘉奖之外，更发给菜金，以资犒劳。

五月中旬，部队仍近临、郯、峄边区防地，继续对敌游击，九月曾截击陇海铁路支线台儿庄至赵墩火车，毙敌三十余名，俘汪伪军旅长一名，解送战区获得嘉奖。当时重庆各报均曾刊此消息，不久又与共军作战，将运河支队大队长胡大义俘虏，予以枪杀，故共军恨之入骨。至年底，独立二十七支队番号与王洪九支队番号互调。先生改属第一纵队，直接由司令张里元指挥。张里元先生原任山东省第三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后又兼游击挺进军一纵队司令。

民国三十年元旦，张里元被省政府撤去专员之职，保安司令亦随之撤销，仅有纵队司令名义，司令部移至莒县上芦沟，所辖部队有第一支队（由原保安一团改编）、第二支队（由保安二团改编）及第三支队孙先生部，另外尚有特务大队亦近千人，总计约六千余众。但因第三支队驻防峄南一带，中隔数县，指挥不便，交通困难，敌匪伪军交错，张先生决心集中力量，亲赴峄南将

该部调至莒县。三十一年底，先生驻防于莒北一带，曾参加纵队联合作战，先消灭为祸诸城南部的土匪王梦华，继之配合国军五十七军百十一师共同击破伪军张步云部，更在日照与共产党军队激战十昼夜。鲁苏战区总司令部于三十二年夏撤至皖北，国军五十一军及五十七军亦随之撤离山东。山东情势此时至为混乱，除伪军、共军外，游击部队所剩无几，而又失去领导中心，人民陷入极端痛苦之中，张里元先生不得已全部移至临沂、峄县南部。

峄南地区虽属平原，但因系二省六县交界。敌伪时期，行政区划并未有改变，更以华北之伪组织王克敏与汪伪政权，亦以徐州为界，在此地区作游击战方便甚多……

民国三十三年，先生任新编三十六师补充团团长，因张里元先生之游击队改为新编三十六师之故。此时虽距胜利之日甚近，但在敌后作战也是最艰难时期，饷弹两缺，食衣皆无，敌匪交侵，活动地区缩小，虽屡作扩展，亦难如愿。由于共产党军队深恨先生枪杀其有力干部胡大义，于是年春夏之交集三千步骑围攻先生之第一营于峄县南霸子村，经两昼夜血战，其营长孙景峻率领突围而出者仅二十七人，先生曾亲率两营兵力支援，均遭共军骑兵阻截，而无法接近，故遭此惨重损失。该营为先生八年抗战基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可以说于八年之中无役不从，而又多系先生子侄学生，因此先生伤痛万分，兼以先生宿患癫痫之疾，经此打击，宿疾复发，数月昏迷，不省人事，迄至胜利来临，尚需担架行动。

解甲

先生原以书生救国，本民族大义，毁家纾难，置老母妻子于不顾，家中田产荒芜，房舍全被日军焚烧。胜利到来，普天同庆，既非军人，国民天职已尽，自应解甲归田，还我本来面目。三十五年新编三十六师改编为山东保安第二旅，先生虽仍任团长，但因宿病及眼病，赴枣庄就医，部队驻防临城东之山家林，遭共产党陈毅部二十一昼夜攻击，终因不支突围至临城。先生忧急万分，交涉“三人执行小组”，乘其便车返临城，不幸於下车后坠落桥下，因而腿部重伤脱臼，驻院疗养半年，方可行动。在此期中，正逢部队编遣，军官转业退役，而先生之职务因改编而消失，以病中未能办理退役，出院之后，一切已时过境迁，无法补办矣。只有回家奉养老母，整理田园，读书课子。但房舍被毁，无法居住，不得已借住台儿庄。

峄县临时参议会成立，遴选先生为参议员，对于劫后兴复工作，贡献颇多。由于先生家住台儿庄，地方父老极力请求，希望出来领导创办中学。先生为感谢地方父老八年相助之德，教育事业又为其终生志愿，便毅然允诺。但战乱之后，工商凋敝，匪祸仍炽，办理中学，实在困难，既乏资金，又缺人才，如何着手筹划，真是煞费苦心。民国三十六年六月，笔者适毕业于山东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应县府教育科长屈师振恒之邀，回县筹备县立中学，于开会之际，与先生谋面。会后坚约笔者相助。由于师生姻亲之谊，又属多年部下关系，实义不容

辞，明知斯时创办私立中学困难重重，亦得勉力以赴。只有向屈振恒师婉言说明，随先生到台儿庄工作。

经两月奔走洽接，请得救济总署协助，用以工代赈方式，订制桌椅，修建校舍。接受地方捐助，募集资金一亿元（法币），学田地十二顷，备文报请上级立案。先生之次子法读兄，抗战初起随学校流亡后方读书，此时归来，使先生既得莫大安慰，亦成为有力助手。由于先生出名倡导，乡人无不尽力支持，驻军方面亦乐于协助，虽遇困阻，均可顺利解决。九月初，私立台儿庄胜利中学即正式开学上课。从废墟中建立教室、宿舍、礼堂、花园、运动场，虽然半数为草房，然亦颇具规模，数千册的图书馆、两个篮球场，足够三百师生读书活动之用。男女青年，因受先生精神激励，无不奋发努力，黎明即起，早读绝不需要老师督促，晚间自习，皆系学生自动来校，并自备灯火，必需老师督促方才就寝。而今追忆当年，使人不胜向往。

流　亡

民国三十七年秋，山东情势恶化，由于济南沦陷，徐州遂告紧急，台儿庄系徐州外围，更显不安现象。峄县县中计划南迁，私立台儿庄胜利中学经董事会决议，与县中结伴迁移江左。十月十四日开始出发，先至徐州借住私立云龙中学，请准教育部青年辅导会救济，十月下旬抵达南京转至瓜洲暂住，经过一月之奔走求援，始获山东教育厅接管，派员率领学生至湖南设校。先生原被推为胜利中学董事长，率领全校师生流亡，董事长无

法办理交涉，即以校长名义主持校务，但山东省教育厅长李泰华不允私立学校流亡，几经请求，并邀请立法委员张里元代为说项，只允接管学生，直到湖南宜章设校，始准教职员担任教学等事务，实际沿途一切照管责任仍由全体教职员负担，只不过自备旅费而已。民国三十八年元月，山东省教育厅正式发表了英德先生为国立济南第四联合中学校长，命先生为校本部初中部主任，学校渐渐就序，学生也正式上课。

民国三十八年五月，因共军渡江，大江以南情势紊乱，山东流亡学校，七所联合中学均集于广州，斯时山东省主席由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将军兼代，以数千青年，忠贞不屈，追随政府，辗转万里，来至南疆，流离堪虞。乃商得教育、国防两部，以及东南长官公署澎湖防卫司令部同意，于六、七月间分两批接运来澎湖，凡在十六岁以上之男生，接受军事训练，女生及年幼男生成立澎湖防卫司令部子弟学校。后设在无锡之山东海岱中学，亦由其训导主任单一之先生领率，自上海到达基隆再转来澎湖。……

先生自家乡受学生家长重托，率领数百青年辗转万里，经历六省来至台湾……，自此之后，始放下重担，在个人亦完成教育爱国素志。澎湖防卫司令部子弟学校直属教育部，曾聘先生为公民教员。由于先生早罹宿疾，影响健康，此次流亡，高年老母难受颠沛之苦，不得已留在家中，妻子与长子在家侍奉，仅带次子法读、四子法樵、五子法文来台，精神极为不佳，无法上课，半年后即辞去教员名义。次子法读兄亦任教该校，由其

奉养。先生平居读书教子，含饴弄孙，唯忧国事，故每日必读报纸，无任何嗜好，与同仁谈论，必讲忠孝事。一生淡薄名利，本书生原则。六十一年十月一日，以老病交迫，逝于彰化县员林。

（《山东文献》第一卷第一期第109—115页）

补　白

南　闸　故　居

栗由思

村前村后两条河，
南闸风光永不磨。
阡陌纵横芳树绕，
看花饮酒日吟哦。

龙 家 父 子

赵沛新

龙传道，字质臣，台儿庄区马兰屯乡龙口村人，1875年生。幼读私塾，通于经史，虽经科考而落第，但擅写呈词，能言善辩，勇猛多谋，爱玩枪械。生活俭朴，常粗衣而淡食。

其子希贞，字元一，1904年生。其性粗野，幼时嗜赌成癖，常聚赌于瓜棚、瓜屋之内，其吃瓜量又大于常人，因送其绰号为“大瓜屋子”。

父被绑票　恨匪成仇

龙传道之父龙绍训（外号“三先生”），是个拥有13顷地的大地主。民国七年(1918年)农历四月十八，龙绍训骑着一头白色毛驴去台儿庄赶春会。回来路过小屋子村，有土匪20余人（其中有姜士亮、赵丙二人，皆给三先生当过雇工），藏在路边苇子棵里。看到三先生到来，群匪突出，将三先生绑架，过沙河向西跑去。

龙传道闻父被土匪绑票，不思花钱赎人，却集合保家局子一二十人，各带长短枪追着去打。临行前，龙传道告诫众家丁道：“发现匪踪，瞄准狠打。如果打不掉，就照着老东家身上打，打死了抬回家送殡，也不能让人

落入匪手，还得花钱去赎。”众人猛追，到南新庄庙台子附近时，发现了匪踪，看到三先生双手被绑，还骑在驴上，群匪环护左右，鞭驴狂奔。龙传道命令众人开枪狠打。虽说三先生在驴上目标大，但众局子心有顾忌，不敢打死老东家。龙传道一看大伙打不中，自己便照准射击，一枪将驴打倒了。群匪情急生智，着少数人架着三先生跑，大部匪徒找地势卧倒还击。就这样边打边撤，夜幕已降，失掉了目标，群匪退到了万年闸过河而去。龙传道追至河边，已是夜半，只好悻悻而回。

得恩忘义　以怨报德

三先生在土匪的严密看守下过了20多天。土匪以为三先生是个大财主，有钱可使，特派某匪首之亲属王茂才专门看管。三先生逐渐与其搭讪交谈，得知其人家是新河崖村，又是龙口龙绍俭的女婿。三先生便与其叙亲，该匪也称三先生为三大爷。三先生便施拉拢利诱之计说：“你干这一行，终究没有好下场。如能改邪归正，将我放走，我在小龚庄有4顷地，愿以相送。同时，你对我有恩，我儿子与台儿庄的张营长交情很厚，保险没有人敢追究你从匪的罪恶。这样既有名，又有利。如不这样，一旦社会澄清了，凡干过土匪的就难以安身立命了。”经过三先生的一番拉拢、利诱和恫吓，王茂才的心被打动了。古历五月初五的夜晚，趁群匪出劫之机，王茂才带着三先生逃出了匪穴。五月端午天刚明时，三先生便回到家里。五月初十，王茂才带着老母亲和妻子来到了龙家，准备接收土地，去小龚庄安家

立业。谁知三先生却翻脸不认人，见了王茂才，不提给地安家之事，而将王留下，发给步枪一支，叫他与众保家局子一同看门站岗，除管饭外，每月发给3块钱的工钱。对其老母、妻子也未予以安置，只给了几块钱和几件旧衣服，就把她们打发走了。王茂才这才知道受骗了，满腹怨气，但不敢出口辩理；因叛离同伙，又不敢回去，只好忍气吞声地在这儿待下去。过了几个月，王茂才逐渐与众局子混熟了。这时，他思得一计，便在同伙中选中了张茂友、潘振淮、孟广田3人，先从喝酒、谈心、拜把子套近乎，拉关系，后来自觉着交情厚了，便将肺腑之言说出："咱在龙家当一辈子奴才，有什么出息？不如拉出去闯一闯！我趁龙传道夜间出来查岗之机，一枪把他打死，咱们把他家的长短枪一齐带走。"于是定好了日期，等着动手了。谁知，张、潘、孟3人不敢铤而走险，便将王的阴谋告发了。这天夜里，龙传道将内宅门锁好，手持两支短枪守住内宅，不出来查岗了。王茂才空等了一夜，心想，今夜不成，明夜再干。但他也作了坏的打算，因此枪不离手，吃早饭时，枪也背在身上。龙传道躲在内宅门里观看，见王弯腰舀饭，突然窜到王身后，一手持短枪，一手将王身上的长枪抓了过来，然后大声说道："王茂才，我为什么下了你的枪，你自己心里明白。吃过饭放你回家，咱们两不侵犯。"王茂才听了此语，惊魂稍定，立即离开了龙口。走到顿庄东头，心里正庆幸自己脱离了虎口。这时对面来了4个人，问道："你是什么人？到哪里去？"王茂才并未害怕，说："我是王茂才，回家去看看。"

话未说完，就被这4个人绑上，说：“李社长接了龙家的信，派我们在这里等候多时了。现在跟我们一起去台儿庄吧！”王茂才被送到台儿庄，当天就被张营长处决了。一场恩怨就此了结。

剿匪抄窝　发展势力

1918—1937年间，龙家的武装逐渐扩大。他原有快慢机匣子枪两支、竹节匣子枪两支、七子联手枪一支、汉阳造、套筒子、俄国造等长枪近20支。在匪患期间，又勒令本村各中小地主、富农等买枪看家，少者一支，多者三五支。这样一来，全村共有步枪50余支，都归龙家父子管理调动。从1917年至1928年10余年间，峄南一带土匪多如牛毛，大、小村镇皆遭土匪蹂躏，唯独龙口一隅之地，在龙家父子的猛拚、猛打之下，力拒匪乱，未受摧残。

民国十八年（1929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峄县县政府成立。各乡镇组建乡团自卫，社会秩序日趋安定。大、小匪伙烟消云散。这时，龙家父子统率乡团剿抄残匪。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农历正月二十，侦知马兰屯西草湖村尚有残匪出没，龙率部往捕。在该村东头王益彬家发现了匪踪，乡团队员龙立志率先冲进王家大门，被藏匪击中而死，一支步枪、30多排子弹落入匪手。土匪只有六七个人，皆系亡命之徒，负隅顽抗。龙家乡团数十人，只好将王宅包围，但不敢靠近。后又调来县大队，并带来迫击炮一门，安放在五里坊村东，枪炮齐发。可惜王宅太小，炮目又不准，打了一天，土匪

依然潜伏不动，县大队和乡团又不敢冲入捕捉。黄昏后，这伙匪徒安然突围而去。

草湖之战，龙立志之死，却为龙家立下功勋。峄县县长亲往龙口主持召开龙立志追悼会。会后，委任龙希贞为峄县联庄会剿匪督队官，在龙口设峄县联庄会剿匪督队公所。由此，龙家父子跟踪追迹，将一些洗手不干的土匪和在大乱时通匪、窝赃、窝客的人家挨个逮捕，有枪、有钱的可向龙家缴枪或交钱赎人，无枪、无钱者多被送县正法。现略举几例如下：

赵克山，泥沟镇宋家铺村人，在匪乱期间，曾任赵有洪匪部连长，社会安定后回家为民。被龙部突入其家逮捕，因无枪、钱赎命，被送往峄县，于农历腊月三十在峄县西门外处决。

邢成祥，马兰屯乡河湾村人，是个富农。其舅父王甲友闯土匪，曾将河泉村赵有恒之妻绑票，窝在邢家。大乱后，龙家父子率部抄袭邢家，将粮食、衣物、牲畜、牛车全部拉走，名为起赃。邢成祥缴钱买枪赎罪，幸免一死。

孙继珍，马兰屯乡前大河崖村人，也因通匪、窝客，被龙抄家，东西全部被拿走，人未捉住。临走时，放火烧了孙家的房屋和草垛。

张文斗，薛庄乡贺窑村人，系龙传道妻弟。县里在审讯一土匪时，将张供出。龙遂将张逮捕。在枪决这一土匪时，将张一同绑赴刑场。张文斗被释放后，因受惊吓成病而死。

搜罗枪支　组建武装

1938年，台儿庄大战之后，枣台地区大小城镇均沦为敌手。各地人民纷起抗日。龙家父子也以抗日为名，大肆搜罗枪支。

1939年农历二月初一拂晓，龙家父子率部包围了前大河崖村，挨户捉拿，共逮去男女老幼村民70人，带至马兰屯南龚家林内，逐一审讯。按照他事先列好的名单，凡在民国七年至十七年间（1918—1928年）有土匪嫌疑（包括亲属），留下40余人，带往龙口，视其家资多少，勒令其缴枪或交钱以赎人，有3支、2支、1支3个等差。并将曾干过土匪、又拿不出枪、钱的赵克君、赵克俭2人，于二月初二在马兰屯南官林子枪杀以示威。这样一来，被押之人纷纷缴枪或交钱以赎命。

同年九月初二，马兰屯镇镇长黄子钦组织了一个小分队，有30支枪，任命任广才为队长，住在镇上维持地方治安。龙家父子以强凌弱，连夜包围了马兰屯街，将这个小分队的武器收缴而去。龙家父子就是这样通过侵吞抢夺，发展成一支拥有300人、280支步枪、3挺机枪的队伍。

朝秦暮楚　终被缴械

1939年春，龙家地主武装日益扩大，先投靠国民党鲁南专员张里元，被编为第五战区游击第八独立营，龙希贞任营长，接着又受编于鲁南行署主任蔡少衡部下，为游击第一纵队第三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下辖3个中

队：七中队中队长张目瑶，八中队中队长张建昌，九中队中队长于学文。在此期间，曾配合三支队支队长孙业洪，在南北洛、马兰屯、南顿庄等，与日伪军打过几次游击战。

1940年春，日伪军在运河北一带扫荡频繁，孙业洪的三支队撤到东北层山一带。龙希贞的第三大队不愿离开家乡，便来到运河南，改投中共领导的运河支队。同年4月，运河支队在毛楼召开整编大会，龙部被编为运河支队第三大队，龙希贞任大队长。一个月后，在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中，龙希贞叛离了运河支队，投靠国民党峄县县长陈鉴海，当上了抗敌自卫总团团长，坚决站到反共的立场上去了。六七月间，他与铜山县县长蓝伯华、国民党游击队梁继璐、韩治隆等，在当地反共分子王治尧的勾引下，不时向黄邱山套抗日根据地袭扰进攻。

1940年7月，苏鲁支队张光忠司令亲率三营两个连，配合运河支队，发动了反顽之战，一举击溃了梁、韩各部，扫清了不老河以北地区的顽军。龙希贞逃窜至扒头山以东邳县地界，但在那里也难以立足，龙又带领五六个卫兵，企图窜往运河以北，夜宿下桥口村麦场上草垛边，睡梦中被运河支队的巡逻部队活捉了去。运河支队派人通知龙传道，立即率队来归，或将武器、弹药全部上缴，否则即将龙希贞就地正法。龙传道爱子心切，但其顽固思想不变，宁将武器上缴，也不参加运河支队，终将长短枪支和3挺机枪打捆上缴。运河支队领导以龙希贞勇猛善战，经过说服教育，留用作支队部副官。

叛离革命　屈膝投敌

龙传道一生爱枪如命，向运河支队缴械后，气恼成疾，卧床不起。次子希贤和护兵龙希坤将其抬至龙口，暗藏在龙克阶家中治疗。又被其族弟龙勉道发现，因怀着家族仇恨，偷偷去台儿庄向日伪军告了密。

1940年农历九月初二拂晓，台儿庄的日伪军将龙口包围，逮捕了龙传道、龙希贤和龙希坤，将龙传道用木床抬走。至台儿庄日军宪兵队部时，奄奄一息的龙传道在惊吓和气恼中气绝身亡。其次子希贤被转送到枣庄宪兵队，被日军活活打死，又分解其尸。

同年农历十月，在日伪军的疯狂扫荡下，运河支队遭受了严重打击。这时，龙希贞又叛离了运河支队。他不顾其父和二弟被日军残害之仇，竟屈膝投敌。峄县县长王徽文、日军顾问莫稔委任龙希贞为运河南八区区长。龙希贞搜罗枪支，招聚旧部，又组建起一支伪军，被编为峄县警备第五大队，龙兼任大队长。他领回父尸，在龙口村杀猪宰羊，大摆宴席1000余桌，为其父发丧。并于埋葬之时，枪杀了龙勉道的父亲龙绍纶和六叔绍纯、八叔绍经3人，为其父祭灵。

运南称王　终罹法网

龙希贞来到运河南，在日军的卵翼下，以涧头集为根据地，死心塌地地与抗日军民为敌。

首先组建伪区公所，任用李率三为参谋兼秘书，李汉英、张建修为副大队长，下辖涧头集、朱古、许阳、

侯孟、三义、草桥、贺窑和花山子8个伪乡公所。其次发展扩大伪军武装。大队以下有3个中队和1个特务队，以其长子克林为特务中队长。每个伪乡公所组建1个伪乡兵中队。因此，龙希贞辖下伪军近千人，分驻在15个据点内。1941年春，龙希贞勾引日军平贺小队长，率日军24人，带手炮1门、轻重机枪各1挺、战马4匹，进驻涧头集以镇压人民。又大出民夫，在涧头集街东修造大兵房一座，周砌青石围墙，四角造两层青石炮楼，地下碉堡，围墙外挖水壕，只留一个门出入，在水壕上设木板吊桥，水壕外又立一木寨。龙希贞率特务中队和日军一起驻在大兵房内。

龙希贞生性残忍，杀人如麻。侯孟村的刘克己、河泉村的赵建德、曹楼村的田世耀等，皆因干过共产党的地方政权干部，有的被杀，有的被活埋。1944年8月5日，在解放涧头集的战斗中，八路军为了攻破大兵房，调来21名青壮民兵挖地道，以接近敌碉堡。后因台儿庄的日伪军前来接应，这21名民兵因撤退不及，被龙部逮住，用机枪点射，全被杀害。

在龙希贞运南称王的4年中，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一些中小产业者，皆倾家荡产。而龙又施以掠夺之策，勒令无钱缴纳者，以房产地亩抵押，从而掠夺土地近百顷。如黄新庄原系新楼黄家的产业，有地一20顷，后被“龙瓜屋子”掠去。此外，如姬楼、老宅子、涧头集周围，龙家的土地连阡陌。

龙家父子玩弄女性，随意蹂躏和残杀。龙希贞除原配外，又霸占民女两三人，立为外宅。其子龙克林也是

有妻、有妾。有一戏班前来涧头集唱戏，女主角周晓晓人才出众，唱做俱佳，被龙看中，强占为妾。过了一段时间，玩弄够了，施以虐待。周晓晓思欲逃走，被龙发觉，就地枪杀。

龙希贞对中共机关和运河支队怀有刻骨仇恨。在其称霸运南的4年中，曾多次配合日军和国民党游击队，向黄邱套抗日根据地进攻与袭扰，残杀抗日军民，掠夺根据地人民的财物。

1944年夏秋之间，运河支队在中共淮北军区独立一团的配合下，逐步扫清了龙希贞的外围据点，于8月3日至5日对涧头集发起强攻。龙希贞的伪军被打垮了大部，龙希贞本人在台儿庄日伪军的援救之下，逃离涧头集，窜入台儿庄住了一年，后又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逃往峄县城，龟缩在东关黉（hóng红）学宫内。

1945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了峄县城，活捉了龙希贞。同年10月，在涧头集召开了万人大会，公审龙希贞。一些被害者的家属、苦主带着刀子、剪子、锥子，一致要求政府把龙希贞交给群众凌迟处死。人民政府执行政策，再三说服群众，才将龙希贞执行枪决。龙希贞被枪决之后，一些苦主还争割其肉，以雪心头之恨。

前国民党少将高参黄僖棠事略

赵沛新

黄僖棠，字公如，亦字谏鱼，清宣统元年（1909年）农历三月初三生于峄县新河社马兰屯镇（今台儿庄区马兰屯乡）。其先世自福建省邵武府泰宁县从军随明永乐帝（燕王朱棣），北征蒙元，立有战功，曾屯兵于此而定居。世代宗族繁衍，成为峄南之望族。

父名近仁，字性然，清代庠生，热心公益，誉满乡里，曾参加同盟会，响应民主革命。民国成立后，历任峄县企彭乡新河社社长，为乡邑领导人之一。母孙氏，系出名门，因持家操劳过度而早逝。

僖棠幼读家塾，聪颖过人，博闻强记，又就学于峄县县立高等小学校，毕业后考入济南正谊中学。时逢“五卅”惨案，激于爱国热忱，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曾声援“沪案”，并回峄县开展国民党党务活动，建立峄县党部，被推选为常务委员。民国十五年（1926年）夏，由山东省党部选送赴粤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步兵科，毕业后曾参加东征。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任随军宣传员，后又任济宁党务指导兼训练部部长、济南市党部监察委员、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组织部干事。在1929—1935年间，其军衔由见习官递升中校。

1935年夏，他为求学识之深造兼窥敌国之实况，遂辞职东渡，入日本东京专修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科，并作社会调查。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黄僖棠即束装返国参加抗战，被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任为别动总队第五十游击支队司令。他首先以黄氏家族的看家武装为基础，又得到峄县上层人物崔蘧庵、孙伯龙等人的赞助，将各区、乡的联庄会、自卫团首领如杨桂链、孙云亭等，以及一些原先的匪伙如马玉山、李良镇等一齐联络、招纳过来，分编为3个梯队。后因意见不合，观点各异，孙伯龙与崔蘧庵各带所部，分道扬镳。台儿庄大战期间，配合中国军队，策应台儿庄会战，厥功甚伟。

1939年秋，黄僖棠部奉命北撤入抱犊崮山区，被改编为五十一军，黄任补充团团长，继又改定番号为第七支队。1941年冬，国民党军政当局为强化鲁南抗战基地，特任黄僖棠为沂水县县长，后调任临朐县县长，兼任鲁苏战区战地青年服务团团长。山东省政府迁往皖北后，黄僖棠又历任山东省训团区县训练指导处处长，山东挺进军总司令部少将高参等职。抗战胜利后，奉命参与受降工作。完成任务后，即为济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又奉省令调任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继调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兼代青岛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职。以迄青岛解放时，随军逃往台湾。抵台后，奉准离职退役。

数年后，国民党整顿改造毕，又经原黄埔同学宋君介绍，出任中国国民党嘉义铁路党支部书记长。1973年退职，又受聘于某专科学校任国文教员。1978年，辞去

教师职务，迁往台北新建市锦绣路定居，息影淡泊，读书自适。

1989年6月14日凌晨1时22分，黄僖棠病逝于台北三军总医院，享年80岁。僖棠生有5子、8女，除次女黄诤在美国，四女黄讯在大陆外，其他子女皆在台湾各地工作。

补　白

台庄护漕诗

蒋鸣玉

春生冰破护漕流，
伏夏炎蒸复届秋。
百道泉溅通濬闸，
千帆风起过洪舟。
陶河鸟啄礓砂恨，
镇水犀穿斫缆愁。
当守苦询民力竭，
腰弓植戟尽诸侯。

＊蒋鸣玉，曾任兖东道兵备副使。

郑继筠其人其事

马俊先

在台儿庄区张山子镇方圆几十里，提起郑大炮其人，50岁以上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郑大炮，名继筠（yún云），字竹轩，兄弟二人，他居长，说话粗门大嗓，心直口快，人送外号“大炮”，张山子镇官牧村人。中国国民党党员，曾任国民党峄县参议。幼年时期，家境富裕，有地七八百亩；到郑继筠成人时，土地尚有500余亩；父亲弟兄俩（郑允公、郑允太）分家时，他家分得200余亩，全靠雇人耕种。郑大炮上过几天私塾，略识几个字。

1930年冬，郑继筠的叔父郑允太被马子（土匪）打死，他悲痛至极，发誓：“不为叔父报仇，誓不为人！”翌年二月，郑继筠受峄县性义区大成乡乡长刘玉柱的邀请，当上了大成乡副乡长，这对郑继筠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他除了每天应付公事外，就习练枪法，手枪练到百发百中，还能熟练地背后射击。

1933年，小官庄村任德海家住了30多个马子。郑继筠得到消息后，亲自到韩庄，请求韩复榘的部下杨树森团长帮他消灭这股土匪，为其叔父报仇。当夜，杨树森团长带兵包围了小官庄村。这股土匪凭借着土围墙的优

势，与官兵对抗。包围圈越缩越小，但是不能靠近。这时，郑大炮命令他的随从吴学强（外号吴二楞，此人还健在），把10颗手榴弹捆在一起，拉好弦，让其他人作好掩护，把它扔过墙头。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段围墙被炸倒了，房子被炸着了。土匪顿时乱作一团。杨团长一声令下，官兵冲了进去。34名土匪全被击毙，连同窝主任德海一家，40余具尸体全被扔进任家的水井里，又用土屯上了。从此，张山子一带再也没有大股马子了。

是年冬，郝家村（现属江苏省铜山县利国乡）郝安哲家中窝匪，是受害人王同菊偷偷从郝家逃出来后说的。郑继筠立即带人去剿，抄了郝安哲的家，解救了被抢去的两名妇女，把郝安哲带出门后就枪毙了。郑继筠回乡之后，仍然放心不下，唯恐被解救的妇女再遇危险，随派吴学胜等将其送到黄台子村（现属铜山县紫庄乡）。被解救妇女的亲人感恩涕零，表示重谢。吴学胜马上摆手说："临来时，郑乡长交待得明明白白，不准收人分文，要是不听，可别怪他不讲情面。"就这样，吴学胜他们带回的只是感激之情。

1934年春，郑乡长带着郑允美一早出去巡视，突然发现有四五个人赶着一头毛驴，从毛官庄村后出来。这时，他警觉起来。来人越走越近，郑继筠大喝一声："干什么的？"贼人胆虚，这四五个人听到吆喝声，丢下毛驴，撒腿就跑。郑继筠鸣枪警告，他们也置若罔闻，跑得更快。郑继筠两人来到毛驴跟前一看，只见驴背上驮着一位被绑着、又被蒙上眼睛的妇女。带回村一问，才知道是马兰屯北道庄村人，是被绑架来的。郑乡

长派郑允美、褚庆仁两人护送这位妇女回家。她全家人感恩戴德，给郑、褚两人换了新鞋、新袜子。两人回来后，被郑继筠发现，痛骂了一顿。

官牧村北地势低洼，每逢夏季汛期一到，地里的庄稼全被淹没。村民多次在小新河上打坎都没有打成。家在官牧村的郑继筠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决定亲自组织村民干，同时把自家里的棍、棒和木板都拿了出来，并亲自下水打桩、抬土。在他的带动下，村民们也纷纷从家中拿来棍棒和木板，一起打桩、抬土。坝子只用3天的功夫就打成了。群众都说："郑继筠想干的事，没有干不成的！"

1938年春，日本侵略军侵占到了鲁南一带，郑继筠怀着报国之心，在原有乡丁的基础上拉起了武装，为李宗仁统帅的第五战区特种工作团第十九大队，郑任大队长。他的口号是："不当汉奸，不打中国人。"他变卖了家产，购买了枪支弹药，发展武装，队伍逐渐扩大。郑大炮没有官架子，做到有饭与部下同吃，有衣与部下同穿。但平时他对部下要求很严格。一天，大新庄村村民来此告状，说他的部下一位姓俭的短路（拦路抢钱、抢东西。）郑队长一听就火了："好你个俭士元（铜山县利国乡马园村人）身为排长，竟干这事，毁我的名声！"随即命手下人把俭士元绑上枪毙了。

1940年2月，毛官庄村年仅4岁的厉广安（此人还在）被马子抢走了，其母黄氏因去年被日本侵略军夺去了丈夫厉恩荣的生命，现在又失掉了孩子，可以想象，她的悲痛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她精神有些失常

了，多次跑到官牧村，指名道姓骂郑继筠，向他要儿子。一天，她正好碰上郑继筠，上前一把抓住郑，又哭又闹，又撕又打，嘴里不住地说："你还我的儿子！是你的人把我儿子抢走的。"郑继筠不但没有责怪她，还安慰她说："我一定给你找，我一定给你找！要是我手下人干的，就是我亲爹，我也不饶他！"不几天，郑继筠在铜山县江庄乡马安抓到了王立德，审问出抱厉广安的事。原来是在厉家干活的魏兴元，受其叔父魏广胜的唆使做窝底，由王立德抱走的。先在本镇沟上村任德运家窝藏，声言："如果没有钱，就把厉广安弄死！"一个神经失常的孤身妇女，到哪里弄钱去？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们得不到钱，就要对孩子下毒手。多亏好心的任刘氏（沟上村人）劝阻，他们才未下手，将其转移到平山子村。时隔近一个月，直到农历三月十八平山子歇马厅会，厉广安才被救回家。魏兴元和王立德两人同在平山子村两小河旁被郑继筠枪毙了，任德运跑了，后来在韩庄被抓住也给敲了。

郑大炮有个怪脾气，凡是跟他干的，你想走，他不留，但必须让他知道；否则，决不客气。他干儿子因不辞而别，后来被他抓回来活埋了。

1941年秋，由于郑继筠除暴安民，顺乎民意，他的队伍逐渐壮大起来，已拥有400余支枪。奉工作团的调遣，去江苏省兴化、泰州打日本。由于部队的素质差，又是与训练有素的日本正规部队作战，结果十九大队被打垮了。郑继筠只带着徐明田、张思祥、吴二楞几个人和一挺机枪回来，投奔到他二弟郑继簪岳丈孙传贤（涧头

集镇毛楼村人，在村内较有名望），结果被汉奸徐传朴吃掉。郑继筠遂去台儿庄，以图东山再起。

此时，我运河支队已迅速发展壮大，抗日工作深得民心，各村的爱国有志青年纷纷参加八路军。郑大炮看到这个形势，估计想招兵买马也不容易，遂去湖西投奔到铜沛鄌匪司令赵振声麾下，被赵任命为一团团长，掌握百十支枪，继续过游击生活。1943年春，郑继筠带人从湖西重返家乡，兼任大成乡乡长，先后在张山子、黄龙山与驻贾汪的日军交过火，打死、打伤日军多人。

1945年农历三月，郑继筠的部队在侯孟乡杜安村前又与日军接上了火。众寡悬殊，情况十分危急。多亏运河支队三营八连及时赶到，抢占了附近山头，向日军包抄过来。狡猾的敌人见势不妙，乘车逃窜了。郑继筠见到八连连长刘其家，感激地说："要不是你们来得及时，今天我们又要吃亏了。"刘连长说："咱们不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吗？打日本是咱们的共同任务。以后还是参加八路军吧，保证有你的职务。"郑继筠却推托说："以后看机会吧！"然后各自带部队走了。

这年8月，日军投降前夕，郑继筠所辖人员约200人，驻在张山子镇杨埠村。运河支队派人来和他谈判，让他接受运河支队的改编，被他拒绝了。运河支队随后包围了杨埠村。郑继筠这时住在村西头许家炮楼内，已知终究要被运河支队吃掉，但又不愿与运河支队为仇作对。因为他有过誓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再说，他的部队兵员素质太差，根本不是运河支队的对手，干脆一走了之。于是，郑大炮带着几个贴身人员跑了，并

留下话说："决不再拉武装了。"

郑继筠回官牧村住了几天后，便去了徐州，在铜沛路开了个马车行（旅店），卸甲经商了。1948年秋，淮海战役前夕去了南京。据说由原国民党第一军军长刘安祺（韩庄人）接到了他的寓所，随后便一同去了台湾，至今已有42年了。

1990年9月3日

补　白

过　新　河

〔明〕　王世贞

日出烟空匹练飞，
大荒中划万流依。
连山尽压支祈锁，
逼汉疑穿织女机。
九道征输宽气象，
六军容物迥光辉。
甘棠欲让金堤柳，
曾护司空却盖归。

春秋偪阳大战

文史委

台儿庄区涧头集镇西南5里的侯塘一带，是殷朝时偪（fū傅）阳城的旧址。偪阳国，颛顼（zhuān xū专须）高阳氏之后，祝融之孙、陆终第四子、彭祖之弟求言封地，妘(yún云)姓，子爵，为春秋124国中50个有爵有姓的诸侯国之一。2500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次大战。

春秋之时，诸侯争霸，战乱不息。当时，楚庄王（公元前613年—前560年在位）占有长江中游天险，地广人众，兵力雄厚，欲霸天下，气势逼人。晋悼公（公元前572年—前558年在位）联合诸侯，欲与楚国抗衡，但仍觉势单力薄，不足以成事，于是便想通好雄据长江中下游的吴国，把它作为犄角之势。而偪阳国和相(zǔ祖，楚地，在今江苏省邳县西北），皆在丞县南、沛县北，乃吴国进入北方之要冲，对于野心勃勃的吴王寿楚（公元前585年—前561年在位）来说，如骨梗在喉。为了买好于吴，晋悼公便邀请诸侯各国会于相，趁机灭掉偪阳国。

周灵王九年（鲁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农历四月，晋悼公以霸主身份，召集鲁襄公、宋公、卫侯、曹伯、薛伯、杞伯、莒子、邾子、滕子、小邾子、齐世子

光，会吴王寿梦于柤，遂结为联盟，以图霸业。会上，晋国的大将荀偃（yǎn演）、士匄（gài盖）以偪阳国倾向于楚国为由，请伐偪阳，借以打通攻楚的道路。晋国的主将荀罃（yīng营）听了，不以为然。他分析说："偪阳虽小，其城甚固。胜之不武；弗胜，必为诸侯耻笑。"荀偃、士匄再三请战，并立下了军令状，荀罃只好点头同意。于是，13国诸侯联军，战车辚辚，旌旗蔽日，浩浩荡荡向小小的偪阳国开来。

正如荀罃所说："偪阳虽小，其城甚固。"偪阳城依土山而建，城周长3293米，有"九里单八步"之说。南北长，东西短，大体呈长方形，至今，城墙最高处尚突出地面4—5米，底宽20余米，顶宽8—10米，并建有6个城门。《峄县志》上说："偪阳城，县南五十里，城周九里，基址宏阔。土人往往得古砖，坚如金石，琢为砚，尤良。"另据后人传说，偪阳子豹外能安邦，内能治国，是个有智有谋的国君。

偪阳城内西南隅有小山一座，俗称米山。传说，当诸侯大军即将到来之时，偪阳国君作了充分准备，还巧施一计，令士卒背着小米在城内小山上遍洒，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金灿灿的米山。诸侯大军一到，主将骑马观阵，随从一将看见米山，心中一惊，便说："偪阳城小而固，易守难攻，又有堆积如山的粮食，坚守一年半载何足为虑？"主将对着米山仔细观察，又凝思了一阵，似有所悟，于是从箭壶中拔出箭来，拉弓搭箭，"嗖"、"嗖"、"嗖"连射三箭，箭头着"米"便倒。主将哈哈大笑说："如果是米山，箭头射入不会倒

地。而今箭头着‘米’不入，一定是石山。此乃疑阵，不足为虑！”这就是米山的由来。

而今且说13国诸侯之师将小小的偪阳城团团围住，合力攻打。偪阳城内，君臣一致，官兵一心，坚守城池。联军攻了几天，一直攻不下来，而又不肯离去。

这时，鲁国孟氏的家臣秦堇（jǐn仅）父押送辎车到达城下。偪阳人打开城楼的悬门，企图夺取辎重。诸侯之师见城门高悬，以为有机可乘，便一拥齐上向城门冲去。诸侯之师刚进去一半，忽听城门上豁喇一声，偪阳城守门士卒急忙将悬着的城门放下来，打算截住敌军，分而歼之。鲁国鄹（zōu邹）邑大夫、孔子之父叔梁纥正带领鲁军向城内攻去，猛见悬门下降，心想，如果偪阳人把军队截断，堵在城里，凭借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定会将城内的诸侯之师消灭，外边的军队想救也无能为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叔梁纥情急生智，手疾眼快，扔掉手中的兵器，举双手把正在下落的千斤城门轻轻托起，并大喝一声：“赶快退兵！”后军一看，情势危急，赶快鸣金收兵。诸侯之师听到锣声，恐后队有变，急忙回身。待攻进城内的诸侯之师全部退尽，叔梁纥双手一掀，就势撒开，那悬着的城门便落了闸口。《峄县志》卷二十一有云：“鄹人纥，仲尼父叔梁纥也，为鄹大夫。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偪阳之役，纥抉悬门以出诸侯之士。”

诸侯之师仍不甘心，继续鼓噪攻城。这时鲁将狄虒（sī思）弥取来一只大车轮子，蒙上坚甲，作为盾牌，执在左手，右手拔出长戟，独自前去挑战。孟献子看到此情

此景，感叹地说："《诗经》上说：'有力如虎。'说的就是狄虒弥啊！"

偪阳城上的官兵，见鲁将施逞勇力，随拿来一匹布，取开，沿城墙放下，引鲁军登城。鲁将秦堇父即以手牵布，左右交换，须臾便盘至城堞。方欲登城，城墙上的士卒用刀割断悬布，秦堇父从半空中重重地摔了下来。偪阳城墙高数仞，秦堇父这一跤摔得不轻，可他全然不顾。这时，城上布又垂下，秦堇父翻身爬起，又手抓悬布，奋力上攀。刚刚接近城堞，悬布复被割断，秦堇又被"咚"地一声摔倒到城墙脚下，当场就被摔昏了过去。当他刚刚苏醒过来时，布第三次垂下，秦堇父挽布如前，全无惧色。如此连续三次，偪阳人从心里服了鲁将的勇猛，再也不敢向下悬布了，只好命令城内军民全力守城。秦堇父遂取来断布三截，在诸侯之师的营地上巡回展出了三天，以示其勇。

晋国和诸侯之兵，自夏四月至五月，围攻偪阳城，前后长达24天，仍未攻下。攻者已倦，而守者有余，时值夏令，恐有大水，军无退路，将生变故。荀偃、士匄二将便同来禀告主将荀罃，请求班师。荀罃一听大怒，顺手抄起身边的弩机向二将掷去，口中骂道："老夫当初就说过：'城小而固，未易下也。'你们自认可灭，在晋侯面前一力承当，牵连老夫，以致于此！攻城这许多日，未见有尺寸之功，现在又想班师。来由得你们，去就由不得你们了！再给你们7天的期限，若攻不下城来，要你们的脑袋！"二将被骂得面红耳赤，诺诺而退。

五月初四，诸侯之师再度组织攻城。荀偃、士匄身

先士卒，虽城上矢下如雨，亦全然不顾。偪阳城中，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仍然将帅一心，军民团结，誓死守住孤城。他们先用箭射，箭用光了便用石头砸。双方又相持了四天。五月初八，城中的箭和石块都用光了。荀偃、士匄一看，大喜过望，便率先爬上城墙，各国将士亦紧随其后，蚁附而上。经过一番激烈的巷战，偪阳城终于被13国联军攻下，偪阳子只好率群臣投降。

从13个诸侯国的军队联合围城，到攻下偪阳城，前后共费时29天。偪阳虽小，但它作为一个小小的侯国，抵抗了13国之师的猛烈进攻，坚持近月，英勇奋战，其艰苦、顽强的精神令人钦佩。因此，偪阳之战被载入了中国的史册。

偪阳国既灭，因宋国的大夫向戌当初助晋彭城解围有功，晋悼公便欲把偪阳国这块地方送给向戌，作为他的封地。向戌坚辞不受，说："若专赐臣，是臣兴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请。"最后，晋悼公只好把偪阳送给宋公。随后，晋悼公将偪阳子贬为庶人，选其族人之贤者，以主妘姓之祀，让他们迁居到晋地的霍城。后来，楚国灭掉了宋国，改偪阳为傅阳。《公羊传》曰："偪阳即作傅阳，'偪'、'傅'音同也。"

在偪阳故城东二里许，有一高大封土堆，传为偪阳君求言之墓。《峄县志》云："周春秋偪阳君墓，在县南五十里，偪阳城东，旧传为偪阳君求言葬处。"

《谷梁传》云："齐桓之霸，灭谭，灭遂，降彰，迁阳；晋文之霸，执曹伯，逐卫侯；悼公之霸，灭偪

阳。”由此可见偪阳之战在春秋诸侯争霸史上的重要地位。

1990年6月4日

补　白

偪阳古砖

峄地，古陶器颇多，而以偪阳砖为甲。其制古拙无文，长尺有咫，宽半之，质坚重逾于金石。人得之以为砚，付手民治之，锋刃不能入也。

（《峄县志》卷二十五《搜遗》）

幅军起义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山东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原峄县运河两岸爆发了幅军起义。他们高举反清大旗，与其他地区的捻军、黑旗军、白莲教军相呼应，活动在峄（县）、滕（县）、邹（县）、沛（县）、邳（县）、铜（山）、临（沂）、郯（城）、平（阴）、费（县）、兖（州）等县，长达10年之久，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853年，太平天国军控制了长江中下游一带。清朝政府在南方征收的皇粮，只得由原来的漕运改为河运或折收银钱。这就造成几十万漕运工人失业，加上连年灾荒，黄河决口，大批饥民流离失所，无以为计。清咸丰六年（1856年），由李希孟等人，组织运河两岸受压迫的农民、失业运输工人起义。官府令郭逢春治剿，招致失败。又令蒋侯庆治剿，李希孟中了蒋的埋伏被杀害。是年清明节，刘平（原名刘平先，今台儿庄区侯孟乡人）在峄县南部地区率饥民万余揭竿起义。李希孟起义军的余部与其会合。他们头裹一幅一幅的白布，故称“幅军”。他们以云谷山为依托，提出“劫富济贫，除霸灭强”的口号，攻城夺寨，占领了台儿庄以西运河两岸。起义军整顿军纪，公举刘平、刘双印、牛闺女、孙

葆珠、滕四等人为幅军首领，布告各地百姓："倘有不法侍类及无赖兵丁，强买强卖，许尔等立禀巡司，送交盟主，尽法惩治，决不宽贷。本盟立志在安良，尔等幸毋疑贰也。"由于起义军纪律严明，保护百姓，所到之处，倍受广大人民的欢迎。

1860年夏初，刘平率部攻下偪阳城，并以偪阳城为据点，安营扎寨，太平天国封刘平为"北汉王"。他以500精兵为卫侍，率领起义军万余，骑兵数千，占领峄、滕大部地区，总领全部幅军。幅军将领刘双印、牛闺女、滕四率领万余人占领云谷山，刘双印为云谷山"大幅主"；李如林、殷运分别占领龟山、黄山；孙茂庾、刘兆灿攻占马头围子；孙葆珠、岳相灵、张四瘪子等部游动配合。这几部分队伍多者万余人，少者数千人，凭借有利地形，发展根据地，抗拒清军，纵横驰骋在峄、滕两地区，与清政府峄、滕知县壁垒相望。知县在城中诚惶诚恐，号令不能出署，城外所有粮银捐税，皆为幅军征收，县衙不敢过问。这种局面达一年有余，百姓安居乐业。

峄县知府无力抵挡，遂奏于清王朝请求援兵，清王朝敕命副督统德棱额率骑兵2000人，近逼峄县境，剿杀幅军，被幅军打得溃不成军，德棱额躲在峄县城不敢迎战。同年农历九月，忠亲王僧格林沁统率八旗劲旅至峄县，亦不敢言战，企图以招抚为诱饵消灭幅军。幅军拒不接受招抚。清将副都统德棱额，欲与幅军交往通讯，以便打探幅军情报，幅军也未上当受骗。假托刘平奉天王洪秀全之命南下，招募部队，无人作主接受招抚，以拖

延时间，部署兵力。运北诸寨由刘双印、牛闺女、孙葆珠等各带数千人在各山隘修筑工事。并以接“北汉王”刘平为名，聚集约10余万幅军，以偪阳城地区为根据地，扎营数十里。清将德棱额龟缩峄县不敢出城，令其部将翼长索尔固善率偏师进攻幅军驻防台儿庄的营区。翼长索尔固善以勇将闻名，平日常自吹自擂。德棱额令其出兵也不好推辞，遂率精骑百余，冲闯台儿庄幅军军营。幅军见清军甚少，产生了轻敌思想。清军四处冲杀，乱放高箭、火炮，幅军伤亡很大，牺牲数千人，被清兵逐入运河中溺死者万余人，河水为之断流。清将德棱额见幅军损失惨重，遂减轻了恐惧心理，为了争夺战功，亲自率2000精骑，进攻幅军主寨偪阳城，幅军士兵“翻江龙”叛变投敌。此时幅军首领刘平正在为起义军受挫而十分恼火，见德棱额兵临城下，想起阵亡的兄弟和叛徒“翻江龙”，复仇的怒火涌上心头。即令孙葆珠斩杀叛徒“翻江龙”。孙葆珠深夜闯入敌营，正碰上“翻江龙”寝帐，当即砍下其头颅，悬挂在敌军营帐之上。清军发现后，乱作一团，惧怕自己的脑袋让幅军偷去。德棱额严令部将加强防守，又派士兵到偪阳城前骂阵。“北汉王”刘平令弓箭手乱箭齐发，射死清兵无数。自己也取出一支利箭，亲手将清将琦胜射死。刘双印闻讯，从云谷山赶来救援，与偪阳城刘平幅军里应外合。刘平斩杀翼长索尔固善，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直奔蝎子山。经查点人数，方知孙葆珠没有突出来。刘平复又返回敌阵，救出了孙葆珠。刘平受了重伤，幸遇捻军首领赖文光率部前来救援，大败清军。刘平由其夫人相护，

边打边撤。德棱额想趁机追杀刘平，被刘平的夫人刺成重伤，摔下马来，滚入山沟。双方各自收兵回营。刘平在养伤期间，被其卫侍暗杀。刘平牺牲后，幅军共推云谷山大幅主刘双印为首领。

刘双印见清军倾巢出动，土豪劣绅云集峄、滕县城避难，后方空虚，即令各部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扰其后方。孙葆珠等诸将分别袭击了西集、马头、两河岔、冯家庄、刘家庄、饮马河、薛河等诸围子，皆获全胜。各乡团练均被缴械解散，制裁了豪绅恶霸，周济了灾民。孙葆珠又率精兵千余，奔袭棠阴围子族家富豪，杀了劣绅。幅主刘双印亲自率部攻打文王峪团练统领韩培正（外号韩七）的老巢，击毙武生韩金栋，杀死团练首领韩培正，为民除了一大害。幅军四面出击，攻打各乡富豪，受到百姓的拥护。幅军乘胜攻克夏镇，火攻滕县城未克。次年，又攻下郭里集围子，消灭了统领常督守军，缴获精骑2000。邹、滕、峄等县大多为起义军控制，达两年之久。僧格林沁亲王无可奈何，奏请清王朝派兵助剿。

1863年农历四月，清政府派总兵陈国瑞主攻起义军，命张振荣亲督各乡团练与驻防清军配合围剿。僧格林沁本人亲率大兵围攻龟山、黄山的幅军。月余，迫使龟山、黄山的起义军退守云谷山。继而又围困云谷山数月。清将董振九断绝了幅军的粮道。云谷山寨中幅军万余粮草皆绝，不能支持，遂弃山寨突围，奔赴邹县猴子山、白莲池与白莲教军会合。幅军突围时将清将张振荣击毙。陈国瑞得知幅军突围，当即统率兵马围剿邹县猴子山的幅军和白莲教军。这时，白莲教军首领宋继明和

幅军首领刘双印均在白莲池据守。白莲池连环 9 座大山，山峻路险，起义军在此驻守年余。陈国瑞大军一到，众起义军均带上红兜兜，号称“红孩儿军”。幅主刘双印率部迎敌，陈国瑞派副总兵郭宝昌绕到幅军背后，切断了幅军的退路，又令部将康锦文率兵埋伏于山腰，横拦劫杀，陈国瑞率军冲其中坚，3路夹攻幅军。幅军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牺牲1万余人。大幅主刘双印等20余人被俘，全部退回寨内，固守不出。清军攻打月余，数战不克。七月以后连降大雨。九月，陈国瑞乘起义军防守松驰，即令其部于雨夜攀登山崖，偷袭山寨。白莲教教首宋继明、刘锦春等及其大部战死。余部向东撤退，以抱犊崮山区为根据地重整队伍，推举杨谋、萧沅、王存、王滦子等为首领。1865年春，清军又来围剿，并纵火烧山，起义军大部被烧死。逃出的皆被清军掳掠斩杀，其状惨不忍睹。至此，幅军起义结束。

幅军大起义爆发于峄、滕地区，驰骋于整个鲁南和苏北边区，打击了清政府的地方势力，动摇了反动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幅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不畏强暴，反压迫、反封建统治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枣庄人民。

（枣庄市历史学会、枣庄市
教学研究室《枣庄史话》）

张爱萍与台儿庄大战

贺茂之

提起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几乎无人不知是国民党军痛歼日本侵略者的一次战役，但很少有人知道共产党的决策者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更少有人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当年与这场大战的关系。笔者有幸看到了一份有关史料，并专此拜访了张爱萍将军。

张老将军度过81寿辰不久，较前胖了些，红光满面，精神矍铄，慈眉善目，依然不减温文尔雅的儒将之风。

当我提起这个话题时，张老笑了笑，缓缓地说：1965年，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归来。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同志在四川饭店设宴招待，让我和又兰出席作陪。李宗仁先生握着我的手看了半晌说："我们很面善哪，是在什么地方会过？"我逗趣道："总统大人是贵

---

* 贺茂之，台儿庄区薛庄乡孙苏庄村人，1947年生，1965年入伍，大校，现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会员，有纪实文学散文集《武将文官》问世。

人多忘事呀！在台儿庄战役前……”还没等我说完，他猛然讲道：“啊，对对对！你是当年周恩来主任派来的那位高参。台儿庄大捷有你的大功……，哈哈。”张老转身向我笑了，摇了摇头说：“这哪有我的什么大功呀！我只不过是受周恩来、叶剑英的委派去了一趟徐州……”

原来，“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为所欲为。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更是骄横不可一世，罪恶的铁蹄占领我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济南等铁路沿线主要城市，并且企图南北夹击，打通津浦线，攻占徐州，窥伺武汉，以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当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武汉任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中央局）副书记。他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忧心如焚：“三军可夺气，将帅可夺心。”不狠狠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就难以阻挡侵略者的脚步，也难以振奋中国人的抗战热情。分析形势后认为，驻守徐州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应该率部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对日军大打一仗，以挫其狂妄之气。适逢凑巧，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奉命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行前专门拜会了周恩来、叶剑英。周恩来、叶剑英当即向他提出了上述建议。并强调，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就敌军的动态看，”周恩来指着地图说：“敌军已经注视台儿庄。台儿庄系鲁南重镇，与江苏省隔河

相望，有水陆码头之称，是交通咽喉，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我集中优势兵力，可将敌歼灭在这里。至于津浦线南段，”周恩来左手卡腰，右手轻轻拍了拍前胸说，“我新四军参谋长、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可率部配合贵军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转战淮河流域，阻止日军北上。阁下与宗仁先生可放心大胆地指挥‘守点打援’。”白崇禧应允赴前线向李宗仁面陈此建议。这是1938年3月初议的此事。

可是，几天过去了，仍不见李宗仁的行动。而日军坂垣、矶谷两个师团正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并策应津浦路南段敌军的攻势，企图合围徐州。

“大概是3月9日，”张老回忆说，“周恩来、叶剑英二位把我叫去了。恩来同志说：‘给你个特殊任务，到徐州去会一会李宗仁先生，看他什么时候同日本打这一仗，要帮助他下这个决心。’接着，他们两位把形势任务及我们掌握的确切情报一一向我讲了。周恩来同志最后叮嘱说：‘李宗仁先生抗日爱国，桂系军队骁勇善战，担当此任是有把握胜利的。你要设法动员他尽早打这一仗。”当天，我就起程直奔徐州了。”

当时，张爱萍还不满28岁，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任高级参谋。笔者有幸见到过他那时的一张照片，目秀眉清，英俊潇洒，一派威武之气。当他西装革履地站在李宗仁面前时，李宗仁不禁自语：“周公麾下多俊杰！”

“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李宗仁先生，”张老陷入了回

忆，“他身个不高，两肩倒宽方平直，一双不大的眼睛非常有神，和蔼中透出威严，一头稠密的短发略带灰白，年纪约有40多岁。看神态，是位反击性很强的人物。他亲切地请我坐下，就开始了交谈……”

张爱萍首先向他转达了周恩来、叶剑英对他的问候，遂向他通报了有关敌情。接着，单刀直入：“前不久，恩来同志请白崇禧先生转达司令长官一个建议，恩来同志让我前来聆听司令长官的高见。”

“周公所见极是，只是如何实施，正在考虑之中。”李宗仁说罢，陷入了沉思。

“司令长官，”张爱萍说，“恕我直言。”

“请讲。”

“依愚之见，此战非打不可，且宜早不宜迟，宜聚不宜散，宜速不宜缓。”

“请讲下去。”李宗仁颇有兴趣。

“对日军，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只想保存实力，置国土沦陷、人民涂炭于不顾，已经失去了民心。八路军平型关一战大振人心，国民军如何行动世人瞩目。司令长官崇尚民族气节，抗日爱国有口皆碑。恩来同志多次讲道，司令长官组织指挥此战定能稳操胜券。广西军队素以雄武善战名扬四海，其他地方军多受蒋介石排斥，此来前线，一是为了抗日，二不能说没有扬眉吐气之意，故求战心切。只要晓以大义，定能同仇敌忾，协力奋战。打胜此仗，既为我中华民族争气，更为长官所辖军队扬名，何乐而不为呢？”张爱萍稍微停顿了一下，看了看李宗仁。李宗仁未作任何表示，依然是那副静静倾

听的神态。张爱萍不禁加重了语气："日军骄横，目空一切，实在欺我中国无人。而且，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军人，也不能容忍他们继续下去了。骄兵必败，且孤军直入乃兵家所忌，正是予以打击之良机。上述几点，是否可以证实此战非打不可，且宜早不宜迟呢！"

李宗仁微微点了点头，示意张爱萍说下去。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恩来同志主张'围点打援'，就是这个道理。这也就是宜聚不宜散。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速战速决，把敌人消灭在不可一世的骄横之中，故宜速不宜缓。"

张爱萍说到这里，略微停顿一下，又说："济南、徐州一线地形复杂，乃伏兵之地。据我们所知，以司令长官统率的兵力在此布阵，定能获得胜利。我八路军在华北地区还可作战略配合。司令长官，歼敌寇扬国威振民心留青史，万望勿失此良机！"

"很好，很好，张将军年轻有为啊！"

"不不，我只不过是转达恩来与剑英二位的意见。"

"请转禀周主任，"李宗仁不大的眸子里泛起了激奋的神情，"请他候我捷音！"

当天下午，李宗仁又同张爱萍一起分析了敌情我情……

张爱萍离开徐州的第三天，李宗仁就把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召到徐州，命令他率部到台儿庄布防。

3月23日，鲁南古镇台儿庄响起了隆隆炮声……

我参加了台儿庄大战

刘培植

1937年冬，51军接到命令：南下蚌埠和临淮关，阻止南京方面的日军向北打通津浦路会师徐州，固守淮河北岸。部队刚刚在胶东打下基础，立足未稳，又要南下。军工委认为，胶东半岛具有较好的战略地形，我党在此也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因此准备把我们掌握的部队拉出来，继续留在胶东打游击。长江局来电，不同意军工委的意见，指示我们随部队南下，直接参加对日的正面作战。

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国民党表现了坚决抗日的积极性，作战还是比较努力的。1937年8月13日，敌人进攻上海。在人民的支持下，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抵抗，坚持了3个月，11月11日上海失陷。随后，敌人分四路进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12月13日南京失陷。于是，日军由南京、芜湖、镇江分三路渡江北上，与从华北南下的日军夹击徐州，企图打通津浦路。

1938年初，第五战区调动51军南下，来到淮河北岸驻防，阻止日军北上。淮河保卫战是抗日战争开始后，

---

* 作者当时系51军中国共产党（地下）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离休前为农业部副部长，现为全国政协委员。

继八路军115师平型关战役之后，在国民党战区（正面战场）进行的第一个战役，亦是51军的处女战，因此，意义重大。在战前，我党军工委号召全体党员带头，首战必捷，以增强该军的抗日信心。

战斗开始后，党员和党的同情分子身先士卒，视死如归，负伤不下火线，英勇顽强。684团1营营副罗广智同志反击越过淮河之敌，率全营英勇反攻，迫使敌人背水为战，罗虽身负重伤，仍然奋不顾身地指挥战斗，直至这股敌人全部被歼，最后罗也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何刚坤同志原是抗日先锋队的排长，在战斗中他身受重伤，依然坚守阵地，直到英勇牺牲；原学兵队员黄金栋同志(非党员，天津武清人)，在战斗中勇敢地扑向日军的防御工事，硬是从枪眼里夺出一挺轻机枪，因负重伤不愿做俘虏，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营长郎振钧更是英勇不屈，他负伤后满面是血，继续指挥作战；党员连长李长汉、林千和杨国治同志身负重伤，我把他们3人送到曹老集，扶上火车去养伤。

51军在淮河浴血奋战，迎头顶住了日本侵略军的进犯，大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军民士气，戳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同时也使51军受到了战斗的洗礼。

1938年3月底4月初，51军奉命回师北上，参加台儿庄战役。这次战役是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正规军对日作战最成功的战役。由于日军轻进，中国士兵奋战，台儿庄人民的支持，国民党军队取得了歼灭一部分敌人的胜利。51军在这次战役中打得十分英勇，全体

党员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起到了冲锋在前、不怕牺牲的模范带头作用。

680团8连地下党支部，在书记孙谦同志的领导下，先后在该连发展了19名党员，而且将全连5名军官都发展为党员。该连在台儿庄战役中，奉命开赴兰陵一带抗击日军进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在进攻东杨楼据点时，一夜攻占了3个碉堡，并把敌人全部烧死在碉堡内。在邻近左右的部队都已撤退之后，全连在连长孙清溪(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张则三等连排长的带领下，顽强战斗，掩护大军撤退。全连坚守阵地，视死如归，最后全部光荣殉国。日军在这次战斗中以重兵拚死争夺战略要地邵庄。51军和680团奉命进攻邵庄，团长于学道（51军军长于学忠的弟弟）指挥战斗，但他畏敌，指挥不力，几次向师长打电话请求增援。当时增援是不可能的，于学道便在敌人的隆隆炮声中逃跑了。敌人死守邵庄，枪声密集，炮火连天，照明弹把整个前沿阵地映得通红。这时，我挺身而出，依照进攻命令，继续指挥党员营连长向敌人猛攻。在火线上横向活动，联系各营部队，激战一天一夜，敌人败退，夺得战略要地。事后，于学道被撤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表扬说："团长贪生怕死逃跑了，传令兵指挥打胜了。"其实他并不知道传令兵是谁。贾家铺子战斗中680团、683团和684团打得英勇，打得顽强。但敌人增兵很多，我们伤亡惨重，在麦地里抬不起头，我把范离同志派往26路军去工作（让他躺在地上滚动出了阵地）。我和同志们坚持到晚上撤出阵地，随部队从徐州突围，一夜加半天急行军

180里。

我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对杨楼（我们一个连壮烈牺牲攻下的）、邵庄的战斗情景，作了如下报道："杨楼、邵庄，一片瓦砾，敌尸遍野，行至三里庄、邵庄时，见倒地敌尸三五成列，败毁之战车则如死鳖匐状殊可笑。乡民指邵庄为敌军埋尸所，隆然成堆……全庄敌兵于六日晨全部消灭，庄中遗尸不下百余具，腥血施流转为暗黑色。……邵庄、兰城均有激战（敌增兵4个师团，夺回邵庄），中日军队各战一半，坚守不退，以致演成激烈混战，为切断陇海线东段之交通，""敌调来14个师团，大举进攻，不意鲁战第二次会战又遭顿挫。"

以上这些报道，反映了台儿庄大战的激烈程度。其实，李宗仁只知道我是"传令兵"，而不知道我是中共党员。"传令兵"指挥作战本没有什么奇怪的，是党给了我力量，党给了我智慧和勇敢。

台儿庄一战，冲昏了蒋介石集团一些人的头脑，速胜论调更加传播开来。国民党政学系报纸公开提出台儿庄战斗后的徐州战役是"准决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51军进驻徐州城时，也被这种论调所迷惑。但是，正当国民党大吹大擂和大量集中兵力于徐州前线的时候，日本侵略军调集了14个师团却乘隙从徐州两翼迂回插入，切断了国民党军队的后路，使国民党军队立即陷入极端混乱之中，几十万大军迅速崩溃，"徐州会战"霎时成了"徐州突围"。

兵败如山倒。此时的徐州城内，已是一片狼藉，国

民党部队溃不成军，军官们纷纷换上便衣，扔下部队不管，只顾自己逃命去了。军中的一些女兵和女学生哭天嚎地，有的说："谁把我带出去，我就嫁给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地下党员挺身而出，自觉地保护和维持抗日有生力量。113师张炳南旅长（中共党员）、114师贾陶副旅长（中共党员）在率部突围的同时，收容溃败的散兵游勇万余人，我和贾陶、徐瑞林等同志也把贾旅完整地带了出来。5月19日徐州失陷。

补白

冬日抒怀

栗由思

独坐高楼思悄然，
天涯作客又经年。
荒芜云树迷归路，
浩瀚烟波放钓船。
霜满小园花事了，
秋残大地露珠圆。
衡阳雁断音书香，
愁对西风涕泪涟。

1974年11月26日

台儿庄大战中的神炮手

苏杨志　崔　铭

1938年初，日军沿津浦路南下，到达徐州以北地区。正当我三十一师池峰城部与敌在台儿庄展开逐屋争夺、浴血奋战之际，其先头坦克已绕过台儿庄，直逼运河渡口。我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严令警卫团在河南岸列阵，下达了“如有擅自渡河南退者，格杀勿论”的命令，以抑制败退的部队。正在这时，一列火车由武汉方向开到徐州，运来当时我国唯一的一支机械化部队二〇〇师的战防炮团一个连。该连有德造三七战防炮4门。连长是黄埔9期一位同学，因公务在武汉逗留；部队由连附苏杨志率领，向孙连仲报到。孙正在火冒三丈地训斥那些被坦克追击下来的部队长，听说已枪决了两名军官。一见战防炮连来报到，立即命令：“你们马上进入阵地，挡住坦克，打完了再吃饭！”又命令警卫团长：“马上派一个营负责掩护。如有失误，提头来见！”气氛十分严肃、紧张。

炮阵地设在运河岸河堤上，掩护部队在河北岸河堤

---

* 苏杨志、崔铭，均为黄埔11期学生，苏杨志时任第二〇〇师战防炮团连附。

上。有一条大路由北边穿过一个村庄直到河边渡口。村庄距河边约500米，由河南岸阵地上可以瞭望到村北大路上的动态。其他大部队分别在村庄大道两侧隐蔽。当阵地构成火炮进入完成射击准备时，已发现村北大路上有7辆坦克向南行进。这时，台儿庄方向枪炮声仍在继续，敌军坦克竟然没有随伴步兵，狂妄地认为，只要几辆坦克就可以长驱南下。我们是经过较长时间严格训练的炮兵，严阵以待，准备全歼这几辆狂徒乌龟。战场上，除了北边的炮声外，一片寂静。但当第5辆坦克开出村口时，先头1辆已迫近步兵阵地，官兵们都回头看炮兵的动静，似乎在催促发炮。炮阵地官兵一再摇手示意，要他们沉住气，想等最后两辆出村后再射击，来个全歼。但是，他们却一个个慢慢向后缩，甚至营长也缩下河堤。无法再拖迟了，于是下令开炮。600米以内，正是那种火炮的最佳射程，第一、二炮分别命中首尾两辆；三、四炮命中当中的两辆；第一炮有机会射出第二发炮弹，命中另外一辆。顿时，5辆坦克起火，车内敌兵逃奔。就在这同一时间，我们的步兵似闪电一般从各个隐蔽点跃起，齐声喊杀，全面围攻上去，那种铺天盖地的人流汹涌的场面，简直无法形容。敌后续的坦克见状不妙，在村内掉头加油逃窜。我们的步兵战士似乎忘记手中武器制服不了这装甲兵的困窘经历，一直追击出去大约二三十里，直到把敌军后面大摇大摆前进的步兵冲垮，阻止其接近台儿庄地区。5发炮弹稳定局势，并为尔后的决战创造了条件。当年各大报纸上，均头版头条大书特书了这次胜利。

孙连仲司令派副官长来慰问说："孙司令想起你们还没有吃饭，叫拿500元来给兄弟们加餐。"事务长拿着钱到街上去买肉，正好遇见一个人推了一片猪肉叫卖，一个军官正在讨价还价。此时街上再没有肉卖了，事务长抢上去说："他嫌贵，我全买了！"买肉的军官不依，发生争执，最后闹到司令部。原来是司令部的副官买肉，要招待来战地采访、慰问人员的。孙连仲听说是和小炮队发生争执，没有批评训责，反而哈哈大笑说："算了吧！小炮队立了大功，肉给他们吃，钱由司令部付，我们不吃肉也高兴！"

日军血洗兴桥村

郭万仓

父女逃难

兴旺桥村，地处台儿庄区泥沟镇北，枣徐公路线上，古老的晒米城下。据传说，古时候这儿有一条河，现在村内还保存着河的原型的沟和汪。沟、汪两边，绿树成荫。这个在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不占位置的村庄，却在公元1938年4月18日发生了一场灭绝人寰的大惨案。

当年，村上住着陈家老哥儿俩，老大叫陈桂良，老二叫陈桂本，都已是50开外的人了，都是老实巴脚的庄稼汉。老哥儿俩跟前各有4个儿子，老大的4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前3子均已娶妻生子，第4子乳名丑妮，年近18岁。虽说他名叫“丑妮”，其实既不“丑”，也不是“妮”。可能是由于父母过于疼爱的缘故吧，特别给他取了个女孩名。他现在已长成了一个剽悍的小伙子。只见他中等身材，肩宽膀阔，腿壮胳膊粗，一张长方形的脸，眼睛不大却很有神，厚厚的嘴唇，上排牙齿的两侧各有一个小虎牙，这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半点丑陋感，反而更增加了他淳厚、刚强的色调。他已经跟赵庄村老汉田永山的大女儿定了婚，只是还没有完婚。

如今再说田老汉一家。自打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正月底日本兵进了台儿庄地区，二月初，田老汉就带着全家几口人离开了赵庄村。有时在山坡上蹲几天，有时在树林里住一夜，有时在野地里趴两晌。后来，田老汉听人家说，峄县城南关外有个耶稣教堂，日本兵不进去杀人，就带着全家老小奔峄县城去。谁知，到那一看，呀，到教堂里避难的人山人海，连个蹲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全家只好在墙外挨了一夜，天明就向峄县城北关奔去。

刚进南门，就见人们四处没命地跑，接着就听见了枪声，日本兵的嗥叫声，老百姓的哭喊声。顿时，整个峄县城翻了天。日本兵见人就杀，见女人就奸。

田老汉这时也顾不得什么了，拉起大妮就向郭家菜园跑去。那里有一口水井。田老汉当时心里早打定了主意，真要是日本兵来了，就叫大妮朝井里跳，宁愿淹死，也不能叫日本兵给糟蹋了。田家父女一口气跑到园边，远远看见井周围坐满了人，每个人的脸色都吓得蜡黄。那么多的人，竟没有一点声响，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生怕弄出点什么动静，招来日本兵，惹来杀身之祸似的。原来，这些人都是年轻的妇女。她们全都有同田老汉一样的想法，日本兵来了，就往井里跳。

田老汉爷俩一看这里不行，折头就又向北跑。跑出没多远，绕过一堵墙，看到墙根下有一口地窖。田老汉随即就把闺女推到里边，他趴在闺女的身上，不敢出声。这时，只听见井那边有日本兵的狞笑声，“卜通”“卜通”的跳井声和年轻女子们的哭喊声。翻译官大喊

大叫："上来，上来，给你们绳子；不然，开枪啦！"接着就是石块投击声，疯狂的机枪声和女人的尖叫声……。

田家父女俩在地窖里，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只觉得里边黑了，周围一点动静也没有了，这才慢慢地从地窖里爬出来，看看太阳快要落山了。爷儿俩松了一口气，这时才想起一家人早跑散了，只剩下他们爷儿俩了。待他们路过井旁时，只见井旁有几具尸体，到处是血；井里的尸体与石块混在一起，井水全是红的。

爷儿俩又找到个地方挨到天黑，连夜出城，绕道回家，不想在泥沟镇西张山头前的荒草路上，遇到了他的亲家陈桂良一家。

荒野成亲

同时出来逃难的两亲家，在这荒郊野外里邂逅，心情可想而知。两家人横七竖八地蹲着，躺着，说着，哭着，把几月来的苦难经历向亲家诉说着。

"老哥，这几个月，你们全家人咋样？"田老汉关切地问。

"还好，还好，全家24口人，没有什么闪失。你们呢，老弟？"

"唉，别提了，我们一家在途中跑散了。你看，"田老汉用手指了指身旁的一个人，"只有我们爷儿俩逃到这里来了。"

陈桂良这才注意到站在老亲家身旁的人。只见这个人，满头黑发乱蓬蓬的，用一块带补丁的脏布胡乱地包

裹着，脸上满是乌泥，不知是泪痕还是汗道。上身穿着老年妇女常穿的破褂子，又肥又大，象个半大袍子；下身是厚厚的黑粗布裤子，两只男人常穿的旧铲鞋，套在满是乌泥的脚上。这个人羞答答的，低着头一直不言语。

好半天，田老汉才若有所悟地对这个人说："大妮，这是你公爹，快过来见见。"那个被叫做"大妮"的微微抬了一下头，轻轻地喊了一声"爹"，羞得连耳根都红了。陈桂良这才明白，始终站在亲家身后不出声的人，原来是自己未过门的儿媳妇。看看这身打扮，谁会相信是一位未出阁的少女呢！

陈家老小一听说是自家未过门的媳妇，齐围了过来，抚摸着，寻问着。

这时，田老汉用手抹了一把老泪，对亲家说："老哥，我总算对得起你了，大妮没有什么闪失。今天在这里与你们陈家见了面，妮她娘没在跟前，我就把她交给你们陈家吧！"说罢，又顿足痛哭不止。两家人又哭了多时，田老汉止住了哭声，哽咽着说："今天咱们见面了，不知明天怎样。我想把两个孩子的亲事办了，也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老哥你说行吗？"

在这荒山野地里，又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怎么能办婚事呢？陈桂良老人一时被难住了，大家也都沉默了。

还是陈家大媳妇的脑子来得快。她忙站起来说："两家的老人别迟疑了，到什么时候办什么事。咱们急事简办，以后再补，来个插草拜堂吧！"

她这一提醒，老人们一琢磨，真合适，就这么办。

于是两家人都忙了起来。她们把田家大姐“打扮”了一番。所谓“打扮”，也不过是把她那件肥大的上衣脱去，露出随身穿的衣裳；解开破头巾，用手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再用手干搓了几下脸上的泥与灰，就算是净了面，搽了粉。虽然这样“打扮”，却还了田家大姐的女儿本相。只见她长方形脸儿，带着一种少女所特有的娇柔气；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给两排长长的睫毛一衬，显得非常秀气；身材修长，已进入了青春发育期；肩膀微宽，从举动上可以看出她那矫健的姿态。与陈家“丑妮”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两家人共同选择了一块平坦的开阔地。这块地很方整，又是在十字路口上，意思是平平安安四通八达。陈家大媳妇在地上划了一个方块形，表示八仙桌；在方块内堆了8堆石子，表示8样供果；在石堆下方堆了4堆净土，表示烛台；每堆净土上各插两支长长的劲草，表示大香、婚蜡。这时正好是日正午，一对新人背南面北，陈桂良夫妇在上首站立。结婚典礼仪式就开始了。陈家大媳妇是主婚人。只听她口中念念有词：

上为天堂地为房，过往神灵降吉祥。
丁时丁卯遇灵光，患难夫妻百年长。
插草为香跪在地，同心同德祝上苍。
一拜天地神保佑，二拜高堂爹与娘，
夫妻对拜双双亲，喜气洋洋入洞房。

他们小夫妻俩拜得那么认真，那么虔诚，起扣跪拜，一丝不乱。生怕哪个动作不合规矩，触怒过往神灵，不得保佑似的。当大嫂唱到“喜气洋洋入洞房”，

小俩口抬起头来刚要走时，禁不住相对笑了。“入洞房”，“洞房”在哪？全家人也跟着笑了，笑得那样苦涩。

就这样，小夫妻俩就算成亲了。

严惩恶魔

正当两家老人了却了一桩大心事，各自掏出旱烟袋，按上老烟叶，用火刀、火石打着火吸烟时，突然，远方响起了几声枪声，顿时打破了大沙河西、张山头前被当作结婚礼堂的旷野上的欢乐气氛。人们惶恐了！

田老汉慌忙磕了两下旱烟袋，把烟袋包一缠，朝腰里一掖，对陈桂良老汉说：“听说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与日军大战了一场，日军吃了败仗，败退下来，到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咱们不能再到处跑了。眼下麦子也熟了，该回家收麦子了。老哥，我想去把她娘几个找回家，你打算怎样？”

“我想摸着回家看看。”陈桂良说。

两亲家洒泪而别。田老汉只身去找亲人。陈家20几人中又添了一位新娘子，互依互偎地继续逃难。第二天，他们见逃难的人陆续回家，全家一商议，便连夜向家奔去。这天是4月17日，天明是4月18日。

陈家老宅座落在兴旺桥村北头，住宅后有一片深坑，名叫夏家洼。这里旱天无水，连雨天才有水。今年天旱，坑里无水。

太阳老高，他们就到了家。家，这还算家吗？三进院落的四合房，院墙全倒了，房屋几乎被烧光了，只有

几堵屋墙站立着。面对此情此景，全家人都哭了，女人们哭得尤其伤心。但哭又有什么用呢？陈桂良老哥儿俩、小弟兄几个，擦擦眼泪，开始收拾各自安身的地方，支起锅灶烧口热汤喝喝。这几个月，谁知是怎样熬过来的。今天到家了，该用自己的灶房烧一锅饭，一家人好好在一起饱吃一顿了。何况家里又添了新人，也算是庆祝吧！

一家人忙活着。男人们抄起镢头，扬起木锨，开始清理院落、房屋；女人们动手支锅，打水，捣米，做全家的早饭；小孩们不知道有什么愁似的，到各处蹓蹓看看。20几口人的大家庭，又象往常一样过着自给自食的生活了，袅袅的炊烟又从陈家大院升起来了。

早一天回到家的东邻王家表叔、西院赵家二哥，看见陈家院上空又升起了炊烟，知道桂良、桂本一家也逃难回来了，忙过来说话。逢遭战乱之苦，久散离别的乡亲们，重聚见面，有无穷无尽的话要说，有无穷无尽的苦水要倒。

正当乡亲们沉浸在痛苦与欢乐的交织中时，几个在外边玩耍的孩子气喘吁吁地跑回家来，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日本兵来了！日本兵来了！"

人们一听日本兵来了，顿时又都紧张起来。男人们停下了手中的活计，女人们赶忙熄灭了灶下的火，忙着化起妆来，有的说："快躲起来。"有的说："往哪里躲？"特别是丑妮反对更甚。

大家正议论不停时，两个头戴钢盔，手握钢枪，枪上插着明晃晃的刺刀的日本兵闯进了陈家，两把雪亮的

刺刀一齐对准了陈桂良老汉，嘴里不住地咿哩哇啦嗥叫着："八格牙路，死了死了的！"刺刀尖挑破了陈老汉的衣褂，胸部出血了；挑破了裤子，大腿内外血口子一道道。日本兵示意陈桂良把衣服脱下来，陈桂良没弄懂他的意思。日本兵叫喊得更凶了，一刺刀把老汉的腰带挑断了，裤子一下子退到了脚脖。日本兵又用带铁钉的皮鞋猛踢几下老汉的衣裳，看看有没有利器或枪械。老汉的腰间顿时出现了几寸宽的血槽子，鲜血不住地往外涌。男人们被逐个这样搜了身，人人身上都带着血。这两个日本兵认为这些人没有武器，才点头狞笑着。他们又看见瑟缩在墙角，低着头的一些人，便认定是女人了，便拉过一个来揪起头发一看，原来是个老太婆，口里不住地骂着。但是，他们连老太婆也不放过，用对待男人的办法，强制陈大娘脱掉衣裳，并用刺刀在乳房上、大腿两侧乱刺。鲜血从锋利的刺刀上淌下来，淌在枪把上，淌在日本兵的魔爪下。丑妮弟兄几个见此情景，恨得咬牙根。陈老汉一手捂住自己流血的伤口，一手紧紧抓住血气方刚的小儿子丑妮，不让他乱动。

两个日本兵看剩下的全是妇女，便狂叫着："腰西，腰西，花姑娘的干活，哈哈，花姑娘赛勾赛勾的……"边叫边脱光自己身上的衣服，又去逐个剥光其他妇女的衣服。陈老汉的大儿媳妇稍加反抗，便被一刺刀穿进左胳膊的肌肉里，鲜血淋漓，溅出老远。

当两个日本兵剥到陈家刚过门的小儿媳妇时，全家人都呆住了！一个日本兵上去一把扯掉她的上衣，露出

她那富有青春活力的胴体。两个日本兵发狂了，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大大的好，花姑娘大大的好！"新娘子一时吓呆了，呆若木鸡。

陈家老太太见此情景，不顾自身的疼痛，踉跄着扑过去，死命拉着一个日本兵喊道："太君，她还是个孩子……"那个日本兵转脸一看，咿哩哇啦地骂了几声，抬脚向陈大娘踢去。已是满身伤痕的陈大娘。一下子被踢了个面朝天，大张着嘴直喘粗气。

具有不受欺侮、不受压迫传统的中国人，哪能受得了，哪能忍得住！丑妮挣脱他爹的手，随手从地上抄起一根枣木扁担，两膀一用力，扁担带着风声，"呼"地一声砸在那个日本兵的头上。只听"哐啷"一声山响，这个日本兵头上的钢盔被砸掉了，这个家伙被砸倒了。这时，这个家伙想挣扎着爬起来去抓枪。好个丑妮，手疾眼快，赶上去又是一扁担。只听"咔嚓"、"噢唠"、"咕咚"几声响，扁担断了，这个日本兵惨叫一声，脑袋开了花。

另一个正在耍戏新娘子的日本兵听见声响，回过头来一看，吓呆了！待丑妮和其弟兄们各拿铁钗、铣钩直奔他去时，他惊醒了！扔下新媳妇，顾不得穿衣服，赤条条地撒腿就朝门外跑，只恨他娘给他生了两条短腿，跑得太慢。

可惜呀！后悔呀！缺乏军事斗争常识的丑妮和他的弟兄们，只追了一段路就回来了。这就给这个家，给这个村带来了灭顶之灾。

日军报复

原来，这两个日本兵是日本矶谷师团的。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一战，击溃了日本侵略军的精锐部队矶谷师团和坂垣师团，使他们几乎全军覆没。矶谷师团的残部暂时退到了兰城店乡红瓦屋屯村驻扎，而后四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红瓦屋屯村离泥沟镇的兴旺桥村只有四五里路。这两个日本兵今天窜到兴旺桥村来作恶，结果被砸死了一个，另一个如丧家之犬，飞也似地窜回了他的巢穴，招来了他的同伙，杀气腾腾地来兴旺桥村图谋报复。

待陈家父子稍一沉静，一想不好，日本兵肯定会来报复，于是赶忙拖家带小向村北奔去。男人们有的顺手抄起一件防身的家伙。谁知，刚到夏家汪底，日本的骑兵队就来了。高大的红马围着不到500平方米的干汪呼呼地疾驶了两圈，铁蹄践处，掀起一片尘土。接着便是一阵密集的枪声，陈家妇女、小孩有几个先倒在血泊里了；又接着，随着“嗒嗒”机枪声和“轰！轰！”的手雷爆炸声，陈桂良老两口同时倒下了，头上的血咕嘟咕嘟直往外涌，大地都被染红了。丑妮发狂了！“弃身锋刃端，父母且不顾。”他不顾一切地向父母倒下去的地方奔去，一下子扑到父母的尸体上，哭着，喊着，拍打着，咒骂着。哭喊着父母，呼叫着上苍，拍打着大地，诅咒着恶贯满盈的日本侵略军。

突然，只听到象滚雷，象狂风，震动着大地，带着山响。他猛抬头，呀！一匹大马窜了过来，铁蹄践踏在

平地上，尘土飞扬；铁蹄践踏在人体上，带来几声惨叫，明晃晃的刺刀不时在人群中飞舞。他的刚刚拜过天地的妻子——田家大妮，被一刀刺入腹部。只听一声惨叫，大妮一头栽倒在地上。紧接着，嫂子被刺死了，侄儿被刺死了……

丑妮眼红了！丑妮发怒了！他双眼圆睁，上牙把下唇咬出了血。他下意识地双手握住一柄铁钗，呼地一声从地上站起来，要与日军拼命了！这时，只听“轰”地一声山响，又一颗手雷在丑妮身旁爆炸了，硝烟翻滚，血肉横飞。

日军的骑兵队继续向陈氏家族袭来，马踏，刀砍，枪杀……陈家25口人，全倒下了！老年人死了，壮年人没了，青年人去了。就连小孩也没剩下，全都没有了。整个陈氏家族绝了！绝了！男人被肢解了，女人被剖腹了！鲜血呀，汇成河；尸体呀，堆成山！那个惨呀！

这些杀人的魔鬼们，杀完了陈桂良一家，还没有泄愤，又窜到了村中，发现了赵桂亭、王玉芝两家，当然也没有放过，又刀劈了这两家7口人。

历史啊，请记住；人们啊，请不要忘记！这是公元1938年4月18日，日本侵略军血洗兴旺桥村，杀死陈家25口人，刀劈赵、王两家7口人，共计32口！日本军国主义者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血债！

1990年8月15日

关于回民排的回忆

马福同

1938年初夏，台儿庄大战后，因西线日军切断了陇海铁路，驻防台儿庄的中国军队的援路受阻，于是奉命撤退。当时的台儿庄处于无政府状态，梁为环、周茂田、张广太等股土匪，闯入台儿庄，趁机抢掠。台儿庄刚刚受过战争之祸，接着再遭土匪之灾，人民重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在此情况下，几位热心公益之士自动起来组织武装力量，用以维持地方秩序，保护人民安全。家叔马东曙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搜集了一部分武器，又从自己的腰包中拿出资金购买了枪支、弹药，以他的子、侄带头，动员了台儿庄北关的回族青年（其中也有自带枪支、弹药的），组织了一个有30余人的自卫队。这既保护了当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又恢复了市场交易，还解决了群众的生活出路。

这个小规模的地方自卫武装，对于小股土匪还是可以防御对付的，而对于强大的日本侵略军则是难以抗拒的。1938年入秋，日军从枣庄派出一支小部队，占据了台儿庄，将组建不久的自卫队强行编为皇协军。我们自卫

队的所有人员，谁也不愿为日军效劳，但是为了当地群众的安全，不得不忍辱负重，暂时在敌人的统治下，继续维持地方治安。

1939年初春，我和回族青年李锡铭、洪涛（原名洪怀恩）、洪蓝田等4人，在李华坤的引荐下，首先脱离了敌占区，北去山东沂水县岸堤八路军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李锡铭被编入民运队，我和洪蓝田两人被编入地方武装队，洪涛奉命又回台儿庄串联。我婶母王宗英也来干校学习。

我们走后不久，敌人就对家叔领导的这个回民自卫队开始怀疑和注意，处处监视这支队伍的行动，限制人员的发展，并要秘密收缴枪支，解散人员，还准备下毒手逮捕家叔马东曙。在此情况下，家叔为免受敌人的迫害，预先与当时抗日游击队的营长黄九江（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二营营长）联系，终于在1939年5月率队反正，投向了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走上了抗日大道，并带出回族青年李运海、马友良、马云、宋广乾等14人，步枪11支，短枪1支。南进支队当时住在邳县铁佛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钟辉。这时，我和李锡铭也从山东干校学习3个月回来，后经山东纵队统战部部长郭洪涛分配到台儿庄作敌伪方面的工作。我们2人回到前王家村时，就听说家叔已经率队参加了八路军。我和李锡铭不能进台儿庄，就直接到了倚宿村找到了家叔马东曙，司令员钟辉和政治主任张振宁接见了我们，我们拿出干校介绍信。李锡铭被分配到政治部民运队，我被分配到由家叔所带出的那批回族青年编成的司令部通讯第二排担任排

长，家叔即被派到参议处任参议。钟司令员说："今后台儿庄再来回族青年，都要分到这个排。"台儿庄有志回族青年来参加抗日的多达30余人。

为壮大、巩固主力部队，我们这个通讯排被编为支队的主力营第一营（营长姓谢）第一连（连长张立业，指导员张邦哲）第三排，我仍任排长。回民排的组成没有被打乱。俟后，台儿庄回族青年仍接连不断地前来参军，回民排人数增加到50余人（内有汉族青年8人）。有党员16人，成为这个排的骨干力量。我三舅父马绕九虽已年过半百，也来参加抗日，担任这个排的武术教师。这个排在枪支不足的情况下，有大刀片20余把，编为一个大刀班，每到一地，即要排演练习大刀武术，并专门训练一批操刀能手。这个排当时班级领导为七班长李运海，八班长洪涛，九班长沙福才。

台儿庄回民排自编入南进支队主力营后，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得到进一步加强，战士们的军事技术、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均有所提高。排里还经常开展文娱活动，每到一地，都要和当地的人民群众举行联欢。一次移驻杨庄子村，我曾编写演出现代京剧《活捉伪县长》，引起群众的欢呼。

我们这个回民排，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邳县北部各地，与匪伪敌顽展开了斗争和周旋。据不完全的记忆，回民排参加大小战斗10多次。东桥头一仗，消灭了刘学生土匪20余人；艾山西之战，击溃了张法德股匪的进攻；还参加了夜袭临沂大李庄伪乡公所的战斗，缴获枪支7支；一次行军中与伪顽县长王化云的县大队发生

了遭遇战。为了扩大影响，1940年，支队决定在驻地50里外强袭睢宁东北处王行伪据点，伪军凭借高炮楼、大院墙顽抗，战斗到黎明，只好撤退。这次战斗，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也使伪军受到了一次教训。回民排战士沙现璋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1940年夏，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革命武装，上级命令这个支队由邳北经邳南、睢北向南挺进，越过陇海铁路，再跨海郑公路，进入洪泽湖地区。为免受敌人的袭击，我们都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七月的一天傍晚，部队在邳南“八路村”集合，黄昏后出发。为了迷惑敌人，部队先绕道向西再向南进发，一夜行军近百里，次日凌晨到达了一个叫张山口的村宿营休息，布置了岗哨，封锁了消息。天亮后开过早饭，战士们刚要打开背包休息，忽然连部通知准备战斗，梁指导员对全连官兵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他说，徐州日伪军数百人，突然袭击张山口，企图消灭我们这支队伍。营部命令我们一连正面阻击，强占西面一个小山头，阻止敌人前进，掩护司令部撤退，连长命令我们三排（回民排）为正面的左翼。不料，这时敌人已在南边山沟用火力封锁了我排前进的道路。在抢占阵地途中，我们亲密的战友李洪志同志壮烈牺牲。“张山口”这个地名我终生难忘。全排进入阵地后，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士们个个奋勇，人人争先，顽强战斗，誓与阵地共存亡。九班长沙福才用手榴弹杀伤敌人，身上负伤仍不下火线；机枪手杨福长射得又准又猛。我们用了不到30分钟的时间，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光荣地完成了阻击任

务，保护了军、政两部的非战斗人员安全转移。在第二连两道防线的掩护下，我们排顺利撤出战斗。在这次张山口阻击战中，台儿庄回族青年牺牲1人（李洪志）、负伤3人（沙福才、刘学善、刘洪业）。

1941年，陇海南进支队奉命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九旅，回民排被编入二十六团，我被调离了这个排。以后，这个排的战士都相继被提升，分散到各个连队，成为班、排、连的领导骨干，转战华东战场，都立有战功。

1990年8月22日

北新集战斗

孙晋祥

马兰屯建于东汉灵帝中平年间（184—189年），为曹操屯兵于古琅琊郡时在此设栏牧马之处。明初，燕王北征，又来此屯兵牧马。永乐二年（1404年），由龚、黄、袁、廖4姓军籍在此定居，始改为民屯。马兰屯之集市原在道庄村东古汴沂大道旁边；清初，集市南移至新安庄东；咸丰年间，捻军起义后，黄姓大户为保新安庄之安全，又将集市南移至马兰屯村后，由此称之为“北新集”

现在的北新集，只有3户人家，我家就住在这里。另外还有孔、赵两姓，分别住在河东、河西。

1939年7月18日早晨，我正在睡梦中，母亲急急忙忙把我推醒：“孩子快起来！日本人来了！”我连忙披衣而起。母亲吓得直打转，不知怎样才好。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不论穷富，是中国人都杀、都抢。侵略者每次扫荡，总是先用开路炮试探有无反抗。这次却一反常态，无声无息地来了，人们均感到不幸即将来临。

“你快走，”母亲对我说，“我和你奶奶一起走。”奶奶却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跑又跑不动，你们赶快

---

*孙晋祥，台儿庄区马兰屯乡廖巷村人。

走吧！”我看着奶奶两鬓白霜，显得更加苍老了。她为了子孙的幸福，吃糠咽菜，没过一天好日子。她最关心的就是我，叫我马上离开。

日本侵略军在马兰屯并未停留，向西北方向去了。

此时，马兰屯附近驻有两支游击队，一是龙希贞，另一是孙茂墀。虽然他二人以后都当了汉奸，但当时还是抗日的。

龙希贞（外号“瓜屋子”）当时为国民党山东第三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张里元部游击第一纵队第三支队之第三大队大队长。所部七、八、九中队，驻扎在离马兰屯七八里地的龙口、顿庄一带。

孙茂墀为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第三支队之第四团团长。就在日军扫荡的那天夜里，刚从古邵来新楼、李沟等村住下，就得到了日军扫荡的情报。在孙茂墀看来，日军不是冲他来的，因为他刚来到，日本人不会知道他住新楼的消息。他持观望态度，借机狙击日本军队。

我从家里出来，顺着河底向南跑时，正遇着三舅李恒山。他是龙希贞部七连连长，正率领部队跑步向北前进，并未和我打招呼就跑过去了。杀敌心急，我理解他的心情。

什么原因使龙希贞的队伍来迟了呢？因为他们得到日军扫荡的情报后，老、小瓜屋子爷俩持两种意见，老的想打，小的不愿意打，相持不下，耽误了时机。等“老瓜屋子”决定要打，并带一个连疾跑到廖巷村时，这时日本人已从垅子村返回，抢先占领了袁家林的有利地形。“老瓜屋子”的前锋已和日军展开了肉搏战，互

相拚杀。在双方争夺袁家林阵地的激战中，龙传道负伤了，不得不退回廖巷村固守。

李恒山带领的前锋和日军拚杀后，因被日军拦腰截断，仅剩下他和单成席2人退到小赵村去了。

这个时候，孙茂墀若不是隔岸观火，想渔人得利，而是率领部队从廖巷西面攻上去，再加上龙希贞从马兰屯的东面打过去，形成三面包围，势必全歼敌人。令人痛心的是，孙茂墀却按兵不动。

从北洛方面来救援的日军，几次都被龙希贞的打援部队打回去，龟缩在碉堡里不敢露面。

日军占领了北新集的制高点，用碌碡桥作掩护，切断了龙希贞和他父亲龙传道的联系。龙希贞曾几次组织强攻，终因敌人炮火封锁很严，未能攻上去。

李恒山已从小赵村回到马兰屯，奉龙希贞的命令去廖巷村联系“老瓜屋子”，俟天黑围歼敌人。当他从马兰屯西门外大桥闯过去的时候，一阵枪响，鲜血从他的胸口流了出来，他牺牲在大桥头上。

天傍黑，龙传道、龙希贞父子发动攻击。日军一面驱使伪军抵抗，一面做好逃跑的准备。最后，敌人拖着20多具尸体，狼狈地逃跑了。

战斗结束后，我回到家中，见祖母和二哥都惨死在敌人的炮火之中。这次劫难，使我失去了3位亲人。

记黄家坝子之战

赵沛新

在日本侵略者将近投降的时节，日伪军都龟缩在几个大据点里不再下乡扫荡了。这时，国民党鲁南军区游击队司令张里元妄图霸占地盘，独吞胜利果实。遂派遣孙业洪的主力军——一大队孙景骏部300余人驻扎在马兰屯一带，利用黄家坝子的高墙、炮楼、大瓦屋安下了据点，又大征民伕挖水壕，筑碉堡，以为久占之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为了拔掉这个钉子，特派侦察人员混在民伕中侦察了地形与火力配备，拟定了作战方案，特约请新四军淮北军区独立团(团长郑平)担任主攻，运河支队副支队长陈景龙、参谋长阎超率领一营和三营七连4个连的兵力准备打援。

运河支队前沿指挥所带领三连隐蔽在横河头村内，命令一连设伏于横河头东北湖、刘庄以西的沟湾之内，二连埋伏在坝子村后、新楼庄前，以控制新楼村内伪乡公所的行动，七连设伏于新楼村东黄家的大松林内。

1945年3月14日（农历二月初一）夜，孙景骏大队部的会客厅里赌兴正浓，闹语声喧。约夜半时分，战斗打响了。新四军独立团将坝子包围之后，由突击连首先

摸到水壕的东围门桥头堡处，敌人的岗哨2人正怀抱步枪坐着打盹。我突击连战士一个饿虎扑食，两个岗哨一死一俘，外围子门被打开了，突击连顺利地攻入水壕之内，占领了黄家大院对门的油坊院。但黄家大院墙高宅深，4个角下都有3层高的砖石炮楼，易守难攻。

这时，孙景骏仓皇应战，命令二中队孔庆洪部守西院和西南炮楼，三中队张同善部守前院东院和东南炮楼，一中队刘钦福部守后院和东北炮楼，孙率警卫排将指挥部设在西北炮楼上。交战约2小时，总指挥郑平鉴于敌方的墙坚楼高，不利于强攻，只有用爆破战术，故把轻重机枪阵地架设在油坊的堂屋脊南面，集中火力压制着敌人的前院和东、西两座炮楼，使敌人抬不起头来，失于观察封锁。爆破队扒开油坊后墙，用木杈绑着炸药包，猛扑过去，靠上了炸药包，轰然一声，大门道被炸塌了。突击连趁着滚滚浓烟冲了进去，与敌人短兵相接。经过一阵拼杀，敌军大部缴械。孙景骏听到爆炸声后，便不顾二、三两个中队了，悄悄地率领一中队和警卫排从后面逃窜了，蹚过壕沟，又被外围部队围住拼杀。一阵激战后，敌一中队长刘钦福与30多名士兵被击毙，孙景骏和几个警卫员侥幸逃脱。

3月15日上午，孙业洪亲率三大队丁建忠部200余人，从清平庄赶来救援，部队在黄口大桥头集结后，兵分三路直扑坝子。运河支队指挥员为诱敌深入，命令一、七两个连队与敌少许接战，装作败象，同时撤回横河头，命令二、三两个连队埋伏在坝子庄后干河道内严阵以待。

孙业洪部又在新楼庄前汇集，听不到枪声，也看不到人影，便由三大队大队长丁建忠率领一个中队猛扑坝子。及至干河北面约30米处，运河支队指挥员一声令下，二、三连战士火力齐发，接着猛投手榴弹，前锋之敌尽丧河边，后继之敌大败逃走。这一仗打死了孙业洪部三大队大队长丁建忠、中队长尤维瑶和一大队中队长刘钦福、张同善等军官4人，士兵七八十人，俘虏士兵约200人，跑散100余人。孙业洪部元气大伤，由此垮台。

补白

示郝鹏举

陈　毅

教尔作人不作人，
教尔不苟竟狗苟。
而今俯首尔就擒，
仍自教尔分人狗。

1947年2月

郝鹏举马兰起义

赵卓如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我党中央考虑到战略大反攻时，我们要从日军手中收复大城市的问题，提出了加强敌伪军的工作，特别是城市的敌伪军工作和群众工作，准备在条件成熟时，里应外合收复大城市。中央指示淮北区党委负责徐州、蚌埠这两座城市的工作。淮北区党委立即组成徐州和蚌埠两个工作委员会。蚌埠工委由张曼萍同志负责，徐州工委指定我先任副书记、后任书记。徐州工委一开始归淮北区党委领导，后来归华中局领导。关于郝鹏举的起义工作，是在陈毅同志亲自领导下进行的。

争取师长乜庭宾

蒋介石对西北军的政策是收买、分化、逐步消灭。郝鹏举原是西北军的，曾是冯玉祥的传令兵，深受冯将军的信任。冯在南口失败后，曾送郝到苏联基辅炮兵学校学习深造。郝和西北军的关系比较深，对蒋介石的排除异己及其嫡系部队的敲诈勒索很不满，但又没有决心

* 赵卓如，当时任徐州工作委员会书记。

反抗。1942年底，郝从胡宗南那里逃到南京投靠汪精卫，先被任命为陆军大学校长，后任伪淮海省省长兼徐州绥靖公署主任。他一到职，就大抓军队，发展自己的势力，妄想在日军投降后，在国共两党之间谋求生存和发展之路。他组建了4个师的伪军，大约两万余人，控制着徐州及其周围的县城。这些地区又都在我根据地的包围之中。因此，我们争取郝鹏举的工作是有有利条件的。

早在1942年时，我邳睢铜地委即派人打入了徐州伪军内部做工作，后来又在师以上军官中开展工作。这支伪军共有4个师，一、二、三、四师师长分别为乜庭宾、张奇、曾纪瑞和李铁民。这些人都是西北军的失意军官。一师、二师是他的主力部队，比较有战斗力。争取这两个师的工作便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一师师长乜庭宾，曾在微山湖以西地区和我军作过战，被我俘虏过。乜被俘后，我们对他很优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他释放了。他回去以后，仍然当他的师长。当时，我冀鲁豫军区同他建立了联系。但因中间隔着一二百里的伪顽统治区，联系比较困难。后来，冀鲁豫军区就把这个关系介绍到淮北区党委，淮北区党委又交给了徐州工委。

为了争取郝鹏举的工作，徐州工委的同志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主客观条件：第一，我方虽与乜有过这个关系，但从未联系过，乜现在还承认不承认这个关系；第二，乜这个师是郝的主力部队，他现在正受着郝的器重（其他师长都是少将，独乜是中将），因此，他还愿意不愿意同我联系；第三，郝的部队系伪军，是由收编的

土匪、流氓以及从根据地逃亡出来的地主等组成的，有的反复无常，有的极为反动，因此，他们会不会对我派去的代表下毒手。这些情况都应该估计到，做好准备。但同时也要看到对我有利的一面，这就是客观形势在起变化，日本侵略军快要完蛋了。日军投降后，伪军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特别是徐州处在我四面包围之中。他们虽然和国民党有联系，但对国民党亦心存疑惧。因此，要紧紧抓住这些有利条件，加以充分利用。同时，要充分发挥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还要看到，郝鹏举的军官大部分是西北军的，这个条件也是对我们有利的。因此，我们先派了一个敌工干事到他那里，很得他的信任。这就为我直接去和他见面奠定了基础。

1945年春夏之交，屯庭宾的师部移防在徐州南30里的三铺，靠近我根据地。这时，我前去就更方便有利。于是，在我地下交通员的带领下，我满怀信心地直接前去了。

一见面，屯庭宾就表现得比较坦率，首先就谈到他那次被俘受优待很感谢，并说我军纪律严明，当他一表示投降放下武器，我军即持枪，对他不仅无任何人格侮辱，而且很客气，尤念念不忘。第二次会谈就深入了，摆情况，讲形势，交待政策，特别是把抗战的形势和前途对他讲得比较充分。屯听了，频频点头，连称："赵先生之言，使我顿开茅塞。"接着就置酒款待。酒席之间，言谈较为诚实。屯说："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我一介武夫，难得赵先生下教，实乃平生之万幸。如不嫌弃，就

在舍下安息，一来较为安全，二来早晚请教。”这样，也就和我们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我们派去的那位敌工干部一直留在他那里，得到他的信任。有重要情报，他即设法立即送给我们，后来他还提出参加共产党。

另外，我们和郝鹏举的第二师师长张奇早就建立了联系，把我们徐州工委副书记庄进同志派到张那里当秘书，并派了一名干部给他当谍报员，专门负责向我们传送情报工作。我们还有几个党员在这个师的基层。同时，我们又和郝的参谋长刘伯扬建立了关系。这就为争取郝的工作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首次谈判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蒋介石派大军从亳州、商邱一路进入徐州，遂即任命郝鹏举为国民党第六路军总司令，毕书文为副司令。六路军直辖4个师。国民党军队一到徐州，就迫不及待地向北进犯。其兵力部署是：左路为国民党嫡系部队陈大庆十五集团军，沿津浦路北进；中路为三十三集团军冯治安部，从贾汪向北推进；右路为郝的第六路军，从贾汪以东的涧头集、台儿庄以西一线北进。敌人共计六七个军，20多万人，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妄图一举攻占我鲁南解放区，打通津浦线。

那时，我党中央在日本投降后，立即派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同志从延安迅速赶回山东，组织津浦前线指挥部；并从华中抽调新四军的一、二、七纵队以及鲁南的八师、沿海的九师等部队，在鲁南的峄县、枣庄、台儿庄

一线阻击敌人。

敌人北进的部署，是以牺牲杂牌军、保存嫡系为目的的。因为十五集团军西侧为微山湖，湖水弥漫，不便于我军的迂回活动。我军要打，只能从敌人右翼打起，即首先打郝鹏举的部队。同时，敌人是非常狡猾的，郝鹏举不前进，冯治安就不前进，陈大庆也不前进。此时，郝已完全陷入绝境：不前进，则违抗蒋介石的命令，有撤职查办的危险；前进，则会首先受到我军的打击。因此，郝鹏举从徐州一出发，就通知我们，想和我们取得联系，以便从国共夹击中求得生存，保存实力。这是郝当时的基本方针。

我们已摸清了敌人这一部署的目的和郝此时的心理状态。1945年11月，陈老总派津浦路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宋时轮同志来做郝的工作，陪同宋来的还有鲁南军区党委城工部部长王少庸和我。我们3人带了一个骑兵班，前往郝驻地（即涧头集）。郝驻地戒备森严，岗哨林立，几经周折，才来到郝的住所。郝住在一个大院里，他办公的地方是3间堂屋，把老百姓的东西全部搬走了，换上他从城里带来的全套东西，桌、椅、写字台等用具。我们到后，略事寒暄，即行用饭，随后开始谈判，宋时轮同志即向郝提出起义的要求。但因为是初次见面，郝不愿意马上谈起义，总是用话绕开。谈判从暮到晓，毫无进展，形成僵局。郝当时的难题是，国民党命令他立即渡过运河，以掩护其他部队北上。郝不过河不行，过河又怕我们打他。由于初次接触，起义条件还不成熟。这时，我感到应首先研究郝如何渡河的问题，至

于起义问题，则放到下一步再谈。这样一提出来，郝非常高兴，立即拿出军用地图，研究渡河路线和渡河后的驻地。这样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并指定郝的司令部渡河以后，驻在台儿庄西北18里的马兰屯。

峄县会谈

自上次会谈后，领导就决定派我作为陈毅同志的代表常住郝鹏举那里。我即带了一个警卫员住在郝处，并陪同他一起行军渡河。在这段时间里，我抓紧一切机会做郝的工作，向他解释我党和我军的政策，以消除他的疑虑。

该部队按照我们指定的路线，进驻到运河以北、台儿庄西北之马兰屯。第二天，郝即提出要和陈军长（因为陈毅同志是新四军代军长，所以一般都称为“陈军长”）见面的要求，我把郝的要求转告陈毅同志后，陈毅司令员很快就正式邀请郝到峄县会面。

郝鹏举挑选了50匹马（都是日本的大洋马），10挺日式机关枪，并由第一师师长乜庭宾、副官长唐禹九陪同，从马兰屯出发前往峄县。马兰屯到峄县相距约四五十里路，中间一带有许多小山，为我军的前沿阵地。郝所率领的人员到达我方阵地前，大约是晚上10点钟左右。由于我们联络员工作的疏忽，没有通知前沿部队，所以前沿部队不让我们通过，还几乎发生了误会。在这漆黑的夜晚，部队拉动机枪的声音都听得非常清楚。气氛极度紧张。我再三说明情况，部队还是不让通过他们的阵地，说没有接到通知。后来答应派人绕道送我们到其营

部。由于道路崎岖，天又很黑，骑兵还有摔倒的。郝很生气，说："好象押送俘虏一样。"而屯的卫兵更是乱骂。幸好营部得到了通知，立即把我们送到团部，团里又立即派骑兵护送到峄县。这已经是夜间十一二点了。鲁南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刚同志接待了我们，并把我们安排在旧县政府的一个大房子里。郝虽然穿着皮大衣，但还是冻得直流鼻涕。

我们到峄县后，用电话通知陈毅同志。他从10余里外的王庄匆匆赶来，听取了我们关于路上遇到情况的汇报，遂即步入客厅会见郝鹏举一行。陈老总敞着衣领口，不时地擦着汗，显然是风尘仆仆刚到。他精力充沛，诚恳热情，一席话说得郝鹏举等情绪活跃，一扫因路上误会而不愉快的心情，顿时气氛融洽，笑声朗朗。于是，摆上酒席，举杯把盏，相互敬酒，一面吃一面谈。陈老总胸怀开阔，性格豪爽，纵论当前敌我形势，我军主力部队多少，民兵多少，如何打法，听起来好象什么底儿全都交给对方了。郝听了频频点头，很受感动，也分析了蒋军的情况，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这次会谈，一直进行到红日东升。当我看到太阳出得老高时，心想，郝鹏举这么多骑兵，如何回去呢？便抽空把我的顾虑向陈老总提出来，陈老总说："就是叫他白天公开走，使国民党知道他和我们有联系。"我这才恍然大悟，相视而笑。我方又派出了一个骑兵排带路护送，加上他们原来的骑兵，约有上百匹马，大白天浩浩荡荡，连接数里之长，一溜烟儿往南走。沿途老百姓

和我军部队都在观看。直到中午，我们才回到郝的驻地。

当天晚上，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冯治安就派张克侠来到郝鹏举司令部。张克侠原系西北军的，是冯治安的连襟，此时为三十三集团军副司令，是我党地下党员。这时，郝把我也找去了，当着张克侠和我的面，大骂国民党排斥异己，借刀杀人，想把我郝某消灭掉。并对张说："我已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你们怎么办？"张克侠说："仰之（指冯治安）的脾气你还不知道？"意思是说，冯治安是不可能倾向共产党的。

送走张克侠后，郝又问我怎样才能参加共产党，参加共产党的条件是什么，他能不能参加共产党。我立即根据我党的纲领和政策答复了他，并说，只要你决心参加革命，共产党是欢迎的。当天，我即赶回到陈老总那里作了汇报，并受到他的表扬。陈老总连声说："好！好！你答复得好，完全正确！可以批准他入党。"又说，可以再邀请他会次面。不几天后，就在两军中间的高皇庙（现属枣庄市峄城区金寺乡）会见。我方陈毅、吴宪、王少庸等同志都到了。主要是进一步做郝鹏举的工作，为起义作好准备。

米庄会面

米庄位于峄台公路上、晒米城附近。这次会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参加会面的有陈毅司令员，华东军区政委、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等主要领导同志。会面时，饶漱石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来要

郝鹏举起义。意思是，国共两党正在谈判，停战协定很快就要签字了。一旦停战协定签字，你再想过来，我们就不好接收你了。要求他就在这几天起义。郝鹏举答应立即起义。

在这次会面中，我方保证，郝鹏举起义后，给予他优厚待遇，保证他的部队不变，一切待遇到解放区后由解放区供给，愿留者则安之，不愿留者可以回家，并且发给路费。起义后，给郝一个民主联军总司令的头衔。

马兰起义

米庄会谈后，郝鹏举立即着手起义的准备工作。他把他的副司令毕书文从徐州调来，并用大小车辆把该部军官在徐州的家属（其中包括他的姘头）都接来了。经过几天的紧张准备，1945年12月30日上午，郝鹏举率领他的全部将士两万人，从台儿庄西北马兰一带浩浩荡荡地向东开去，沿途受到我军民的热烈欢迎，

郝部到解放区后，陈毅同志对郝鹏举表示热烈欢迎。随后，为了加强领导，委任原华东军区秘书长李克靖同志为民主联军政治委员。我向李克靖同志介绍了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情况和我们原先派在郝部的工作人员后，就又回到徐州工作委员会。

郝鹏举起义后，我党对他及其部队给予了十分优厚的待遇，并给他补充了1000多名新兵。但是，由于郝的反动本性未得到彻底改造，加上蒋介石的引诱，于是在1947年春，蒋介石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的时候，郝鹏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我们的根据地保不住，当我军撤

离鲁南时，他又叛变了。结果，当时就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了他的两个师，郝本人被生俘，后被枪决，其余两个师到1949年初又先后在芜湖以西起义，参加了我人民解放军。

附：

郝鹏举简介

郝鹏举（1903——1947），河南阌乡(今灵宝)人，别号腾霄。河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入西北军。后去苏联基辅军官学校学习，1929年任冯玉祥部独一旅旅长。蒋冯阎中原大战中投靠蒋介石，后历任国民党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参议，第三十军中将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投敌，历任汪伪第一集团军参谋长，苏北行营参谋长，军事训练部次长，苏淮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保安司令，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教育长，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淮海省党部主任、省长、保安司令兼第六路军总指挥。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国民党委任为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1946年1月，在我人民解放军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举行起义，被任命为华中民主联军总司令。1947年1月27日复率部叛变，杀害派任该部的政委、共产党员朱克靖等人。投向国民党后，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鲁南绥靖区司令官。2月6日，被华东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第二纵队俘获后处决。

（《中国革命史手册》）

大陆撤退前后
流亡学生收容就读来台经过

苏 佩 言

一、艰辛岁月，相识宋公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七月十四日，兖州（滋阳）县城被共产党军队攻陷。时佩言任职县府教育科，盖应罗山李正中县长之责成为桑梓服务，不由己耳。事起仓促，惊慌失措，炮火余生，其不死者几希。次晨，率妻儿冒生死危险，突破城围，逃至乡间，暂避烽火。嗣又至济宁舍妹家匿居。适当地学生数十人欲南下就读，余遂以教师身分带队南行，由运河水道乘船至徐州，住中山北路庆云桥附近一友人家，行囊告罄，几至

＊苏佩言先生，原名秉萱，后以字行，民前五年(1907年)生于滋阳(今属山东省兖州市)。曾任滋阳县议员、教育科科长、省教育厅视察。三十七年秋，奉派办理山东各校流亡学生之收容安置工作，贡献至巨。来台后，主持高雄市政府职业介绍所，同乡、同学蒙受其惠者甚众。退休后，浸淫诗书，自得其乐。本文以其亲身经历，叙述详实，对流亡学生所历之艰险，可窥知一斑。

断炊，幸获友人资助，度过难关。

先是，七八月间，鲁西南相继沦陷，大批学生纷纷南下，集中南京，要求政府设校安置。事出突然，政府一时措手不及，至少数学生因困顿而失检之情事发生。迫于事实需要，于最短期限内成立了岱南（校址设常州）和海岱（校址设宜兴）两个国立中学，使鲁西南数千名流亡学生，均能得到安顿，有校就读。至是年（三十七年）中秋节后，山东省济南又告沦陷，大批学生又复南下。鉴于上次流亡学生集中南京时之人数众多，因食住问题发生许多不轨行动，山东省政府教育厅遂派佩言以视察名义，会同董视察锡璋，在徐州设办事处，专司收容南下学生供给食宿，在徐州民族路江苏教育学院设登记站。凡登记有案之学生，均送市郊杨屯、时屯各村庄暂住民家。俟有相当人数，即由津浦路输送至南京转江西、湖南等处设校安置。月余时间，共收容学生近万人，设国立联中八校，当时除烟台联中由青岛从海道经上海转往目的地外，其余学生均由此管道运往江西、湖南。在此兵荒马乱、遍地烽火之际，而能于困苦万难之中完成此艰巨任务，个中辛酸，概可想见。

忆在徐州工作时，一日忽闻学生次日断炊，人心浮动。当与董视察研究结果，由余徒步前往九里山外时屯、杨屯等村，面恳各村长暂借面粉若干，以资应急。蒙各村长首肯。并将面粉分配各住户，由各家妇女次早烙饼供给学生食用。余于是晚亦宿于该村。翌晨见各户妇女忙碌异常，争事烙饼，毫无怨尤。足见那时民心未失，政府尚有可为。惜不旋踵，碾庄徐州战役爆发，全

局尽墨，殊堪浩叹。

某日下午，余正在办公室整理文卷，自外来一儒者，相谈之下，方悉为久已闻名而未谋面的峄县县立中学校长宋东甫先生（峄县人），以该校师生连同台儿庄胜利中学师生共千余人，现已转进抵徐，住于江苏省立铜山中学，请即予以收容，并供给伙食。当即约定，次日前往办理接收。经与董视察会商后，翌日上午，由余前往，会同宋校长，将学生集合操场，按册点名，两校师生计一千零八十几人，即日起发给面粉菜金，由学生自炊。数日后，由余及董视察洽搭津浦火车至南京下关，转运江北岸瓜洲暂住。余二人则仍返徐州，继续收容工作，俾鲁籍流亡学生不因战乱而流离失学。

迨淮海、萧永地区战役发生，收容工作不能继续，大家跳车逃生。顿时枪声刺耳，子弹横飞，而身旁子弹落地有声，尘土起飞，所幸上苍保佑，险未中弹。为迅速逃脱现场计，急将背负唯一棉被丢弃路旁，快步行进，得免于难。董视察则因带行李过重，又不愿舍弃，致未能迅速脱离战地，从此生死未卜。此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欤？余脱险后，夜宿一农家。时已初冬，天气渐寒，夜间尤甚。棉被丢弃，仅赖一棉大衣覆盖身体，良夜沉思，久久不能成眠。

次晨，主人甚表友善，除馈赠汤水外，亲送村外，指示往宿县路途。举目了望，县城相距非遥。正行进间，突闻炮声隆隆，敌人又攻打县城矣。在无可奈何情况下，只有改道南行。过一小村，适值村人早饭（华北一带农人有门外啖食之习惯），又闻炮声，均手端饭碗

至门外观看。遇一少妇在门外进食，此时余已多时未得进食，饥肠辘辘，急待填充，观状甚为垂涎。这时，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以及自尊心理，趋前和颜悦色地向那位少妇（约二十余岁）说："大嫂，好不好将你这碗饭让给我吃？我已好久未进饮食了。"那位少妇慨然应允，即将手中所持之饭递于我手。一碗吃尽，该少妇即至家中再送一碗，并将与我同行之一男一女各给一碗。其慷慨义气之状，永生记之难忘。饭后与之值，不受。足见"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老百姓更属善良，惜为政者未能善导之耳！余行年八十有五。在这八十余年岁月中，从没向任何人伸出乞讨之手，但在流亡途中，不得不低首下气，向一村妇乞讨，在我人生旅途中是一特殊事例，谨记之。

饭后续前进行。至公路上，前面适有交通队士兵整队撤退，紧随其后。忽被敌人用步枪袭击，枪榴弹在空中爆炸，即伏道旁沟中躲避，未被击中。可见人之生死绝非偶然，冥冥中似有定数。为何余几次履险，均能幸免，本人谨信真理，绝不迷信鬼神。真理者，或许为万事、万物之主宰也。如其不然，过去之我已非今日之我，又岂能于数十年后仍居于海滥一隅，为宋公百年冥诞执笔为文也。

前行不久，又遇情况，急往道右墓地中隐避，无意中遇学生梁宗珩、梁克友叔侄二人从墓旁走出，相约再前行，又遇魏作霞、马自西等数人，结伴同行，互相照顾，方便许多。渡崮镇河时，因不谙水性，几至淹死，流为波臣。好在历尽艰辛，抵丈八岭车站，搭上火车，

始抵达南京。到温泉路山东省政府南京临时办事处报到，继奉鲁教育厅命，与毕秘书春之再去瓜洲，接运峄县中学和胜利中学千余学生南迁。过长江，自镇江东某小站（忘记站名）乘火车经上海，转杭州直驶湖南郴县。抵达后，学生分为两批，一去宜章县，为国立四联中校本部。另由宋校长率原峄中师生八百余人至栖凤渡车站转李氏祠堂（又名李家大屋）设校，定名为四联中二分校。联中校长为弓杰仁先生（来台后曾任中兴大学文学院院长，上年病逝台中）。一分校为李校长祺增（字庆祥，来台后亦病逝），二分校宋校长即为东甫先生。

初抵栖凤渡时，为三十八年元旦前几日，当晚露宿于车站空地上。次晨，校长召集全体学生训话，余以教育厅视察名义略致数语，大意谓："人生旅途中，难免遭遇逆境。际此大时代变局中，被迫离开我们的家园，跋涉数千里，来到这南中国陌生之地，举目无亲，无枝可依，将来是何结局，现在势难预料。但我们要立定志愿，坚定信心，为何而来？目的安在？不外家乡居不得，换个环境继续读书，所以今后唯一目的是读书。只要有书可读，任何艰难困苦在所不计。兹举一前例证：'七七'事变发生，学生纷纷南下，追随政府到大后方（四川）去读书。过汉江时曾因沉船，淹死学生百余人。虽历尽艰险，而继续奋起之学生意志不摇，终达目的。抗战胜利后，这批学生已大学或高中、师范毕业，返回家乡服务，本校教职员中，不乏其人。以往证之，我们的前途还是充满光明的。希望诸位同学，不要气馁，要不畏艰困，振作精神，向前迈进，自强不息，古

有明训，克服一切困难，达到求学目的，备为国用。”我的这些话，获得全体欢腾，精神为之提振，对于学校向心团结，大为增加。自此，浮动情事，不再发生。

二、惨谈经营，弦诵未辍

迁来李家祠堂后，宋校长排除万难，经营筹划，因陋就简，立即恢复上课。以故弦诵之声续闻，近千学子课业未致中断。校长东甫先生之力，几消耗殆尽。

我们自三十七年底抵湘，至三十八年六月间离开郴县，为时半年，校址处群山环抱之中，交通极为不便。每日上课，不仅学生课本不全，教师之教材亦付阙如，仅能就课程资料口述梗概，使学生钻研思维而已。所幸本校自峄县迁出时，宋校长特有远见，将图书馆所存之《万有文库》全部带出，其间虽到处播迁，车载船运，为时甚久，而全部无缺。至此，不仅供学生阅读，亦教师汲取教材之渊薮。按山东全省一百零八县当中，能将《万有文库》等工具文物带至台湾省（现存于省立员林实验中学），仅有峄县库藏一部。此又系宋校长对山东文化资产保存之一大贡献。

学校在流亡湖南期间，整个局势逆转，人心浮动，物价飞腾，每月由教育部拨来之经费金元券，到校后几成废纸。教职员薪水无法发出，千余学生一日三餐，亦有困难。当三十八年三四月间，学校几告断炊，学生每日发米四两，仅供作稀饭之用。迫于青壮学子难耐久饥之困，校长毅然率我及孙守唐、褚效先教师三人、学生三百余人随行至长沙，向湘省当局借粮。到长沙无处容

身，露宿街头，形同难民。一日遇雨，均无雨具，伫立马路两旁，个个全身尽湿。时值春季，天气尚寒，学生腹中无餐，身无长衣，其情之窘，至今若在目前。嗣拥进一体育馆门前，意欲进屋内避雨，讵料该馆主人竟杜门不纳。盖政纲失常，殆其为失去人性者之一耳。

在长沙受困数日，终有结果，获湘省当局慨允借粮若干，暂济急需。但拨粮至邻县永兴县，须自行提取。而永兴县距校数十里，且尽系山地，无法用车搬运，又乏雇工之资，均由学生自行搬运。学生基于果腹，只得肩负步行。幸诸生年青力强，吃苦在所不惜，并有老师领队前往，日行于崎岖山径，汗流浃背，吃尽酸辛，往返路程几达一日，始将谷物运回充饥，学校亦赖以维持。

基上种种，宋校长为维持校务于不坠，其心力之憔悴，可谓至极，而从未语人诉苦，东甫先生不愧为教育家之模范。至在学生群中，虽因地域关系，情感或偶尔稍有隔阂，发生不愉快事件，但在宋公大公无私之领导及训导处孙、褚两位导师之教导有方，处置得当，校风至为良好。同时的其他联中，则或有些微事故，两派对立，壁垒分明，各不相让，进而互相争衡，形同阋墙，悲夫!

三、北人北俗，湘南佳话

本校留湘期间（自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六月），虽有困难重重，艰苦倍尝，而校规严谨，诸生均各自爱，秩序良好，深获当地民众雅重。尤其洞尾村李保长，为

人精明干练，富同情心，对我们这群北地人，照顾备至。当地风俗习惯，以及许多忌讳，均事先告知，免生不必要误会。湘南，五岭山脉横贯，交通极为不便，惟民情纯朴，趋向保守。语言初不易懂，有事借手势助之，始能沟通，但地近温带，气候适宜，冬不甚寒，稍加衣服，即可度过。对我们这群北方流浪汉来说，倒是一大福音。

农历春节时，因面粉缺乏，伙食因未能包一次水饺过节，致过旧历年的味况，若有所失。教职员如此，学生更不必说了。以故，倍增离家思乡之痛。相遇无言，间有拭泪者。按此方习俗，至贫之家，过年需吃饺子，以讨吉利也。唯在春节过后，邻近庄村稍为富裕之家，多邀请本校教职员到家“吃春酒”。纵不甚识，亦礼貌有加，竭诚招待。每至，则盛馔款待，主人以宾客相迎，尽出所酿之老酒飨客。宛如至亲邻里，终至酒足饭饱而后归，俨然“敬师之古风”尚存焉。间闻当地人士，目睹我们这群他乡游子，有家归不得，值此旧历年关，遗憾不能吃餐新岁饭，同情之心而生，故相约稍作破费，聊尽地主之谊，藉慰乡愁。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信然。自思若置身于繁华都市，犹有此种人情味乎？夜晚归来，久久不能入睡。午夜感憾良多，曾赋绝句云：“不才逢乱世，感慨满胸怀。国破家离散，妻亡子痛埋。”用志心情。

时当地民众对教师热情款待，固有尊师重道之意。而对少小离家之学生，亦诸多照顾，如借住于民宅之学生，蒙邻右户长馈赠饮食者至伙。间或学校缺粮，每月

分发之米不能果腹，房东老太太目睹神伤，添加若干以充饥，又或增加菜肴，提振食欲（那时没有饮食健康名词），视同家人子弟待之。此种他乡温情，至感且慰。那时地处僻乡，既无餐馆，伙食不佳，大有“三月不知肉味”之概。在极思饱餐一顿时，闻农家有代为料理之事，遂与伯余、效先二友商议，请同学代谋，洽妥后，由学生带路至一家庭，窗明几净，酒菜早已罗列满桌，主人未露面，仅有妇女端菜奉茶，俨如招待贵宾。饭后，主人虽未索值，吾等三人合留时币稍许，略表敬意而已。湘南民俗纯厚，妇女亦然。行文至此，谨记之，以示未忘颇晓人情味之一段往事。

四、从军来台，社会中坚

前次赴长沙借粮时，适值陆训部第四军官班入伍生总队在湘招生。此时共产党军队已渡江，武汉撤守，湖南已非安定之地。为响应二期青年从军，奉校长命准由余与褚、孙两位同仁主其事，号召学生入伍从军。不数日，响应者200余人，与陆训部招生处萧主任学良接洽后，分两批仍由三人带队，自湘转穗乘“海湘轮”来台，于三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在高雄登陆，学生入营受训，任务达成。我等三人旋被强迫资遣，另谋生活。此批学生受训结业后，多考入陆军官校第二十四、二十五两期，为职业军人，目前位至将官者数人，其中并有一人为现役中将。余皆校官阶级，限龄退役，亦有转入政、警、教各界者，继续为国家服务。因学能俱优，表现良好，叙阶至简任、荐任、现任县市警察局长、院辖市副局长、科

长、省市立中学校长、学校主任及军事教官、总教官者，所在多有。此仅指从军来台者而言。

其余学生由宋校长于三十八年夏，带至澎湖，适役龄者及其他各校学生，编入四十军，保卫台、澎、金、马。年幼及女生转入员林实验中学就读，女生师范卒业，多从事教育工作。男女高中毕业后，继续深造者，亦不乏人，并有多人出国研究，取得学位（博士、硕士）后任教于各大学，亦有进入中央研究院，著作等身，学术地位极为崇高者。至于经商致富，不让陶朱者，亦不乏其人。

五、山东省三多：圣贤、豪杰、热血青年（略）

六、身教言教，师道永垂

在徐州设站收容南下的学生时，徐州市各公、私立学校不为所动，不作应变措施，甚至笑我们过痴，以流亡为失常行动。虽有一部分青年意欲南下，易地读书，而老师不率之于前，学生也无法追随于后。故有少数学生，不惜更换籍贯，以山东人身分随校去后方就读。四联中二分校学生中，即不乏其人。好在，那时尚无身分证，有学历证明，即可蒙混过关。我在民族路负责登记和审核证件时，明知其伪，亦予以通融。当时我这想法和作法，与宋校长的观点与意旨不谋而合。

闻峄县县中，在未迁至运河南岸程庄前，共有初中、简师四班学生，不过两百人左右。东甫校长基于为国家育才，以及造福桑梓计，在学校播迁时，大事招收学生，几将全县知识青年网罗殆尽，连同胜利中学到徐

时，两校学生已达1100人。除少数因事未能随校来台外，现时在台者尚有七八百人之数，均能为国效力，个人事业亦有所成就，宋校长应为最大功臣。

抑有言者，如以县为单位，不要说其他各省的县市在台的人材之多，不能与峄县相比，就以山东全省一百多个县市来说，哪个县市能出来这么多的知识青年，为国家贡献心力。若那时山东各县均有一个如宋校长有卓识，有远见，将知识青年悉数带出，不知现时台湾又有多少人材辈出，裨益社会，贡献国家。

岁月如流，东甫先生诞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九月二十七日，于民国六十二年（1973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安归道山，而今年之九月二十七日适届百龄。昔日从游之诸弟子咸于孺慕之忱，为先生九泉之寿，同志追思。惟当年共事诸夫子，多先后凋零。佩言幸获上苍之佑，今年痴长八十有五，身体健康，耳目聪明，健步尚奔，应诸学棣之请，敢不将我素知尽一言乎？

先贤有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兹藉先生冥诞之辰，为七律之诗以诵之曰：

志洁行廉甘淡泊，
大哉夫子有三乐。
在陈绝粮不愁穷，
浮海乘桴幸可托。
一代哲人友与师，
百年冥诞今犹昨。
门墙桃李尽英才，
鲁峄薪传天宇廓。

复撰双联两副四十有八字挽之曰：

一、文以载道，与诸君永怀百年冥诞；
明则诚矣，愿来世再结未了情缘。

二、自北自南，万水千山同难侣；
亦师亦友，春风化雨纪乡贤。

并缕述四十年前大陆撤退前后，流亡学生收容、就学、来台经过端的，为文约七千言以纪之，用备治史者之一助。或曰："洋洋"数千言之文，于东甫先生之治学、教育之事功，何吝也？昔者孔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千载而下，斯非东甫先生治学身教写照乎？夫先生之重身教，始有今日诸弟子之贤而多能，无忝为师之训。况余与东甫先生相识，追随于艰辛岁月，肝胆相照，久已体会其身教重言教之旨，唯深邃之处，莫如诸学棣之汲深也，何敢夺焉。

爰追铭曰："泽山苍苍，微湖荡荡。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山东文献》第十六卷第三期，中华民国七十九年〈1990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戎马十年坎坷多

金 士 庵

我家祖居台儿庄镇金庄村。听老年人讲，我家虽有十几亩地，但由于土匪遍地，不能适时播种，再加上肥料不足，亩产百斤就算是好地，一般多在几十斤。生活虽不算宽裕，但平时省吃俭用，也能免去冻馁之苦。但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安安稳稳地过生活。有一年，我父亲金兆平（字晏清）被土匪绑架，经过长时间的拘押，中途逃了回来。看来，农村已无法再呆下去了，于是举家迁进台儿庄，父亲到峄县由美国人创办的瑞门德医院学医。民国十八年（1929年），父亲从瑞门德医院学习结业后，回到台儿庄，在繁荣街中段路南租了几间房子，开办福民医院。家庭生活开始有了好转，平日也就是三分细粮七分粗粮罢了。

我出生于民国十年（1921年），6岁入台儿庄基督小学（现为台儿庄镇西关小学）读书。初小毕业后，考入峄县第五区区立小学（校址在文昌阁，即现枣庄二中校址）上高小。校长贾明甫，峄城区匡谈人。两年的高小，除了学习国文、数学、史地、自然、公民、音乐、

体育、写字等课外，还开设工艺课，学习编织毛衣、园艺、割花等，这等于现在的职业技术教育。我的初中是在滕县由美国人创办的弘道院上的。当时，滕县的办学条件很好，从初小到高中，以至到乡师，滕县都有，不要再到外地去了。

在我初中马上就要毕业的时侯，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紧接着，青岛、济南相继失守，一些同学已无家可归。记得有一天，师生们聚在一起闲谈，谈到了当时的局势。我激于义愤，说了一句“韩复榘为什么不打？”有一位老师对我大瞪白眼。日军渐次南侵，已经到了界河、两下店，滕县已隐约听到了炮声。学校于是自行解散，无家可归的学生便盲目地向后方流亡，我则回到了台儿庄。那时，台儿庄也已人心惶惶，我又转到了峄县。家庭原想让我进瑞门德医院学医，托庇于美国人之下。我心里却另有打算，想到外面闯荡闯荡，遂不辞而别。

1938年农历正月初一，天色灰蒙蒙的，北风怒号，寒冷刺骨，我和临时搭起的伙伴、峄城的杨大恒（后考入黄埔15期），冒着严寒，从峄县城踏上了去徐州的路途，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跋涉。那一年，我17岁。

徐州，是陇海、津浦铁路的交叉点，当时是李宗仁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所在地。胡宗南第八战区（陕甘）第十七军团来徐州，以战地服务团的名义招考学生，招考项目是演剧、宣传，考的是初中文学科，很适合学生的口味，又是在大后方，因此，报考的很踊跃，我也报了名。经过简单的考试，就被录取了，是为第十七军团学

生队。

我在徐州逗留期间，遇到了台儿庄的郭玉基、郝玉玲和峄城孤儿院的一部分女生。他们也都被录取了，经过短期的军事训练后，被分配到政工部门服务。台儿庄的王锡绥是在天水时遇到的。另外，孙晋慈、孙晋恪、孙晋爵、孙业随、孙业叙和胡成信等峄城的老乡，则是入校后才知道的。

当时的徐州，已经不太安定，日军的飞机经常来空袭，因此不能久住。于是，我们乘上火车，沿陇海线西行。为了安全起见，车多半是夜行，走得很慢。除沿途几个大站停车，下车闲逛一会儿外，其余时间全都呆在车上，似睡非睡，有时天南海北地闲聊。随着隆隆的车轮声，有人在轻轻地哼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时，我第一次感到离乡的凄楚。经过7天7夜的火车颠簸，我们终于到了当时的所谓西北大后方——西安市，下车稍事休息。当时的西安，因日机的空袭，路人惶惶，社会一片混乱。看来，大后方也不太平，在此作短暂停留之后，我们又坐车继续西行，到了陕西的凤翔县境。当时，到凤翔县无火车，我们只好在虢镇下车，步行20里到了县城。

在凤翔师范学校，已被录取为学生队的人，经过全面的体格检查和高中文学科的甄别考试，即被正式录取，是为黄埔军校西安第七分校第二总队第15期学生。当时，学校驻凤翔师范。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任，副主任为顾希平，办公厅主任罗历戎，教育长彭克定，二总队总队长为李正先。落榜的学生被编入军校练习营

三、四两连，在凤翔先学习一点军事知识，然后开至离凤翔20里地的王堡村，进行正式的、然而单调的军事训练，无任何文学科内容，纯粹是大兵的生活。因为我只有初中程度，所以也在落榜之列。落榜的学生对自己拥有的有限的文化知识感到惭愧，而对落榜后的大兵生活非常不满。当时学生开会，强烈要求增加文化补习课，否则要各奔前程。营长吴俊（湖南人，黄埔6期）和两连连长向上级反映，才派来了一两个文学教员，三连连长贾守纶（山西新绛县人，黄埔8期）担任军事学科步兵操课。至此，大多数学生也就安心学习下去了，少数有后援者另有他图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军营生活，即步行到甘肃省天水县，先住在步兵营房，后搬进县城内。除军事训练外，文化课又加深了一些。

天水县城依地形而建，长方形，分大城、中城和伏义城3部分。日军的飞机常来光顾。中城城墙附近有一处小学，在城墙根挖了一排小窑洞，以防空袭。由于城墙上半截压力太大，同时也未注意安全，窑洞陷了下来，许多小学生被压在窑洞里，一时间哭声满城。我们连奉命前去抢救，连续奋战两天两夜，挖出一部分学生尸体。经此一事，当地群众对我们的感情接近了一步。总地来说，我们在天水的学习是比较正常的。

1938年冬，我们这些落榜生经过再次考试测验，被纳入了黄埔军校第16期。这次落榜生是极少数的，上级有关部门也将他们分配到其他合适单位。于是，我们越过被当地人称为的“关山”，到达兰州，复又经过严格的体检和考试，被编入第五总队（第九十军军长杨得亮

代总队长）第三大队（刘云凯、李汇川分别任正、副大队长）第八中队（中队长是贾守纶），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从此作为正式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学生了。

黄埔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是除空、海军外，综合各科，军政合一的学校。军事学科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军制学、内务学、战术学、测绘学、通讯学、兵器学和筑城学等，有些是每日必学，有些是间日学，偏重步兵。7分校校本部还设有边区语言（蒙、藏）训练班、英语班，兰州七分校第五总队设有俄语班，有兴趣者可随便选学。其他还在各地设有专科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和骑兵学校。

兰州市南有皋兰山，山上有四墩坪，据说是从前的烽火台；北边有白塔山。黄河河水不黄，自北城根流过。经黄河大桥公路可达新疆。夏季，当日气候不同；冬天，黄河的水结有一米多厚的冰。我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穿衬衣、短裤，往返20里地出早操，砸开黄河的冰凌洗手洗脸。当年，我们出早操跑遍了兰州城附近各地。早饭后，开始一天的学习。经过近一年半的学习，1940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创办纪念日，学校举行了毕业典礼，全体毕业学生接受了胡宗南校长的大检阅，他还同每一个毕业学生谈了话，中央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代表蒋介石校长）和傅作义将军到校讲了话，并同学生们一起聚餐。我们就算毕了业。毕业证和党证，都是以后补发的。然后就是毕业学生整理个人的私事，听候分配。火线部队为了避免途中发生意外，则派人到校接分到他们部队的学生。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的警备旅改编为新编二十七师，清一色的陕西人，师长为王峻（浦城人），没有旅，下辖七九、八〇、八一团。我和秦寿桐（济南人）分到七十九团（团长王宪斌，扶风人），我被分配到二营五连（连长张举才，岐山县岐阳村人，行伍出身），职务是附员(即见习排长)。新编二十七师除师部驻朝邑县外，其余都驻河防。我们连的河防中间有一滩，叫大庆关，对面便是蒲州(永济县)。当时，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凡分到非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都负有改造这个部队的任务。因此，初到之时，双方有对立情绪，猜忌倾轧。我的工作注意处处请示他们，公开接近士兵，艰难地工作下去。时间长了，关系稍有好转。不久，部队奉命到中条山接防。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我们去的地方是平陆县，隔黄河与河南省温池县张茅镇车站相望。此地山高岭大，村稀人少，道路多为在两山之间或山坡盘旋的羊肠小道，仅可单人行走。与日本据点相距最近一二十里处有一要路口，其他则无路可通。不过，当地的群众基础较好，他们主动与我们接近，介绍这一带过去和现在的情况。

据我所知，中条山的防务是6个月一换防。八〇军(军长孔令恂)的防线由茅津渡一六五师(甘肃部队)起到二十七师七十九团的门坎岭与第三军(军长唐淮源）衔接，师部设在防线后稍远处。团与团之间，则群山环抱，虽有人住，但不多见。我们在驻防期间，仅有过小的战斗。防务期限已到，上级尚不说换防一事。这时，

听便衣侦察说，日军从关东调来部队，要扫荡中条山，大部队这才后撤，仅留下排的编制作前哨。我所在的五连撤驻门坎岭。从此以后，枪炮之声不绝于耳，第一线的排也撤到了连一线，战斗越来越紧。限于地理条件，只是还没有大部队的接触，仅是在山沟或山坡间捉迷藏式的遭遇战。由于兵力分散，武器落后，仅半个月的时间，黄河边百里纵深防线就被日军突破。后来听人说，师长王峻和副师长梁希贤(铜川人)在莲花顶死于敌机轰炸，其他的情况则不得而知。总之，中条山已无正规防务。撤到黄河渡口或黄河边上的部队，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或躲或逃，或投进滔滔黄河。幸亏我生长在运河边上，得以游过黄河。上述情况，是我鸟过黄河后，爬到半山坡上看到的情形。

过河之后，我身上仅剩下一条裤衩，于是去找自己的部队，沿途遇到的群众听说我是从河东过来的，都很热情，主动给我饭吃，给我水喝，还送给我衣服穿。浑城镇驻扎的是卫立煌的第一战区第九军补充第二团。是他们把我收容起来，送回河防部队的。在那里，我遇到了兰州五总队三大队第七中队的孙自成。他是河南省登封县人，是个有侠义心肠的热心人。这时，我不幸患了严重的伤寒病。他用车拉着昏迷中的我去看医生。因时时都有敌机轰炸，地方医院无法收留我。我一息尚存，孙自成也不放弃给我看病的希望。直到我们的部队开进潼关，住进临潼，48兵站医院收留了我，我的病情才稍有好转。孙自成这才随部队驻进蓝田县。我病愈出院回蓝田不久，孙由代理连长升为连长。

部队经过蓝田整编后，最初开进宜君县七里镇，住在碉堡线；接着移防中部县(轩辕黄帝陵墓所在地)，住隆坊镇；后又撤出驻三原县。三十四集团军司令部驻城外，司令陶峙岳当时是我们的最高长官。

那时，物价飞涨，薪饷却不长，每月49斤粮食，多数是玉米，不够吃的。于是每月仅有的几块钱菜金，只好省下来添补粮食。生活十分艰苦。二连士兵的伙食费被扣发了一部分。这是因为连长王恒振赌博输了钱，拿野猪还愿。可士兵不敢向连长去要，便向我反映，不巧被连长的亲信听到了，便添油加醋地向连长学说，结果引起我和连长的冲突。我一时气愤，打了连长。连长王恒振，陕西鄠县人，行伍出身，在军队里已混了20多年，营里、团里都有他的关系，贪污也无人敢说。下级打上级（我当时是二连一排中尉排长），问题是严重的。我的官司由营打到团，由团打到师。这时，我们团已由三原县调到宜川县驻防，师部驻城外。因为王恒振克扣军饷，事实确凿，师长严映皋（湖北人）只好将他拘押查办。这场官司表面上看来是我打赢了，但从此我的日子就不好过起来，我的工作经常被调来调去，很不安定。最后，七十九团团长方晓松（湖南人）调我去一营二连任连附(副连长)。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宜川县全城鞭炮齐鸣，路人相庆。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军事当局却整顿部队，频繁调动，内战的阴影重又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心头。8年抗战，中国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也尝尽了人间辛酸。这时，我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已有些心灰

意冷了，思乡之情日益加重，同室操戈的蠢事我不想干下去了。我们团的团长戴克北(四川省犍为人)很理解我。在我们私下交谈时，他曾说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1947年冬，戴团长调我任团部上尉副官。我趁职务调动清闲之便，去了西安一趟，想探听一下消息，了解一下局势。在空军司令部，我巧遇滕县弘道院初中同学张保华，经过深谈，他很同情我，于是替我办了乘坐飞机的手续，我由西安乘飞机到了徐州。甫下飞机，顾不上喘息，我便急匆匆向离别多年的故乡——台儿庄赶去，从此便结束了我10年坎坷的戎马生涯。

1990年6月25日

补白

马毓德

马毓德，字润亭，台庄人。咸丰八年冬十月，捻匪数万众渡河来犯，毓德率练丁三百人御之。时贼众且锐，练丁惊溃，毓德独与敢死士十余人驰击之，手刃剧寇数名。贼惊怒，挥众围之数匝，毓德度不能脱，自刎死。

(《峄县志》卷二十一《乡贤列传下·忠义》)

峥嵘岁月　戎马生涯

——黄埔军校前后一段生活的回忆

李　德　让

我家祖居侯孟乡唐庄村。这儿是半山半湖地带，土地比较瘠薄。丰收年景，尚可勉强度日；遇到荒年，则无法糊口。从我记事时起，耕地少人口多，一年到头，所产粮食不能自足。父亲去世后，因生活所迫，租种富家人部分土地，才勉强生活下去。

我9岁时，在本村一所小学读书。小学3年级时，因生活所迫，只好中断学业。我14岁那年，经亲友介绍，到贾汪煤矿矿立职工子女学校（学校一切费用由煤矿负担）学习6年。小学毕业后，又因生活困难，未能继续升学。

1938年春，我19岁时，和本村的李德璞、李德蕴、李冠元等4人，在宋东甫先生的帮助下，侥幸同时进入国立湖北中学均县分校简师部学习。均县分校设在均县城内，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山东人。宋东甫先生就是

---

*李德让，台儿庄区侯孟乡唐庄村人，黄埔军校第17期学生，枣庄市政协委员。

这所学校的老师。宋先生是台儿庄区涧头集镇南旺庄村人。他对我们非常关心，经常教导我们要胸怀大志，要有爱国之心，要刻苦学习，将来要为人民大众做些有益的事情，他在生活上也经常给予我们照顾。这一切，对于一个青年学生来说，是多么幸运。1938年5月，贺敬之和张延龄、陈德秀3人从家乡来到湖北均县，插入均县分校简师班四级二班学习。我从此认识了贺敬之，并从这位青年的言谈中受到不少启发。（1940年，贺敬之由梓潼去延安）。

1938年冬，日本侵略军侵占我山东后，又大举进攻湖北武汉地区。学校奉命向四川梓潼搬迁。

从湖北均县到四川梓潼，有两千多里的路程，全靠徒步跋涉，历经月余，才到达梓潼。

记忆犹新的是，在长途跋涉中，我们翻山越岭，跨过无数条河流。在经白河至安康的途中，我们发现从敌占区逃出的难民。他们衣衫褴褛，愁容满面，肩挑背驮，扶老携幼，迈着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艰难地在路上走着，缓缓地走向暂时无敌人魔爪的汉中平原。只有从他们的眼中闪着同我们青年学生一样的无比仇恨的光芒。

这一切对我们有志的青年来说，怎能不同情，怎能不激愤！无家可归的人们啊！何时才能回到可爱的故乡，与亲人团聚！

我一边想，一边随着队伍缓缓地行进，忽然发现在路旁草丛中有一个大约不满月的婴儿。这个婴儿还喘息着，发出微微的嘶哑的哭啼声。我们同行的几位同学被这啼哭着的婴儿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连我这个从不爱哭

的人，不知怎的，控制不住，鼻子一酸，眼泪也流了出来。我们异口同声：这个婴儿的父母为什么扔下自己的孩子？难道这婴儿没有亲人吗？不！绝不！也许他的父母和亲人已不在人世了。我们问苍天，这难道不是日本帝国主义逼得人们无家可归，无依无靠，逃荒在外，流离失所造成的吗！我们几个同学不忍心让婴儿活活饿死，就把他交给当地一家农民喂养。从那以后，我们再没有机会打听这个孩子的情况了。

两千多里的长途跋涉，我们不但没有感到疲劳，反而增添了勇往直前、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途中，群山耸立，迭峰绵亘。真可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我们手拉手，互相勉励，战胜了重重困难。

1939年2月到达四川梓潼。这个小城位于四川盆地的北部，依山环水，西临潼江，川陕公路穿街而过。学校改为国立第六中学第一分校（1940年后改为国立梓潼师范学校）。课余时间，同学们总是爬到小山上，面向祖国大好河山，那金色的菜子花，浓香扑鼻；那潺潺的流水声，使我们陶醉。祖国啊！我们生活在您的怀抱中，该有多么幸福啊！学校的一些活动，使我们感到愉快，忘记一切烦恼。然而一回到宿舍，闭上眼睛，那被遗弃的婴儿，那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们，家乡人们的遭遇……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时时激起我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

当时，我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全国上下正掀起全面抗战的高潮，而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更加疯狂。

1939年农历五月初十、十三两天，敌机在重庆狂轰滥炸，3万多无辜的居民被炸死、炸伤，当时重庆市的公杂人员在处理死者时却大发国难之财。他们简直连一点人性也没有了。各国报纸发表言论，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同学们个个紧握拳头，高呼：我们决不能等待，决不袖手旁观！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日本侵略军残杀中国人民的暴行，激起了每个青年学生一致抗战的决心。1939年秋，我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成为17期学生。校址设在湖南武岗，主任是李明浩。近两年的军校生活，除了军事技术理论课，就是政治课，而大部分时间是艰苦的军事训练。我记得政治课有这几项内容：1、以三民主义为基础，坚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2、人人要抱有“不成功便成仁”的为国牲牺精神；3、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在军校所受的教育是深刻的，使我明白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为了早日上前线杀敌，我认真学习军事技术。在实弹演习中总是一丝不苟，把靶场当作战场，把刻苦学习比作对敌作战，克服一个困难就是消灭一个敌人。1941年7月，我结束了军校生活，被分配驻四川秀山第二军九师直属辎重营四连，任少尉排长。不久就参加了宜昌战斗。由学生成为军人，这是生活的转折点。我想，报效祖国的时刻到了，因此特别振奋。

宜昌位于长江北岸，两面环江，地势险要，为易守难攻之地。日本侵略军占领宜昌后，上下封锁，肆意骚

扰沿江两岸百姓，任意残杀人民，革命势力受到一定的威胁。

1941年中秋节前一天，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派九师、三十三师、七十六师分别夹攻宜昌。我排在这次战斗中担任前后方运输任务，随师部隐蔽待命。

这次战斗是下午5点进入临战状态。晚霞斜射在江面上，显得那么平静。夜晚，月色格外明朗，映照着崎岖起伏的山路，踏在草上时时发出刷刷的响声，蟋蟀不停地叫着。到了隐蔽地点不一会，战斗打响了，炮声、枪声交织在一起。我和隐蔽待命的每一个战士总觉得不如参加战斗来劲，但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我们趴在湿漉漉的草丛中，一动也不动。夜里的凉风伴着拍打江岸溅出的水滴浸透了我的衣服，身上感到阵阵寒意。这时，上级命令我排到约20里远的地方去领炮弹。接受任务，马上出发。我感到任务的光荣，时间的紧迫。在奔往运炮弹的途中，担任警戒的战士急来报告，前边的道路被敌人封锁，无法前进。我想，无论困难多大，一定要完成任务。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带领战士趁敌人火力间断的瞬间，通过了封锁，把炮弹及时运到阵地，送到战士手中，让战士们狠狠地打击敌人。仗整整地打了一夜，拂晓开始全面反攻，不到一小时，敌人全部被歼。

此次战斗，我17期同学有40余人参加，有的同学在战斗中牺牲了。我们虽付出了一定代价，但却赢得了战斗的胜利，消灭了盘踞在宜昌张牙舞爪的日本侵略军。胜利的消息传到百姓那里，无不拍手称快。

宜昌战斗胜利了，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我们为了中

华民族的生存和自主，投笔从戎，奔赴前线，负伤流血。我时常默默悼念牺牲的同学们，你们的功绩将永远载入革命史册！你们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宜昌人民的心中。

1949年冬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西南，我部在成都起义，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受到了党的教育。1950年我响应党的号召，申请回家务农。在“文革”中虽受些风雨吹打，但更受到了锻炼和考验，更加坚定了我热爱共产党的信念，更感到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温暖。1980年春，我被荣幸地吸收为市政协委员，1984年区政协建立，我又被吸收为区政协委员。在十余年的政协生活中，时刻受到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今天，我已到晚年，但为报答党和政府的关怀，我愿发挥余热，积极参政议政，为中华的振兴，祖国的统一作出贡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三届台儿庄区委员会
机构设置及其成员

主　席　高自清

副主席　顿亚彤　张　干　袁承云　张保君
赵祥贞　赵延庆　潘辉林（1991年3月21日三届二次会议增选）

提案委员会主任　顿亚彤（兼）
副主任　徐洪义（1990年2月12日三届一次会议选举）

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主任　张保君（兼，1990年3月27日三届一次常委会任命）

文教学习委员会主任　吴再桂（1990年3月27日三届一次常委会任命）

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　贺懋莹（1990年3月27日三届一次常委会任命）

经济科技委员会主任　褚庆元（1991年3月7日三届六次常委会任命）
副主任　田来青（1990年11月8日三

届四次常委会任命）

办公室副主任：董中善（1990年3月27日三届一次常委会任命，1990年11月8日三届四次常委会免）

王传文（1990年3月27日三届一次常委会任命）

政协张山子镇工作室副主任　晏保桂
政协侯孟乡工作室副主任　王昌文
政协涧头集镇工作室副主任　潘景全
政协薛庄乡工作室副主任　戚大平
政协台儿庄镇工作室副主任　董恩科
政协邳庄乡工作室副主任　王继才
政协彭楼乡工作室副主任　李向东
政协马兰屯乡工作室副主任　孟繁华
政协泥沟镇工作室副主任　张志全
政协兰城店乡工作室副主任　张忠义
（1991年3月27日三届一次常委会任命）

提案委员会委员：

高怀荣　黄濛江　李文衡　孙法勤　李宗周

（1990年2月12日三届一次会议选举）

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委员

张　干　袁承云　孙法勤　朱尧成　刘福祥

万方庆　郭玉堂

文教学习委员会委员

徐慎全　林德山　王来之　黄濛江　李汉俊
王昌华　刘树启

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潘辉林　袁袤祥　殷昭喜　郭玉堂　周庆武

（1990年5月22日三届二次常委会任命）

经济科技委员会委员

褚庆元　田来青　朱尧成　刘慎之　孙法启
王裕亭　王传礼　韩传经　潘万富

（1991年5月3日三届八次常委会任命）

编 后 记

《台儿庄文史资料》第二辑与大家见面了。

英雄的台儿庄，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本辑主要编选两部分内容：一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知名人物；二是发生在台儿庄地区的重要战事。

1991年，适值辛亥革命8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本辑刊登同盟会会员尤民烈士、赵常增先生的史料，以及台儿庄地区早期共产党员孙子明、赵波静二同志和洪涛烈士等人的事迹，以志纪念。

本辑的编辑、出版，得到了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士的鼎力襄助。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同志在百忙中亲自审阅并修改了《贺敬之的青少年时代》一文；中央军委办公厅的贺茂之同志为上文的递转作了大量工作，并寄来了他撰写的《张爱萍与台儿庄大战》这篇珍贵资料。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玉法先生及时寄来了苏佩言先生撰写的《大陆撤退前后流亡学生收容就读来台经过》；台属宋安阎同志提供了来自台湾的鲁南教育家宋东甫先生的史料。市政协文史委吴茂滨主任和赵文林同志审查了本辑篇目，石朝俊同志帮助装帧设计。在本辑付梓之际，一并致以谢忱。

由于编辑水平的限制和时间的仓促，错误一定不少，敬请大家不吝指正。

台儿庄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1年8月12日

订　正

由于我们工作上的疏忽，《台儿庄文史资料》第一辑《炮7团参战台儿庄》一文的作者应为“刘钦文”，误为“刘钦之”；《我家设了指挥部》一文“民主人士袁美希先生”（第128页第7行）应为“袁慕西”。特向有关同志致以歉意。

编　者

封面题字：贺敬之
封面设计：石朝峻
编　　审：张保君
责任编辑：贺懋莹
编　　辑：张孝才

枣准印(1991) 43号

工本费：2.50元